

目 录

“九·一九”起义和起义后的斗争	许闻新整理(1)
和平解放中公旗的部分回忆	韩保 口述(28)
忆当年西公旗的和平起义	恩克巴雅尔忆述 张志彪整理(43)
一九四八年西山咀战斗	赵海山忆述 张志彪整理(52)
那银泰率部起义.....	牟宝祥(60)
孙马宁夏之战始末.....	沈克尼(73)
国民党在河套的建立与活动	刘培荣(88)
河套地区三青团的始末.....	刘培荣(112)
我所知道的张庆恩.....	王廷英(119)
军统五原办事处的活动.....	张问之(138)
我的片断回忆.....	朱宇峰(146)
傅作义的宪兵组织.....	王兴亚(153)
国民党特务在河套的暴行.....	苏希贤(162)
五原县参议会的回顾.....	白焕瑜(170)
救济总署.....	王兴亚(175)

保甲制度在河套的推行.....	苏希贤(179)
各种特务组织在河套的活动	
及我肃特概况.....	李珍整理(190)
华北反共义勇军的覆灭.....	李珍整理(210)
智擒特务头子李鯤生.....	李珍整理(220)
河套地区剿匪纪实.....	霍建(226)
王毛仁股匪覆灭记.....	许闻新(249)
河套三害.....	宝音德力格尔(259)
旧社会河套鸦片烟毒之害.....	苏希贤(269)
陕坝米仓地区一贯道的罪恶活动	
.....	王廷英(286)
抗日时期河套的特大盗窃集团	
.....	王兴亚(3296)

“九.一九”起义和起义后的斗争

许闻新整理

在“九.一九”绥远起义前后，起义与反起义、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势力，曾进行过激烈的较量。但最终还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整个绥远胜利实现了和平解放，广大起义部队经过整编、改造，实现了解放军化。现在根据一些亲身经历者提供的事实和有关史料，将当时的斗争情况分述如下。

匪特麇集绥西 破坏和平起义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已成不可挽回的败局，只有绥远地区的八万国民党军队未被触动，原因是正在争取绥远的和平起义。此时，那些死心踏地的反动上层，虽已深知大势已去，但是他们并不死心，仍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并为东山再起安置他们的后事。国民党特务和阎锡山体系的特务也相继窜来绥远，与绥远的特务机关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中统特务头子、华北“剿总”调统室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庆恩，于1949年3月带着整顿绥远特

工、破坏绥远和平谈判的特殊使命来绥活动，旋即离去。

军统特务机关在北平解放后，为了布置华北各地特工潜伏工作，即委派军统特务头子、华北“剿总”第二处处长史泓为华北区区长，来绥活动。将身份业已公开，不便继续工作的原绥远站站长庞中兴调往别处潜伏，改任赵思武为绥远站站长，陈彤副之。各地来绥的军统特务统一由赵思武指挥，暗中进行活动。

同年7月，张庆恩为加强、部署绥远的特务力量，以阻挠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他带着多名特工人员从广州出发，途经兰州、银川、河套，到达包头，以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他首先整顿了特务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行政院内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共设台湾、海南、重庆、贵阳、绥远等五个办事处），张庆恩任绥远办事处主任，魏纯美任副主任。该办事处管辖绥远、山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东北、冀热、平津、察蒙旗等三区，陇海、平汉两线，共十一个调查处和一个第七公路调查站。绥远办事处设在包头，以此为中心，指挥上述省区的特务进行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华北区亦派

副站长田峻赴包头整顿特工，布置潜伏。为了便于特务活动，伪国防部委任绥远军统特务头子、绥远站站长赵思武为骑兵整编第十二旅副旅长（旅长为鄂友三）。在包头设立“骑兵第十二旅副旅长办事处”，作为军统“华北区”特务活动指挥中心。绥远地区麇集在包头的一些军统特务，在赵思武的统一指挥下，很快分别潜伏到绥远国民党各部队，摇身一变，以军职身份为掩护，从事反对绥远和平起义的各种破坏活动。

1949年9月上旬，毛主席委托傅作义和邓宝珊来绥，以促成绥远早日和平起义。这时，已迁到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得知傅作义离开北平到绥远促进起义，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即密电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头子赵思武，令其刺傅。电文中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

傅作义和邓宝珊来到绥远后，一次乘专车到包头，为了保密安全起见，傅决定在美岱召中途下车，召开军政高级人员会议。就在这时，国民党绥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也跟到了美岱召，想找傅作义作最后进言，劝傅南飞。到站后，卫队长张景涛正忙着从车上收拾行李。傅走到院里回头一看，发现张庆恩也跟在后面，傅作义说了一

声：“他怎么也来了？”阎又文即把张庆恩引到西屋应付一阵，然后将其打发走了。

为了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国民党政府二次派国防部长徐永昌带着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邀请傅作义到广州去的亲笔信，于九月十七日乘飞机到包头劝傅作义南下。蒋介石还特意给傅作义拍来电报，大意是：你这次回到绥远，正象我当年由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获得了自由。但我当年由于一念之差，遂铸成今日之危亡大错。要傅作义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傅作义看了信和电报对徐永昌说：“蒋的为人，国人皆知，我在北平和平解放，蒋岂能容我，我若见他，必遭不测。同时纵观全国形势，国民党必败，再跟蒋走，最终只能陪他殉葬。我不唯不愿替他卖命，自去找死，我劝你也不要回去了，你也投向共产党，咱们一起走这条光明大道，否则是自我灭亡，还得落个千古罪人。”徐永昌看到他说服不了傅作义，反被傅把他将了一军。他觉得任务完不成，不好回去复命。但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必然要在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因而耍了个诡计，以患病为名，住进医院。傅作义感到，如徐不走，会继续施展阴谋，破坏起义。于是和邓宝珊、李世杰（傅部原参谋长）一起商量，决定由邓

宝珊去找徐永昌，要徐永昌出面带领他们起义。徐永昌听了顿时发愣，意识到自己已不能阻止绥远起义。同时也预感到他的处境不妙，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便连声说道：“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天早上我就起身，不能妨碍你们的事情。”邓再三挽留，徐只是不肯。徐于次日（即九月十九日）早晨离包头飞返广州。张庆恩、祁觉民、魏纯美、杜品山等特务头子，也以身份业已公开，不便留绥为由，一起随徐永昌逃命广州。

张庆恩离绥前，指定李鲲生代理其办事处的主任职务。并对绥远解放后的特务活动作了部署：指令办事处办事员马奋成潜伏在包头，作为特务活动接头的转手人；宣布魏尚礼为调查处代理处长，胡尚儒为代理副处长。并给王之铸、郭培成等五人配备二百瓦电台一部，潜伏在刘万春的111军军部；胡尚儒、于乐渊等六人配备十五瓦电台一部，潜伏在张朴的319师师部。张庆荣（又名张茂堂系张庆恩之兄）、李守魏、单不移等若干特工人员，有的携带电台，有的持张庆恩介绍信，有的凭借关系，也分别潜入各部队。

绥远宣布起义 改编起义部队

1949年9月19日，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

等送走了徐永昌，然后率领绥远省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及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前往包头的中国银行礼堂举行起义通电仪式。傅、董设宴招待了全体签字官员。

下午一时，傅作义在包头中国银行院内召集干部讲话。大意是：我过去把大家领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要由我负责。现在把大家领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有谁自己走错了路，那要由自己负责……。讲了大约一个小时。

9月20日，接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电文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努力奋斗！”

绥远起义后，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起义部队在华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在整个部队开展了人民解放军化的活动。

1949年12月9日，绥远军区机关的第一批同

志从丰镇到归绥市后，双方依照军区机关的性质，商定了军区和原“华北剿总”驻绥部队指挥所、绥远省保安司令部的合并事宜。在傅作义司令员的主持下，省军区机关的合并工作于12月31日完成。同时宣布了绥远军区的成立。紧接着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九·一九”起义时的部队共有正规军和保安部队16个师、旅，约八万余人。除邓宝珊先生的22军86师由副军长兼该师师长胡景通、228师由师长杨仲璜分别带领开赴甘肃庆阳改编外，其余部队在绥远就地整编。

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部队的整编方案及干部配备，并复电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军委批准成立两个军、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整编工作从1950年2月21日开始，4月底结束。整编及干部配备的具体情况是：

原111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军长由刘万春担任，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樊折桂任参谋长，李骥程任副参谋长。下辖106、107、108三个师，一个直属暂编骑兵旅。具体改编情况是：原111军258赵晓峰师，改编为106师，师长赵晓峰；原320马逢辰师改编为107师，马逢辰任师长；原310张副元师及乔汉魁旅步兵91、92两团合并改编

为108师，张副元任师长；独立第三乔汉魁骑兵旅、保安骑兵第四张汉璉旅、骑兵整编第十三高理亭旅，改编为军直属暂编骑兵旅，乔汉魁任旅长，张汉璉、高理亭任副旅长。整编之后，各师、旅均按命令分别到达指定地区布防。当时，军部驻包头市，106师驻中滩一带，以筑防洪堤坝为主，同时抽出一少部分部队开荒种田，大搞生产，解决部分自食的粮食和蔬菜。当时，当地群众称驻在中滩着亥滩地区的起义部队为生产队，意为开发生产的一支部队。107师驻公庙子地区，主要任务也是大兴土工，筑黄河防洪大坝，并搞垦荒种田。108师驻防安北县扒子补隆地区，以搞垦荒种田发展生产为主，同时抽调该师一个团到包头管辖的中滩地区大兴土工，抢筑黄河防洪堤坝。因为这一带地形较低，秋季一旦洪水到来，就淹没村庄和大片良田，给这里的群众造成灾难。因此，加强力量，争取时间，尽早完成拦洪坝任务，是军民的共同心愿。在筑起包头至西山咀这段黄河防洪堤坝方面，起义部队是出大力，流大汗，有功劳的，是深受当地群众称颂的。由于黄河防洪堤坝的及时筑成，避免了黄河每年春秋两季的泛滥灾害，使农牧业生产得以较快地发展。骑兵旅驻萨拉齐地区。全军共13121人。

37军是新颁布的番号。军委颁布番号以后，以独立第七师为基础扩建而成。原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晋升为37军军长，帅荣任政治委员，卫景林、冯梓任副军长，张逊之任政治部主任，化博知任参谋长，王韵琴任副参谋长。下辖109、110、111三个师。原322师改编为109师，温汉民任师长；原326王崇仁师改编为110师，王崇仁任师长；原319张朴师的三个团并编为331、332两个团，保安二旅及保安五团并编为333团，合编为111师，张朴任师长；原骑兵第五安思达旅及侯镇国旅并编为一、二两个团，保安骑兵第六邬青云（小名邬四儿）旅编为第三团，而合并编为军直属暂编骑兵旅。安思达任旅长，邬青云任副旅长、兼三团团长。整编之后，37军军部、109师师部均驻在五原县城；110师驻临河、陕坝；111师驻百川堡（今临河县新华乡）、狼山、永安堡；军直骑兵旅驻邬家地。全军共12915人。

前骑兵整编第十二鄂友三旅改编为骑兵第四师，鄂友三任师长，白正刚任政治委员，强自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宗文任副主任。下辖一个独立骑兵旅，四个团。原骑兵第十一陈秉义旅改编为独立骑兵旅，陈秉义任旅长。改编之后，骑兵第四师驻防武川县一带，师部驻武川县北小井村。全师共5840人。

为使起义部队真正实现解放军化，华北军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即从二十兵团、平原、绥远等军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纵队，抽调了1900多名政治工作干部，派到绥远各起义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执行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各级政工干部通过组织部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学习，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建军原则和军队官兵必须遵照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使大部分起义军人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

但是由于参加绥远起义的部队，多数属绥、察、晋北各个战场败退下来的傅、董、孙的部队，以及游杂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队，人员成份相当复杂，有些原来就是土匪出身，本性一直未改，有些则坚持反动立场，并未真正站到人民一边。加上潜伏特务从中策反，在起义部队中团、营、连、排级的叛变时有发生。因此，在1950年底起义部队东调河北省整军以前这个期间，一场坚持革命道路，反对叛变的斗争，便在起义部队中激烈地展开。

卢万惠率部叛变 众匪首自取灭亡

卢万惠参加起义后，任乌拉特前旗保安二团团长。当初他参加起义，并非出于本心，而是企图“借舟渡河”，“借水养鱼”，等待时机，养

土重来。因此在军统、中统特务的唆使下，他带领全团四百多骑兵于1950年5月初的一天夜间，突然从着亥滩叛逃。匪徒们在路上打死几名无辜的老乡，流窜到同义隆北面一带的山里，抢劫粮食、草料，为害附近群众。卢万惠叛团的成员，多系当地多年来的土匪，地理情况非常熟悉，此剿彼窜，难以捕捉。为了尽快剿捕叛匪卢团，绥远军区命令三十七军驻鄂家地的骑兵旅出发进剿。骑兵旅接受任务后，侦察到叛匪住处地形险要，如果出击，仰山而攻，不易取胜。因此，只能另谋策略，于是我剿匪部队领导首先亲自给卢万惠写了一封劝降信。信的内容是：现在全国解放即在眼前，你们拉出部队与人民为敌，于己于部属都不会有好的结果。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再回到人民大众这边来，由我骑兵收编你们。否则，别无他路可走，请考虑答复。信写好后，雇老乡走羊肠小道把信送上山去。两天后，由老乡带回卢万惠的复信。卢在信中首先反驳了我剿匪部队领导给他的信，而后又说：你们如果欺骗我们，我们唯有拼命以待。针对这一情况，我剿匪部队领导找来原乌拉特前旗奇俊峰部下骑兵团的老团长沙格达尔。此人是蒙古人，当时任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保安团团团长，驻在距同义隆二十多里地西边一个村里。他为人忠实，性情

耿直，与卢万惠相识多年。我骑兵旅领导向他说明卢万惠叛逃的情况，请他给卢万惠写信，规劝卢别走绝路。沙团长很赞同这个做法。于是，我骑兵旅领导又写了第二封信，连同沙团长写好的信，一并雇人送往卢万惠处。并说明如若同意，回信时写明会面地点，以便详谈。也是两天之后，卢万惠回信，同意在沙团长驻地西边的一个小村里会面，该村距同义隆三十来里。第二天上午，我骑兵旅旅长安恩达带着一名警卫员前往沙团长驻地，与沙团长一起乘马前往卢万惠指定的小村。走出不远，看见北边山坡上人马杂沓，知是卢团的人。进村后，沙团长将安旅长介绍给卢万惠团长和田振英副团长以及王参谋长等。而后，他们一起进入一个农民家里，安恩达旅长首先向卢、田等人讲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并把前几天给卢万惠信的大意重新讲了一遍。卢万惠等听了均无异议，只是问安怎样收编。安旅长的答复是保存他们的骑兵团，并邀请卢、田和沙团长同到骑兵旅驻地吃喝一顿。卢将部队安置了一下，即随安旅长起身。

到了骑兵旅住处邬家地，几个人边吃边谈。谈的结果：卢万惠同意由骑兵旅收编，但提出要在同义隆一带驻扎。经用电报请示军部，一小时后回电，答复是同意收编卢团，指定驻在军部西

南、旅部东南的两个村庄，令他们明天就开到指定驻地。卢万惠满口答应，明天一定全团开到。第二天，确实执行了命令。为了稳定卢万惠团不起疑心，我骑兵旅领导亲去卢团驻地看望和讲话，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不许骚扰人民群众，粮秣由兵站拨取。还让卢团接任灯笼村（郇家地至五原中间的一个小店名）的骑哨。并派骑兵旅王泽甫少校和郭贯一上尉常驻该团，明则协助工作，暗中监视该团行动。

收编两个月来，卢团上下并未改邪归正。他们在驻地窝藏地主、特务、土匪。经常有三分之一的骑兵不在驻地，四出活动，不知干些什么。七月九日军部主要领导召去安恩达旅长，向安说明卢万惠团的问题，并传达了军区关于解决卢万惠团越轨行为的命令。军首长决定由骑兵旅解决。安旅长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卢团人马零散，四出活动者很多，需缓十来天时间，在七月十九日行动，以便在这一期间调回人马，一网打尽。二是从卢万惠本人来讲，是个官迷，为了稳住卢团，由军部下个编制表，将该团编为军直属骑兵团（团下设三个连，每个连一百多人马，加上团部，实有四百多人）。抓紧调回人马后，再以清点武器为名，立即行动，全部缴械；三是卢团的陈永胜连被骑兵旅副旅长谷耀武带走剿匪，

应由军部给谷副旅长去电，令其就地解除陈永胜的武装，将全连押送回旅。最后，要求严格保密，以免走露消息。上述三点意见，均被军部采纳，并一一付诸实施。

安旅长回到旅部后，立即通知二团（因一、三两个团调出执行剿匪任务，不在本地），卢团、旅直属机关，于7月10日上午召开团长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军区关于检查武器的文件，决定7月19日上午六时集合，检查枪支。随后将改编卢团的编制表交给卢万惠，让他在19日前把外出的官兵连同枪支、马匹全部找回。卢万惠欣然答应，一定照办。

19日早晨六时，安旅长召集景副旅长、崔参谋长、李参谋、刘副官，作了具体部署。首先讲明验枪时的队形排列：直属连在排头，紧接着是二团，卢团在排尾。队形站好后，架枪听候检验。先派卢团出警戒，开始检验警卫连，再由警卫连换回卢团的警戒。这一切由李参谋负责。部署完后，受检部队和直属连已陆续到达集合场地。这时，卢团的田振英副团长来找安恩达旅长，说他的手枪没有带来，要借支手枪，安说，在检查时说一声就可以了。实际上，田振英是来观察动向的。

军部派来的管军械的人员和旅后勤部军械科

二十多人开始检验枪支，先检查直属连，再检查二团，他们检查得很认真。最后，检查人员走到卢团的枪架前，每人抱起十余支枪，便把卢团架起准备受检的枪支全部拿走。这时，卢团官兵气得站了起来。安恩达旅长站在队列前高声喊到：

“坐下，坐下，我有话讲。”安旅长说：“你们（指卢团官兵）是我亲自收编，经三十七军批准的。可是，你们近两个多月来，远近人民群众议论纷纷，说你们团的驻地窝藏大地主、土匪、特务，许多士兵乘马带枪，四出乱跑，遭害群众，甚至十天八天不归队。所以军首长命令将你们团的枪械暂时收缴，将马匹集中起来，均由旅部暂代保管。你们团连以上的军官集中到军司令部军训处学习，排长以下官兵集中在旅司令部集训队训练。时间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官复原职，枪马归还。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改邪归正。接着向卢团官兵宣读了军首长的信。而后将他们全部送往西边学校院内，中午派人送饭。

为了暂时稳定卢团官兵的情绪，经旅首长研究决定：给他们五十万元现金（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伍拾元），让他们买烟抽。估计他们身上还有枪，下午三时，让安旅长带一名警卫员去看卢万惠等人。安旅长到学校见到卢团官兵后，他们站起来说，感谢旅长来看望我们，并给送来钱让买

烟。安旅长对卢万惠的官兵们说：“你们谁身上还有枪，可留下由军械科一并保管，不然带着大为不便。”通过说服动员，共交出手枪四支，梭子两支。晚上用汽车将卢万惠、田振英、王参谋和三个连长共六人送往军部，到了军部立即给他们带上手拷脚镣。七月二十日用专车将他们转送绥远军区。三个月后，军区军法处公布了卢万惠、田振英等六人的罪行，并判处死刑。排长以下官兵经旅部培训三个月后，分别编入各团。

卢团缴械后，经搜查驻地，查出卢万惠等人隐藏的大地主和几支长枪。

在此以前（1950年5月底），军部命令谷耀武副旅长带骑兵旅一、三团配合109师出发剿匪。谷提出要带刚收编的卢万惠团的陈永胜连，旅其他领导认为这个连刚被收编，对他们的情况全然不知，还是以不带他们为好。可是谷耀武强调，他过去就认识陈永胜连长，说此人能靠得住，又熟悉当地情况，带他去对剿匪有利。由于谷耀武的一再要求，最后，答应了陈永胜连的四十多人随谷去剿匪。安旅长和廖政委考虑到，无线电台台长曾向他俩讲过，谷耀武经常夜间去电台收听敌台。因此，决定派高参谋随同前往，以暗中监视谷的行动。

在解决卢万惠大部的同时，军部给谷耀武发

了电报，要谷立即解除陈永胜连的全部武装，并派队伍把全连武器、人马一并押送回旅部。谷耀武有意违抗军令，他首先让陈永胜连长带一名警卫员潜逃，然后将已缴械的四十多人连同马匹、武器，只派两名干部往旅部押送；有意地放走他们。被押送的四十多人，行至天德太桥附近（今五原县民族乡），看到路边芦苇丛生，树木茂盛，渠长沟深，纵横连结，便顺利地抢去武器和马匹逃跑。几天后，军部派人将谷耀武扣捕。原来谷是一个隐藏在军内的军统特务分子，后被转送到绥远军区依法处理。

高理亭叛变上山 当土匪被我歼灭

“华北剿共军绥远骑兵部队司令”高理亭，是个老牌军统特务。早在1934年即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并在庐山受过专门训练。日寇侵华时，高在汉奸部队绥西联军任过团长，对乌拉山前的中滩、窟亥滩地区的蒙汉人民为害非浅。绥远部队起义前，高理亭任骑兵整编十三旅旅长。在酝酿起义过程中，高就极力阻挠破坏，后因大势所迫，才参加起义。起义后先任改编的36军军直属骑兵旅副旅长，后任该军106师副师长。部队在中滩沿黄河兴筑防洪堤坝，搞生产建设。高利用此合法地位，“借水养鱼”，秘密进

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1950年3月，高伙同陈国祯等人，在萨拉齐县伴元沟，以开设大德炭窑、赛大坝炭窑为掩护，纠集反动军官、土匪、特务、地痞流氓，计划组织“护路队”，以此为基
础，开展特务活动。同时，还利用窃取的军职，供给军统特务、惯匪慕幼声一部分武器弹药，策动其武装叛变。同年四月，高派其心腹敌特分子张飞生潜赴香港，通过军统特务头子高子欣与台湾取得联系，被任命为“华北剿共军绥远骑兵部队司令。”高理亭接受委任后，分配了参谋长、政治、军需和联络等四个主任及八个团长、特务连长等，大肆扩充力量，加紧策划叛乱。后来因其作贼心虚，唯恐阴谋暴露，便率领匪伙，携带武器，拉出炭窑，窜至后山，上山为匪，重操旧业，公开与我顽抗，直至被我剿匪部队歼灭为止。

庞茂青哗变 孙得胜诛除

在五原县城驻扎的37军111师副师长庞茂青，是个出名的土匪头子。1949年秋，由于大势所趋，庞在行动上参加了“九·一九”起义，而在思想上却与我党和人民离心离德。因此，起义后与中统特务头子，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的调查组长胡尚儒互相勾结，狼狈

为奸，秘密进行策动部队叛变活动。胡是绥远“九.一九”起义时潜入该师的。他自带电台一部，负责与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潜伏的特务进行联系。后来看到全国解放在即，自感在部队中难以长期潜伏，就积极策划部队叛变。原企图促使庞茂青把整个师都拉出去，然后再继续扩大反革命武装，在河套及乌拉山一带开展反革命游击活动，以此与我军周旋，等待国民党卷土重来。但因庞茂青野心很大，想叛变后独揽大权，所以趁着师长张朴不在师部之机，在胡尚儒等特务分子的催促、唆使、策动下，于1950年2月10日突然发动了部队哗变事件。哗变时，他只拉出一个团去，自立番号为“飞龙部队”。庞茂青自任司令，并宣布官兵各晋一级，以此蒙骗下属官兵。庞在哗变后的第三天，我剿匪部队对其进行追捕时，哗变团内一个名叫孙得胜的排长得知是庞欺骗了他们，心里非常气愤，于是就将庞茂青击毙。当时哗变部队在我剿匪部队进击下，返回原驻地一部，溃逃一部。

匪特在余太合谋 杀害安北县干部

建立据点，策动叛乱，内外勾结，进行暗害，是土匪、特务阴谋活动的惯用手段。中统特务胡尚儒自从庞茂青叛变部队失败后，即与弓效

谦、冯一平等入潜入安北县的卢官壕。1950年4月上旬，他们选择了山峦绵亘、蒙汉杂居、易于隐蔽的大余太区，并找到了起义后留用的安北县财政科长程志华。胡尚儒利用与程志华是同乡人的关系，由程志华等人掩护，在余太潜伏下来，勾结余太区代理区长闵福志（旧职人员）和由国民党安北县警察局改编的保安队长杨世勋等，暗中商定组织了中统绥远地区余太据点，由胡尚儒亲自操纵这个据点的全盘敌特活动，特务分子王礼茂副之。杨尚勋为军事组长，闵福志、弓效谦为政治组长，程志华为组训组长，王礼茂、冯一平为联络组长。以上程、杨、闵三人均由胡尚儒发展为中统特务，并出面上报了绥远中统调查处代理处长李鯤生。他们还拟定了行动计划，即在争取安全潜伏的前提下，军事上以杨世勋的百余名保安队员为基础，以所谓“寄生敌体为生存”的方式，拉拢地方零散土匪，广泛联系旧军人，扩大匪特反革命武装。再与德王、宝贵廷联系，求得支持，待机活动，以期实现潜逃台湾特务机关布置的“响应反攻，扩大力量”的妄想。

在闵福志的介绍和保护下，胡尚儒存身和隐蔽在大余太合作社进行指挥，弓效谦、冯一平以小商贩作掩护，游窜乡村各地进行活动。1950年5月21日，胡尚儒策划了安北县余太叛乱的流血

事件，杨世勋、程志华等进行了武装叛乱，匪特合谋，杀害了我安北县副县长王锦云、秘书吴海和通讯员郝瑞云等三人（本会第一辑文史资料《原安北县副县长王锦云等遇害的简要经过》一文中，由于当时征集到的资料所限，因此，王锦云副县长等人被害的内幕及其策划的这个流血事件的主谋所说的不够确切）。这次叛乱事件发生后，大余太据点自行解体，胡尚儒则流窜于河套，1950年10月被我公安机关缉捕归案。后在归绥市镇压。当时直接杀害王副县长等人的凶手杨世勋、云占山、张永明、董喜小、张文源等，也于1950年至1951年剿匪肃特期间，被分别缉捕归案，判为死刑，先后处决。

刘张鄂三人被捕 部队调河北整军

1950年7月刘万春先后两次秘密召见某部辎重营长李蔚浩谈话，给李布置去台湾联系的任务：①向张庆恩汇报绥远现在的情况；②向张索要二百万元（折合现人民币200元）作为活动经费和眷属生活费；③聆听张庆恩指示，确定今后的联系办法，并请台湾当权者传达国内外形势。联系结果要李由台湾返回后亲自向他汇报。李蔚浩接受任务后，于7月29日启程，8月8日到香港，住在香港中统特务机关招待所。经与台湾方面联

系，李在港等待17天之后，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台至港，听了李蔚浩的汇报，向李讲了所谓的形势。张庆恩指示刘万春要切实掌握好部队，待机反正。起码要等到明年秋后再行动，当前不要乱拉部队哗变。张交李带回一本电报密码，定×××化名为杨庆庄，并当面委任李蔚浩为通讯主任；决定与台湾的联系人为刘剑，化名刘子安。张庆恩还交李给刘万春带回包裹一个，信一封，书一本，活动经费140万元。李蔚浩返抵包头时，正值刘万春赴北京。李又追至北京去找刘万春。

1950年11月初，绥远军区召开军、师、旅长以上军政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一年来部队实现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会议结束后，政治干部先回部队主持工作，军事干部留在绥远军区学习，检讨工作，揭发问题。这是因为部队整编一年来，不断发生叛变和叛逃事件，针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以制止部队叛乱事件的再度发生。会议期间，接华北军区通知，命令董其武、高克林率军、师、旅长赴京开会，接受新的任务。11月25日前，由高克林副政委带领，到华北军区报到，后住在北京西单北路的一个饭店。

第二天，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华北局书记、兼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在军区接见了绥远军

区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华北军区首长首先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要求起义部队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要用新旧部队对比的方法引导部队官兵提高认识。并指出，部队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部队要经常为群众着想，为人民服务，这个部队就一定能够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

一天晚上，华北军区在东交民巷原日本领事馆招待绥远军区参加会议的人员。宴会后，去华北军区礼堂观看文艺节目。在演出期间，政务院公安部将36军军长刘万春、37军111师师长张朴、骑兵第2师师长鄂友三三人一起扣捕。刘、张、鄂是同案，以刘万春为首，起义后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继续与我党和人民为敌。

刘万春等人被捕后，华北军区首长在向傅作义、董其武及绥远军区去开会的军、师、旅长说明情况时，讲了刘万春在起义后，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今年7月间，刘曾秘密背着组织派营长李蔚浩偷去香港，与台湾蒋帮特务勾结联系的罪行，并将证据拿给大家过目。同时也讲了张朴、鄂友三在起义后的一些犯罪活动。在说明情况后，问大家怎么办？傅作义先生听后很惊讶，好长时间不说话。董其武将军含着眼泪说：“既然他们背叛人民，罪证确凿，请司令员和政委（指聂荣臻和薄一波）依着革命纪律办吧！不

过，念及他们都是参加过绥远起义签字的人，希望考虑从宽处理。”聂、薄二位首长商量后，当场明确答复：“可以保留他们的性命。”事后，傅作义先生曾有一次提到，说鄂友三在绥远起义时，曾奉蒋介石的密令要杀他，鄂基于与他多年来的私人交情，未肯下手。因此，傅作义先生并向毛主席请求保留鄂的性命。毛主席说：“他们几个人因都参加过绥远起义，可以全不杀。”刘万春被扣捕后，三十六军由副军长王建业代理军长职务。

刘万春于1975年被特赦。现为北京市政协委员。鄂友三在狱中病故。

1950年11月上旬，党中央决定调原绥远起义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以使这支部队接受新的锻炼和新的考验，进一步实现解放军化。要使这支部队赴朝作战，首先必须调离绥远，进行新式整军，在团结改造的总方针下，加强阶级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时还要完成部队整编，把骑兵改编为步兵，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并要补充新兵，更换新式装备，完成军事训练等项任务。

1950年底，起义部队分别从归绥、包头乘火车开赴河北省衡水、枣强、景县一带地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兵团，兵团是由36、37两个军

和骑兵四师组成，归华北军区领导。兵团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军政委员会，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为兵团政治委员，姚喆、边章伍为副司令员，王克俊任副政治委员，边章伍兼任司令部参谋长，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张升初任后勤部长，潘瑞征任副部长。兵团机关驻在景县龙华镇上。

起义部队整训运动从1951年2月中旬开始，至4月初结束。内容是以反对军阀主义、揭发隐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方法以忆苦和自我教育为主，目的是以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使部队彻底实现解放军化。广大干部、战士对这一运动表现积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亲人的血泪史，控诉军阀主义的迫害，检举和揭发暗藏在部队、地方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

经过两个月的整军运动，检举揭发出反革命分子1905名，参加反动党团、政治派别的1924名，交出私藏的长短枪133支。对以上这些人，经兵团党委重点审查后，除扣捕、管训现行反革命分子512名外，将其他有问题的人员均调离学习，继续审查。起义部队的士兵多是被抓壮丁而入伍的，其中农民子弟居大多数。他们父辈受压迫，被剥削，苦大仇深，容易激发阶级感情。通

过民主运动，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起了本质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大多数旧军官受到教育，亲身体验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军阀主义思想的流毒肃清了不少，部队又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

为了适应赴朝参战的需要，在民主运动基本结束后，又一次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的具体方案，主要是充实步兵师，撤销各军暂编的骑兵师、旅。兵团辖36、37两个军。36军辖106、107、108三个师；37军辖109、110、111三个师。原骑兵第四师、骑兵第四师独立骑兵旅、36军骑兵旅、37军骑兵旅均撤销番号，部队分别并入36、37两个军的步兵师内。具体并编方案是：充实106、107、109、110四个师；108、111师留后方另有任务。成立兵团师级教导大队。108、111师为空架子师，108师负责接收管理留后方编余人员。

经过整军和民主运动后，部队出现了严重缺员现象，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从湖南、江苏、河南等省征集了新兵两万名补充部队。这些新战士都是自愿入伍的，年轻体质好。有的是老解放区的干部子弟，大部分是翻身农民的儿子。他们的到来，使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大大改变了部队的成份比例。新兵编入连队后，整个兵团掀起

了练兵热潮，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爆破五大项技术为重点的军事训练，明显地看出部队精干了，战斗力提高了。

部队全体官兵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后，思想觉悟，技术、战术本领都有了很大提高，具备了赴朝参战的条件。赴朝出发之前，部队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23兵团。由董其武、高克林等兵团首长率领，于1951年9月上旬开赴朝鲜，担任泰川、院里、南市三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

和平解放中公旗的部分回忆

韩保口述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以锐不可挡之势，胜利向全国进军，华北大部分地区从东到西逐步解放。这年阴历六月，人民解放军已到我旗东边的四子王旗和我旗西边的阿拉善旗的巴彦浩特，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古自治政府，被迫撤到图克木店、归子河和我旗西部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是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我旗扎萨克王谷林沁僧格疑虑重重，犹豫不决。所以一个时期把旗扎萨克事务交给旗协理巴图毕力格管理，他则带上家眷同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躲到我旗西部的博拉乌拉一带。

当时我任旗军总队队长，并负责群众合作社工作。因此，协理巴图毕力格和我的家眷都住在朱勒格太的查干敖包地区。

一、接到解放军第一封信，磋商和平解放我旗问题

1949年阴历6月末的一天夜晚，我外出回到

家里，听家里人说：协理叫我去他家一趟。我到协理家后，协理家的人都已入睡，只有他本人准备了茶和点心等我。他见我进去，便边倒茶边说：

“韩保先生，我叫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明安旗跟随送来一信，你先看看再说。”随即他把信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住在四子王旗的人民解放军骑四师的负责人毕力格巴特尔和另外两个名叫新玉、沙木腾的人写给协理和我本人的。此信的大意是：

当前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将要完全解放，你们旗也必将解放。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你们发动并带领本旗人民群众举行起义，实现和平解放。如走此路，不仅对你们本人有利，而且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另一条路是跟随德穆楚克栋鲁普匪伙，同我人民解放军对抗作战。这样，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就要受到损失，就要遭到人们的反对，最终必然失败。这对你们本人也没有好处。面对这两条路，你们何去何从，应该自己选择。如果你们欢迎和平解放，愿意脱离国民党方面的话，要立即派人同我们联系。

我看完信后就问：“这个沙木腾是不是希勒图召那个大喇嘛沙木腾呢？”巴图毕力格协理说：“是的，正是他”。接着，他给我解释了一下此信的内容，然后问我：“你的想法如何？”

我对他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扎萨克大喇嘛能够参加，可能我们也能参加。”巴图毕力格协理听了，向我讲了当时的形势，摆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傅作义将军接受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和平解放了北平，因此共产党很尊重傅作义将军。现在国民党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所向无敌，要解放全中国，显然指日可待。

从我旗情况来看，形势十分复杂，最近在阿拉善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所建立的西蒙自治政府和他率领的三千多人马，给阿拉善北部和我旗西部地区带来了祸害，而我们的扎萨克王爷却跟他们狼狈为奸，继续向西潜逃。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本旗的安全和个人利益考虑，接受和平解放是比较迫切的事情。

我听了协理的这些话，表示同意。可他思考了一会儿，又靠实我说：“你是说心里话了吗？”我说：“我多年同你在一起，你不是不了解我，我为什么向你撒谎呢？不信我们一道去四子王旗，同解放军联系”。协理打断我的话说：“我信任你，才同你商量此事。但现在旗里的工作非常多，你我谁也离不开，只能派其他人去联系。就在这一夜，协理跟我分了工，他负责召开旗里主要

官员会议，研究部署迎接和平解放工作。让我抓好旗军和合作社工作。第一要防止盗窃，维护好旗里治安，以保证和平解放的顺利进行；第二要抓好入库工作，在妥善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尽量多储备些粮食，以供解放军所用。

第二天，我就根据协理交给的任务，到西河收购粮食。

二、首次派代表同解放军联系

阴历7月初，我在西河收购粮食期间，按照旗协理巴图毕力格的规定，领着秘书特木乐、随员达瓦等人到额肯查干庙，参加由他主持召开的迎接和平解放的秘密会议。当时旗协理明安满达、秘书巴德玛策仁、梅林章京根顿朝格、参领章京查格都尔策仁、那木吉勒策仁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统一了对和平解放我旗的认识，并对工作作了安排：一是由巴图毕力格协理亲自到博拉乌拉面见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向他宣讲当时的形势，把扎萨克王爷同德穆楚克栋鲁普分开；二是同扎萨克王爷商议拥护和平解放的事宜，决定写盖扎萨克公章的信件。

在阴历7月20日左右，巴图毕力格协理领上旗军西路中队长孟和图斯日古郎等人，到博拉

乌拉面见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向他详细报告了原从四子王旗寄来的解放军四师来信的内容和在额肯查干庙会上参领们商议的概况，并通报了旗里的详细情况，劝说扎萨克王爷认清形势，早日摆脱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返回旗衙门，迎接和平解放。当时林沁僧格虽然明知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已经到了走头无路的地步，但因对共产党、解放军认识不够，思想上存有疑虑，所以只是勉强同意写欢迎和平解放的信，但却不回旗衙门。

在这种情况下，巴图毕力格协理与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一起商议，在野外起草了欢迎和平解放的信。

巴图毕力格协理从博拉乌拉回来，让苏那木道布吉把信誉清后盖章，交给旗东部的明安满达协理，让他派人送给四子王旗的解放军。当明安满达协理把信先后交给合作社秘书巴图苏和与巴德玛策仁，让他们去送时，他们都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没有去送。后来巴图毕力格协理决定让苏那木道布吉亲自去送，而苏那木道布吉也不愿去。协理从他手里拿回此信，途中到那木吉勒策仁参领处，让他去送。那木吉勒策仁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去送。巴图毕力格经过反复工作，再三解释，说明送信取得联系的重要性后，那木吉勒策仁才勉强同意送信。这是我旗欢迎和平解放首次派出

的代表。

三、接到解放军的敦促信，第二次派我前往开会

首次“欢迎和平解放书”由那木吉勒策仁送走后，到阴历八月初，从解放军那里又先后送来两封信，要求我旗派代表商议和平解放事宜。当时我们的代表是否已经到达，还不太清楚（后来了解到那木吉勒策仁于八月初九才到四子王旗），因此在八月初七日，协理巴图毕力格从旗衙门（乌力吉图庙）把我叫去，拿出解放军驻四子王旗四师负责人毕力格巴特尔和新玉、沙木腾等人签字的，写给巴图毕力格和我的信交给我。信中重申了上次信中的内容，希望我旗审时度势，欢迎和平解放。同时指出，目前乌兰察布集会的各旗都已派出代表，同内蒙古工作组和师领导一起讨论决定和平解放问题。因此，要求我旗立即派代表参加。

我看完信后，协理对我说：“从来信看，那木吉勒策仁还未到达，现在只好派你前往。”我说：“派我去，第一路不熟，第二年岁小，知识少，怕完不成旗里交给的任务。”协理说：“不是只让你一个人去，这次要派几个人去，但完成任务主要靠你。你的任务是把信送给解放军，参加那里的会议，并把会议协商的事情带回。现在

我们最紧迫的事情是同解放军建立联系，坚决脱离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早日实现和平解放，消灭土匪。但我旗军队少，如果跟土匪打起来力量不够。到了解放军那里，要把这些情况详细说明。给解放军带的信，千万不能离身，路上一旦遇上土匪，也不能让信落在土匪手里。这次要派高勒苏木的贡都明珠尔和达瓦特木勒等人同你一起去。途中为了防止土匪抢劫，有些地方应夜间赶路。”

我接受了协理交给的任务，当天从乌力吉图庙起程，同一起去的几人会合到一起，路上毫无阻拦地走了几天，于阴历八月初九到了巴音敖包以北的朝格布仁家，向梅林先生的夫人打听了一些情况，第二天，我们跨过四子红沟河，到了四子王旗。

四、见到毕力格巴特尔师长，参加了和平解放协商会议

阴历八月十一日，我们到了驻在四子王旗的解放军部队，以骑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为首的十多名负责同志会见了我们。

在会见时，我们向毕力格巴特尔师长递交了巴图毕力格协理的信，并按协理的吩咐，汇报了我旗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欢迎和平解放的情况，希望解放军早日到我旗镇压土匪。毕力格巴特尔

师长问到我们有关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匪帮的动向，我们说：“旗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已把家眷搬到我旗最西部的博拉乌拉，他现在是否仍在那里，还是到了阿拉善旗，我们不得而知，而德穆楚克栋鲁普手下的一千多人，在我旗西部本巴图查干河庙和巴音希迪庙等地公开抢劫，给牧民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在我们回答完他的问话以后，他向我们讲述了国内的形势。指出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人民解放军正乘胜前进，全国不久就会解放，新中国也即将成立，以此来坚定我们实行和平解放的决心。接着，他向我们讲了共产党的政策，对巴图毕力格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为和平解放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欢迎和感谢。

这次会见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把我们来时的疑虑全部打消。在会见结束后，我们见到了第一批来的那木吉勒策仁、孟领和达日罕贝勒朝格布仁等，大家谈了些各自的感受，心里更加开朗。

原来预定举行的会议，因各旗的代表还没有到齐，决定延期举行。在此期间，我们先后参加了在部队营房里召开的庆祝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宣布和平起义（九月十九日）的会议和庆祝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大会，听了党政军领导人的报告、

讲话。同时广泛接触了解放军官兵，在相互交谈中，使我们对党的政策和革命事业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实现来时的目的更加有了信心。

阴历九月末，各旗代表到齐，十月初会议开始。会议由骑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主持，解放军各团的团长，内蒙古工作团的新玉、沙木腾、图布新、桑吉米图布、巴音都仁等，西公旗的松布尔巴图、恩克巴雅尔，乌拉特后旗的沙木腾与随员二人，明安旗的达木林与随员二人，达日罕贝勒旗的朝格布仁，四子王旗的格拉布吉，中公旗的那木吉勒策仁、黑套格套呼、贡都明珠尔、达瓦、孟领和我，西公旗原已起义的贺喜格太峰、道尔吉策仁、套格腾格日勒等，共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公旗的阿格旺同志当时在四师，也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并作出了如下决定。

1、绥远省和平解放，要采取适合绥远省情况的措施。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热烈欢迎九月十九日起义的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人。同时废除乌兰察布集会的旧体系，为建立新的集会人民政府组成筹备会。筹备会主席为毕力格巴特尔，副主席林沁僧格、沙木腾，筹备会秘书长图布钦，委员是中旗的巴图毕力格、前旗的额日贺

道尔吉、后旗的巴云英、明安旗的仁钦达来、达日罕贝勒旗的旺楚格策仁、四子王旗的格拉布吉。

2、对参加起义的、欢迎和平解放的乌兰察布集会的人员，都不追究过去的事情，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族上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些人暂时想不通，有疑虑，要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等待他们觉悟。尤其是对中公旗的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更要多向他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并要把会议专门给他的文件送给他本人，让他认清形势，早日返回旗里。

3、和平解放以后，各地区都要提高警惕，彻底粉碎破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由于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匪徒还在中公旗西部地区进行抢劫和散布谣言，因此要把带回去的宣传品大量散发，以孤立顽固的反动派，争取大多数。同时要搞好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如果盗匪继续为患，要把他们的头子抓来。对于跟随者要宽大处理，不得任意杀人。

会议结束后，我们于十月二十日左右往回返时，天气已经寒冷，解放军送给我冬衣。以毕力格巴特尔为首的解放军官兵三十多人把西部各旗参加会议的人员送到四子王旗的乌兰额日河，对

今后的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后才返回。

五、根据会议精神，部署本旗工作

我们回到旗里后，我和那木吉拉策仁立即去见巴图毕力格协理，把我们这次出去执行任务的情况全面向他作了汇报。协理对我们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并带回文件和具体指示一再表示感谢，对会议决定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为乌兰察布集会筹备会副主席，他为委员非常高兴。接着他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走后旗里发生的情况。原来我们去四子王旗期间，为了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于八月十日左右，巴图毕力格协理率领旗三路军队，打退了驻在本巴图查干河一带的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三百余名匪徒，把旗军队部署在西召河以东的巴日哈山、乌力吉图、川井、沙巴嘎庙等地，以防止匪徒窜犯。

当时，旗所属范围内虽然没有成批的盗匪，但是来自阿拉善的德穆楚克栋鲁普部下的逃兵，却三五成群地路过旗境，经常抢劫牧民的东西，并散布各种谎言，扰乱人心，使全旗百分之二十的牧户搬到蒙古边境一带。而扎萨克王爷仍然住在旗西北地区。

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实现和平解放，根据我旗的情况，巴图毕力格协理同我商议，提出了三

点意见：

1、对于继续为患的匪徒，要活捉为首的，送交解放军，对于跟随人员要给予宽大处理。对路过本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逃兵，要尽量监督其过境，以防刁抢牧民群众。要广泛散发关于拥护共产党，接受和平解放，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宣传品，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维护地区治安。

2、阴历十一月中旬在乌力吉图庙的旗衙门召开全旗官员、供销合作社负责人、寺庙大喇嘛参加的冬季会议，宣布乌兰察布筹备会成立，中公旗地区接受共产党领导，已经和平解放。

3、为了让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早日脱离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速回旗府参与和平解放本旗的工作，派专人去送解放军给他的文件，并向他汇报参加四子王旗会议情况，转达会议精神。

由于这些工作都很重要，又很紧迫，因此在分工之时，由协理巴图毕力格亲自负责部署前两项工作，把争取扎萨克王爷的工作交给那木吉勒策仁和我去做。

六、再去寻找劝说扎萨克王爷

在我们出发前，协理对我们说：从目前情况来看，扎萨克王爷正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还犹豫不定。此去只要做好工作，争取他回来完全可能。听说最近他的儿子雄努东日布同西苏旗协理阿拉坦敖其尔、布利雅特的达瓦敖其尔等十八人联合起来去蒙古时，曾多次劝说，邀他同去，他也没去。这说明扎萨克王爷并不想遗弃自己的故乡，跟着德穆楚克栋鲁普去当移官。而他现在所以住在博勒乌拉不回旗里，也不是他不想接受和平解放，过太平日子，而是他还不了解共产党对他这样的世袭王公贵族怎样对待，他对共产党还不相信，对自己的将来考虑的过多，因此下不了决心。所以你们去了，要把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你们在四子王旗参加集会的耳闻目睹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如实地向他说明，劝说他尽快返回旗里。

因路上土匪较多，协理给我们每人一支手枪，并给派了四名枪手。

我们从旗衙门出发，走了几天，到了旗西北部的布和太，遇到居住在扎嘎林里的道拉玛苏荣朝尔吉时，那里正遭匪徒抢劫，非常混乱。这样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八天，把带来的解放军传单向各户大量散发。从此以后，不知为什么那些匪徒没有再出来捣乱。我们乘这个机会，从道拉玛苏荣朝尔吉那里派人去寻找扎萨克王爷。在取得联系后，我们连夜赶到米格吉木敖包西南的沙沟里

见到林沁僧格王爷，把会议文件和旗协理的信交给他后，向他汇报了四子王旗会议精神 and 会议任命他为乌兰察布集会筹备会副主席等情况；转达了毕力格巴特尔师长对他的希望；介绍了共产党执行的各项政策，劝说他打消一切顾虑，同我们一起回旗衙门。扎萨克王爷说：你们克服重重困难，为旗里做了这么多工作，我非常感谢！我从解放军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和集会的文件里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我返回家乡接受和平解放的决心已定。但现在盗匪还没有全部消灭，又且已经入冬，天气寒冷，不便搬家，只好明春慢慢回乌力吉图庙吧。至于召开接受共产党领导，宣布中公旗和平解放会议，由协理巴图毕力格与你们看情况办吧。

七、召开冬季集会，迎接和平解放

我们返回旗里后，已是阴历十一月中旬。这时巴图毕力格协理主持召开了全旗冬季集会。旗都统巴特尔，梅林章京根顿朝格，参领章京那木吉勒策仁、查格都尔策仁，旗军西路中队长孟和吐斯日古朗、中队长塔苏斯日古郎、东路军中队长扎拉僧及旗生活供销社秘书苏那木，六个苏木的负责人和寺庙有职位喇嘛等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了此次集会。

在此集会上，传达了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起义情况和乌兰察布集会精神。在统一与会各阶层人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宣布了会议作出的脱离国民党统治，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接受和平解放的决定。

从此，旧的乌拉特中公旗有了新的生命，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成立了新的乌拉特中旗，各项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以上是我个人参加旗里和平解放的部分事情，所以不可能全面反映当时的情况。有的事情因年久日长，记不太清，说不定有错误之处，希望指正。

忆当年西公旗 的和平起义

恩克巴雅尔 忆述

张志彪 整理

1949年7月中旬，迫于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乌拉特西公旗王府主要军政官员，避开绥远省府的耳目，突然在旗政府所在地哈拉汉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主持人是西公旗管印协理额尔和道尔吉。参加会议的有保安司令陶格陶巴图（即郝游龙）、右协理松布尔巴图、管旗章京色楞朋斯格、梅令章京焦太保、贡其格色楞、参领章京那松巴特尔、文书长恩克巴雅尔等人。

会上，与会人员首先获悉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已经解放，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等给松布尔巴图、焦太保和陶格陶巴图来信，让他们动员旗府其他人员为全盟人民的和平解放贡献力量，而且邀请他们尽快前去四子王旗解放区参观学习，与共产党代表商谈有关西公旗和平起义事宜。同时得知伪西蒙自治政府在阿拉善旗定远营成立，给西公旗政府

来文，命令派代表前去，并责令送去经费一千银元。

面对上述情况，大家研究对策，意见较为统一：即东西两方均不能得罪。尤其对东部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万万不可抗拒。因为和平解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当时陶格陶巴图只赞成向西蒙自治政府派代表、送银元，而竭力反对投奔共产党。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只要共产党能把投去的贺太保等十余人送回来，便可以考虑和共产党合作问题。其实，他只是寻找借口而已，根本不愿与共产党合作。对于是否与共产党合作这一事关重大、牵动全局的问题，会议通过反复讨论，大多数官员明智地认为，共产党已占绝对的优势，得人心者得天下。而国民党大势已去，朝不保夕，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主张即早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和平解放的路子，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败局。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议定派代表右协理松布尔巴图、梅令章京焦太保、文书长恩克巴雅尔和文书陶德斯琴四人，迅速前往四子王旗解放区，与那里的共产党、解放军接洽，谈判西公旗和平起义一事。陶格陶巴图看到他的意见无人支持，也只好姑且作罢。

会后，代表们接受任务，准备马上动身，计划去四子王旗王府后，首先与来信者毕力格巴特尔、沙木腾、图布新等接头，并通过他们与共产党接触、商谈。

临行前，焦太保借口生病、家里有困难，而没有去。陶德斯琴不知何故，也未走成。这样就只剩下松布尔巴图和我两个人了。我们每人向旗府领了五十块白洋作为路费盘缠，又确定了行程路线，便于阳历七月二十日动身出发。我们沿公路去到包头，正值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绥远和平起义问题。包头人心惶惶，秩序很乱。我俩住宿在关老爷庙，向老和尚撒谎打问：“我们出去游玩一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老和尚示意我们摇签。我们拿起签筒，摇动竹签，任其掉落。老和尚把落在地上的一只竹签拿起，端详一会儿后说：“大吉！大吉！一帆风顺！照你们的路子走下去还行。不过有点困难，但能克服。”后来的情况，正如老和尚所说，但那实在是偶合而已。

我俩离开包头，去到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归绥（今呼和浩特），找到了在省府负责蒙旗工作的总管荣祥，向他说明了此行意图，并求他助一臂之力。不料他的态度是既不阻止，也不支持。他说当前形势复杂，军警很乱。共产党派来代表和省府进行和谈，眼下尚无结果。究竟将来如何，

一时还难以预料。我们向他开通行路条。他说局势很乱，各地称王。省里说话，下面军警未必就听，因此开路条也无用。我们听了，只好作罢。在离开归绥市前，我们听说沿途设卡，把守很严，不准人们到四子王旗解放区去。于是我们扮作商人，坐在一辆拉货的大卡车上，谎称到四子王旗附近的乌兰花去做买卖。不料这一招居然有效，我们凭它混过许多关卡。

从归绥市到四子王旗这段路程只有二百多里，本来只用三、四个小时就可到达。但因路上军警关卡太多，每处都查得很严，以致耽搁了时间，结果走了整整五天。在路过武川县时，城门上有国民党士兵把守，我因一时疏忽，被城门从汽车上刮了下来，摔得昏厥过去。国民党士兵把我拍到医院进行抢救。醒来后，我想这回可招来了麻烦。但出乎意料，竟没有被盘查。第二天太阳快落时，我们去了乌兰花。这里查得更紧。我们住在记不清姓名的一家商号，从这家商号得知，要出乌兰花城，一定得走西门，出了西门再转向北，方可去四子王旗。但要混出乌兰花城，却不容易。于是，我们不得不找人协助。当天夜里，我们费了很大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当地颇有名望的贺喜格达赖家，却遇贺喜格达赖不在。我们只好向他的哥哥如实说明来意，求他设

法护送。那老头儿对解放军很有好感，所以天色刚黑，便出去找人联系。回来后，他让我们明天早晨搭拉白菜的牛车走。第二天拂晓时分，按照老头儿的周祥安排，我赶牛车，松布尔巴图坐在车上，从城里慢悠悠走出。而真正赶车的人却走在后面，他们是本地人，不怕查问。当我们走到西城门口时，岗哨瞌睡打盹儿，迷迷糊糊地问：

“谁家的车？干什么去？”我们按老头儿嘱咐，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贺喜格达赖家的车，拉白菜去！”这样岗哨再没查问，我们顺利地出了城门。直到走出几里以外，后面两个赶车的人才匆匆赶来。这时，各就各位，他俩赶车，我俩坐车，一直向北走去。

到了四子王旗，已经是八月初。我们首先到乌兰察布盟筹备处说明来意。当时毕力格巴特尔和沙木腾等人不在。小特布新、孝顺嘎、额尔敦陶格陶等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给发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和毛主席的一些著作。三、四天后，毕力格巴特尔接见了我们。我们把西公旗的贵族老爷压榨人民，互相残杀和争权夺利的腐败情况以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和平解放的热切愿望，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他亲切地说：“我们反复给你们去信，就是为了把人民群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以后我们采取个人

学习的方法，在这里精心阅读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有关文件，逐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我们的教育更深。特别是在观看了蒙四师文工团自编自演的文娱节目和聆听了蒙四师师长兼政委毕力格巴特尔的多次谈话后，使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更加坚定了我们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心。

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起义。九月下旬，各旗代表陆续到来。乌兰察布盟和平起义谈判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议期间，听取了领导同志关于全国形势和绥远形势及其和平起义的报告，代表们分别诉说了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处，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和平解放，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强烈要求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王公的压迫、剥削，

松布尔巴图代表乌拉特西公旗在会上发言，他把西公旗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作了较为系统、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建议人民解放军早日去接管西公旗王府，使西公旗的人民彻底得到解放。他的发言受到上级领导和全体与会代表的赞同和支持。

会议期间，我们还去早先投奔蒙骑四师的贺

太保等人驻地，对他们弃暗投明之举进行了慰问。

会后，各旗代表接受任务，各自返旗。我们在临行前，毕力格巴特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你们回去后开展工作，困难很多。甚至顽固势力会把你们关起来进行对抗，因此要想达到和平解放的目的很不容易，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付出艰辛的努力乃至血的代价。但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现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你们好好干吧！我们等候后你们西公旗和平起义的捷报早日传来！”

组织上为了我们的安全，让我们绕道山后走旱路返回。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冬衣，每人送了一匹鞍鞴齐全的骑马，给带足路费和马料，并嘱咐我们一旦路费不够，就把马子卖掉，再想办法回去。还派了一连骑兵把我们护送到一百里外的达茂联合旗的边境小白空地。

我们走到达尔罕旗把马子卖掉，由几个熟人给弄来骆驼让我们骑上，并把我们护送到茂明安旗。我们转往东公旗（城库伦）衙门时，东公旗又派人把我们护送到西公旗巴音哈太绅士敖德楞家。敖得楞又把我们护送到苏独仑胡同。

十月下旬，我们回到西公旗衙门，把解放区的情况向衙门内的大小官员们作了详细汇报。在汇报中，只有以陶格陶巴图为首的极少数官员不愿

意听。他们阴沉着脸，很有情绪，所以汇报还未结束，他们就到衙门东屋里另开小会去了。

几天后，绥远省府来文，通知额协理、松布爾巴圖、陶格陶巴圖、焦太保到呼和浩特參觀、學習。烏拉特東公旗、中公旗以及其他各旗的代表也相繼接到內容相同的通知，到了呼和浩特，通知說的是參觀、學習，實際上是被邀請去商議各旗和平起義大事。畢力格巴特爾、沙木騰、圖布新等共產黨方面的許多人与各旗代表正式簽署了各旗的和平起義協議。

起義后，西公旗的額協理、松布爾巴圖、陶格陶巴圖及其漢族參謀四、五人又去烏蘭花參加了烏盟代表大會。会后，由石生榮、韓是今負責組成西三旗工作團。工作團團長由張玉慶擔任；副團長由趙戈銳、松布爾巴圖擔任。團員有從東北調來的蒙漢干部三十餘人。

進駐西公旗的工作團團長是趙戈銳。團員有劉仁龍、吳明、孟和、朗頭、孫迪、寶音扎布等。一九五〇年春，工作團一進西公旗后，即着手進行政權建設工作，開始物色、培訓地方干部。喇嘛扎布、彭任里、華吉爾戈拉、朋斯格巴扎爾、寶爾楚魯、巴音色楞和恩克巴雅爾共七人被派去參加在烏蘭花舉辦的第一批干訓班。

經過緊張的旗政權籌備工作，烏拉特前旗人

民政府于一九五〇年七月十日正式成立。由原管印协理额日和道尔吉任旗长、赵戈锐任副旗长。下设财政科、民政科等科室机构。

政权建设完成后，旗人民政府就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了剿匪肃特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西山咀战斗

赵海拴忆述 张志彪整理

1948年农历九月中旬，由康健民率领的我骑兵一师和三师，同杨成武兵团、绥远军区部队二十七团、九团一起向绥远发起进攻。意图在消灭集宁、包头之敌，促使绥远和平起义。

杨成武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把集宁的敌人包围之后，根据骑兵具有迂回、包围、穿插、奔袭、追击之诸多优势，我骑兵一师和三师奉命在集宁炭窑山阻击敌人三个骑兵师，以配合第三兵团在其侧面打增援敌人，把敌之主力控制在集宁城内，以逐步缩小包围圈，待机全部消灭之。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六天六夜之后，康健民师长命令我们撤到武川待命。

我们急火流星地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日出时分到达武川。在武川休整一天后，康健民命令两师务必在两日内赶到包头郊区进攻包头。我所在的骑兵一师，有四个骑兵团，还有师部直接指挥的重机枪连、炮兵连和特务连（通讯警卫连）。我们当夜离开武川后，路上住了两宿，到第三天

下午两点多钟到达包头城北。和我骑兵一师一起到达的还有骑兵三师。骑兵三师到达包头后，再未向西进军。听说坐阵包头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已经率部向西逃走。我们又行军到昆都仑河西面的乌兰计一带，进行短暂休息、吃饭。政委王再新、副政委李佐玉、政治部主任袁光召集四个团的团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当时担任三团侦察排排长的我和别的团的侦察排长也参加了会议。康师长在会上说：“现在敌人一部分驻扎在哈业胡同一带，以图抵抗一阵，作垂死挣扎；一部分已经向后套逃窜。我师的作战任务是火速行军，在拂晓赶到西山咀，占领西山咀有利地形，在消灭西山咀的守敌后，再向五原挺进，以歼灭敌人后方的守备部队。”李佐玉说：

“我军来自人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俘虏政策。国民党搞欺骗宣传，造谣我军捉住俘虏一律杀掉。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揭露这个反动宣传，以瓦解敌军。”最后，王再新政委强调：“此次会议精神只限与会者知道，不准泄露机密。”

会后，我们分散兵力，以每匹马拉开五米距离的一路纵队向西进军，以防敌人突然袭击。我师三团打前阵，而我所在的侦察排走在最前面。

我们绕道从哈业胡同以南二里多的地方向西行军。这时太阳快落。我们看见我军步兵正在哈业胡同村中和敌人交火。我从望远镜里望到敌人在哈业胡同西边的梅力更庙山坡上居高临下地向我军还击，看样子是掩护大部队边打边撤。战斗进行得凶猛激烈，步枪声、轻重机枪声、迫击炮声混响成一片，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噹儿噹儿”地响。师首长传达命令，让我们往南撤一点儿，拉大距离，以免不必要的伤亡。

到了敌战区白彦花后，天完全黑了下來。为了兵力集中，以便应战，部队由一路纵队合为二路纵队。半夜时分，我们在公庙子和正在向北行进的郝游龙骑兵（从俘虏口中得知）相遇。当时，我军传令准备战斗。郝部以为我们是国民党部队，没有开枪。他们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未答，反问他们口令，他们回答是乌拉特西公旗保安司令郝游龙的部队。我们问他们长官还有谁？他们说，还有双枪女人齐俊峰。其实齐俊峰早被争权夺利的郝游龙杀害。他们是借齐俊峰的威名来吓唬人的。我一听他们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便一声令下：“打！”这股敌人猝不及防，被打得狼狈而逃。我们追在山边，捉住十来个敌人，交给师部。从这些俘虏口中，知道西山咀驻扎着从包头退下来的邓宝珊的一个团的兵

力。然后释放俘虏，让他们进山去告诉郝游龙，赶快出来乖乖投降。不到一会儿，俘虏返回说：“郝游龙愿意投降。让你们进山去跟他谈判。”我们经过分析，认为这是郝游龙畏惧我军压境，不得不说投降。但实际是缓兵之计，以拖延时间，准备逃跑。由于当时我们的任务是进攻敌之主力，不能因小失大，在此耽误时间，而且还得防备敌人埋伏圈套，因此未进山去。

我们摸清西山咀守敌只有四、五百步兵、二、三百骑兵的情况后，师部便决定和一、四团暂时驻在公庙子一带指挥、应战，二、三团由副政委李佐玉率领，分成四路纵队，让当地老乡带路，开向西山咀，在消灭敌人后，从原路返回公庙子，不再向五原进军。

拂晓时，我们赶到西山咀。发现在西山咀东边的卧羊台上有敌人的一个哨兵来回走动。为不暴露目标，我们全部跳下马来。我们侦察排和二、三连（红马连和白马连）徒步拉马上山。侦察班班长李长林走在最前面，他动作迅速敏捷，很快俘虏了这个哨兵。这时，我们也迅速赶上去，向这个哨兵询问敌人的情况，这个哨兵抖儿打颤地交代说，在乌加河（今西山咀退水渠）东边的山上部署着一个步兵营。他站岗处有一个碉堡，住着一个连，正在睡觉。北山上还有两个碉

堡，住着一个营。机枪大部集中在前一个碉堡里。乌加河西岸是团司令部。我们望见一挺机枪就架在不远处碉堡的枪眼处，但听不到里边有动静。于是二连连长尹德胜带领一个排先冲上去。三连连长曹廷云也带领一个排和我侦察排接着冲上去。我们冲进碉堡内严厉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放下武器，优待俘虏！”我们一部分战士用枪逼住敌人，另一部分战士走过去，收缴枪支弹药。敌人吓得魂不附体，身如筛糠。这时，敌人一个副连长拉着一颗手榴弹的导火索。李长林眼疾手快，把他一枪击毙。未来得及扔出去的手榴弹爆炸后，敌人又死二人，负伤五人。而我们只有李长林一人负伤。这次接火，首战告捷。

紧接着，我们又向北边的一个碉堡进攻。由于前一个碉堡里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惊动了附近的敌人，因此北边碉堡里的敌人早有防备，用密集的子彈向我们射击。河西的敌人畏惧我们追过河去，便慌忙把一桶汽油倒在桥上，又堆放了许多柴禾烧着。霎时间，火光冲天，桥面塌陷。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俘虏告诉我们第二个碉堡里有三个步兵连，大约三百余人，受北边营长指挥。碉堡前有两条战壕，战壕里有一连的兵力把守。

副政委李佐玉用望远镜观察后，当即命令：“二团用火力掩护。三团四个连队乘马以散兵队形快速前进到敌战壕前下马，徒步攻打守敌！”话音刚落，二团便用机枪、步枪一齐开始向敌人碉堡与战壕处猛烈射击。三团二、三连乘马举刀冲在前面，一、四团随后冲到战壕前下马，向敌人前沿阵地开火。这时，敌人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进行还击。战场上弹片横飞，烟尘四起。三团团长王月富当机立断命令：“各连投弹能手上来！”我让通讯员分头通知各连。不一会儿，朱三拴、蒋小根等十多名投弹能手跑步上来，他们动作利索，向前冲去，瞬间就接近敌人的战壕，扔出一连串手榴弹，炸得敌人连头都不敢往起抬。我二、三连在十几挺机枪掩护下，趁浓烟笼罩着敌人阵地之机，迅速冲向敌人战壕。二连连长尹德胜和三连连长曹廷云，不怕流血牺牲，冲在最前面。战士们奋不顾身，象猛虎似的一齐冲杀到敌人的第一条战壕，采取速战速决的打法，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很快俘虏了五、六十名敌兵，马上撤回原来阵地。这时候，太阳升起。敌我双方阵地看得清清楚楚。由于土山前地势开阔，没有任何隐蔽之物，而敌人又凭靠碉堡，居高临下，负隅顽抗。这样，我军在开阔地进行仰攻，地形显然于我不利。同时乌加河西

的敌人也向我三团阵地猛烈射击，使我军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李佐玉副政委发出命令：“第二、三碉堡不必攻下。我们不能以大的伤亡换取小的战果。三团立即撤出战斗，返回卧羊台阵地！”在卧羊台阵地上，我们两个团集中全部火力，向乌加河西的敌人猛烈射击。二团一边射击，一边接近乌加河边。河西的敌人一看阵势不好，以为我军要打过河去，于是只留少数兵力作掩护，而大队人马则慌忙向五原方面撤退。因桥被烧毁，我们无法过河追击，战斗只好结束。这时，我们从望远镜里望见乌加河东两个碉堡的敌人，也逃离碉堡，利用土山隐蔽，向山后逃窜。

这次战斗前后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我们集中俘虏，开始宣传。三团政委王弼臣对俘虏讲话：“放下武器，优待俘虏。事实证明我们是这样做的！不要听国民党欺骗宣传。……”战士们还纷纷给俘虏们倒水喝。最后宣布把俘虏全部释放。一个俘虏感动地说：“怪不得你们解放军能打胜仗，把我们士兵也看成了人。而国民党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俘虏老兵还乐呵呵地编了一段顺口流：“杂牌军来了抢，土匪来了刁，保甲长下来把壮丁要。一房高的莫荒滩里冒黑烟，后大套的人民真可怜。剃了头，刮了脸，七

次壮丁把我选。一出后套到绥远，训练三个月上前线。今天做梦没想到，当了俘虏回家园。”

回顾西山咀战斗，我们一共俘虏敌人一百五六十人，打死敌人三人，打伤敌人七八人；缴获十挺轻机枪、二十多支冲锋枪、一百多支步枪和各种弹药几千发。我军只有三人负伤。

中午时分，我们返回公庙子一带。在那里驻扎的师部和一、四团知道我们获胜，已经向东撤走。我们在那里稍事休息，吃了午饭。我们打烂了老乡一个碗，马踏坏了老乡一个箩筐，给赔了两块白洋。在长途行军、战后极度劳累的情况下，我们还给当地老百姓每家每户担了水、扫了院。做到了损坏老乡东西不按价赔偿不走，水缸不满不走，室内外打扫不净不走。老百姓称赞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真是咱们穷苦人的子弟兵。”“乌拉山的松柏春常在，咱解放军的行为真不赖。”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从公庙子出发。天黑时分，在哈业胡同以东，遇见我军参加哈业胡同战斗的步兵也在向东撤走。听他们说打了胜仗，哈业胡同所剩残兵已经进山，往山后逃跑了。我们在包头西南的麻池休息了一夜，未进包头。之后，经莒县到了凉城。在凉城南山上营盘梁村休整了三天，又向张家口方向进军，准备参加即将开始的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开始后，我师奉命在张家口北山一带打外围。

那银泰率部起义

牛宝祥

我认识那银泰同志，是在1949年元旦前后。当时，我在内蒙古锡察军区政治部任组织科长，他率领国民党骑兵十二旅第六团向我军投诚之后，我和他又在一个团共同生活战斗过二年多。文化大革命，他为了摆脱困境，曾来呼市找过我一次。前些日子，我们又见过一面。现在就我所知道的那银泰同志的情况介绍一下。

(一)

1948年冬天，组织上调我到内蒙古锡察军区政治部工作。锡察军区副政委苏克勤同志向我介绍了军区的基本情况。他告诉我，锡察军区是个小军区，下辖两个骑兵师，即骑兵十一师、十六师（后来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第五师）。司令员是乌力吉敖其尔同志，政治委员是奎壁同志（未到职），副司令员是武广义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景平同志（未到职），政治部下设秘书、组织、宣传、民政四个科，当时除秘书科有一个科长外，其他三个科都没有科长，我来了，就任组织科长，兼管三个科

的工作。有事直接向苏克勤同志请示。

(二)

那时锡察军区没有固定的驻地，但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部队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察北十来个旗县。1948年12月下旬，锡察军区在陶林县（现察右中旗）红盘村。这个村有个天主教堂，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天主教堂里。我们政治部机关就驻在教堂附近。

一天，听老乡向我们反映，在四子王旗和达茂旗一带，有一股国民党骑兵部队，他们不抢不夺，看样子是象从国民党部队里哗变出来的。又过了几天，蒙骑四师抓住两个国民党逃兵，他们就是十二旅第六团的，他们的团长叫那银泰，正在寻找我们的部队。

听了这个消息后，锡察军区首长乌力吉敖其尔、武广义、苏克勤同志，让把毕力格巴特尔找来（他的师就驻防在红盘村附近），开了一个小会，就如何与那银泰部队取得联系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研究了办法。参加这个会的还有我和刘峰关等同志。

会议决定立刻派出两名蒙古族同志，先去侦察、联络。这两个同志都叫特木乐。为了区别他们，同志们就叫他们大特木乐、小特木乐。大特木乐蒙文蒙语程度较高，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小特木乐很年轻，是共产党员。记得其中一个同志骑的是黄花马。

很快就传来了消息，说这股部队就是国民党骑兵十二旅第六团，大约有三百多人，团长叫那银泰，他们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部队，要寻找蒙古族自己的部队。我们当时派去联系的人都是蒙古族，锡察军区两个骑兵师绝大多数也是蒙古族，他们一听非常高兴，同意和我们联系。他们提出的条件很简单，说只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杀他们的头，就同意投奔我们。那银泰还说，他认识我们军区的乌力吉敖其尔司令员等不少同志。

过了两天，我们又派双山、扎拉僧两个同志带领一个侦察排去联系。他们和那银泰等人在一个羊场见了面，要那银泰部队向红盘方向靠拢。当时那银泰就率领他的部队跟着双山等同志向红盘方向奔来。那银泰把部队安排在离红盘村三十多里的一个村子住下，自己领着四、五个人来到红盘村锡察军区。当时接见那银泰团长的是蒙骑四师师长兼政委毕力格巴特尔和师参谋长杨生扎布。他们谈了一个晚上，主要谈了那银泰部队脱离国民党的经过。

第二天，锡察军区领导同志乌力吉敖其尔、武广义、苏克勤同志又接见了那银泰团长等人，

并且请他们吃了饭，军区领导同志主要对他们讲了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交待了我军的政策，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持那银泰部队原建制不变，一切待遇将和人民解放军一样。之后，司令部侦察参谋们又和那银泰谈了一天，主要了解国民党军队在乌兰花等地的驻防情况。谈完之后，那银泰团长等就返回他们的驻地，军区领导同志也立即布置受理那银泰团长率部起义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上午，接到哨兵报告，说西北方向有一股骑兵向我们的驻地奔驰而来。我们出去一看，见离红盘村大约还有四、五里的地方，这些人马全都站住了。从中走出十几个人，排成两路，牵着马，缓缓向我们走来，其他人马也随后跟来。走到跟前才看清楚，领头的就是那银泰团长。当时他才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个头不高，瘦长脸，十分精干，他的眼睛不住地向夹道欢迎他们的部队、老乡环视着。

那银泰见到军区首长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有罪的，你们要杀就杀我吧！”他用手指了一下随他来的那些人：“这些都是我的连长和部下，他们都是好人，请不要杀他们。”

军区领导同志乌力吉敖其尔、武广义、苏克勤以及骑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对那银泰团长的

正义行动一再表示赞赏。苏克勤同志说：“我们共产党、解放军说话是算数的，你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是正义的革命行动，是有功的，应当受到奖励。请那团长再不要提‘杀头’二字了。我党我军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将功补过，立大功受奖，革命不分先后。我代表锡察军区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乌力吉敖其尔同志还询问了那银泰团长的籍贯和家庭情况。

经查点，这支部队共200多人，装备精良，每个人都是双枪、双马，有轻机枪十二挺、卡宾枪两支、手枪30多支。据后来了解，这个团在脱离鄂友三部队之前，曾经消灭过国民党多伦县的一个保安团，并将保安团团长伪多伦县长以下8名头领枪决。

那银泰团长当时对党的政策还是半信半疑的，但当他见到乌力吉敖其尔、杨生扎布、关其格、朝鲁等熟人时，感到既新奇，又亲切，眼里含满了泪水。

军区领导同志决定，那银泰团原建制不变，番号为锡察军区独立团，隶属骑四师领导，驻防在红盘村西南的一个村子里。

军区领导同志又单独找那银泰团长作了长谈，并派人给他的部队送去了肉食、白面和慰问信（是用蒙汉文写的）。

那银泰起义不到一个月，就先后打了三次仗，苏克勤、武广义同志都叫那银泰团参加了战斗。打二分子、乌兰花、四子王旗等地时，那银泰团表现得英勇顽强。因为他们是从鄂友三旧部队出来的，不少人都认识，所以他们和鄂友三部李存英团打仗时，把李的团部和卫生队的四、五十人和几十匹马全部俘获，三次战斗，那银泰团共俘敌一百多人，缴获枪支、马匹等不少物资。

(三)

打了几仗以后，队伍开到商都县西井子一带进行整训。据那银泰和一些战士向我们反映，起义的干部、战士思想比较混乱，有的连长动摇，耽心受歧视和不信任。那银泰要求给他的团里也派政治工作干部。

根据那银泰同志的要求，军区领导同志决定派肖成义同志到这个团任政治委员，并给各连配备了指导员。

在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的时候，发现那银泰团多了一个“副团长”。起义的时候没有这个“副团长”啊，从哪儿来的呢？

军区首长毕力格巴特尔师长把那银泰找来一问，他就实说了：“这个‘副团长’叫周凌霄，是我的好朋友。他毕业于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和

我在一起当过副连长，后来就调到上边去了。我的部队起义后，他带着一个人来找我，说是他的警卫员。他让我还回到鄂友三部队去，并保证不会有问题。我说再也不回去了。他说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了，要跟我一起干。我说，你是我的好朋友，和我在一起时又当过副连长，上过军校，又年青有文化，兄弟当团长，决不能让你受了委屈，你就当我这个团的副团长吧！”

听了那银泰的话，首长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下，谁也没有说话，“他是国民党员吗？”毕师长问了一句。

“是国民党员。他还爱搞女人，我讨厌！”那银泰又补充了一句。

毕师长对那银泰说：“自己的朋友来了可以接待，但要及时向组织上报告哟！”就这样，我们默认了那银泰这个“副团长”。

时局急速的变化着，“绥远方式”正在酝酿之中。西至包头，东至张家口，在阴山北面的广阔草原上，有四个骑兵师纵横驰骋，阴山南面驻有大量的步兵师，政治军事形势正在飞速地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一天，苏克勤副政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那银泰那个周副团长是来干什么的，已经比较清楚了。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谁也别想

把那银泰再拉出去”！苏副政委又悄声对我说：

“周要请假探家，顺便送他到察北分区审查，要你执行这个任务，怎么样？”

“组织决定吧！”我说。

苏副政委又叮嘱道：“路上要当心！”

当天下午，苏副政委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见周副团长和那个警卫员也在那里。

苏副政委见我进来，就介绍说：“这是组织科牛科长，认识吧？”

“前几天见过，认识。”周热情地说，并站起来让坐。

苏副政委又对我说：“周副团长要求探家，我们同意了。你不是要到张家口出差吗？”

我站起来领会其意地说：“我去张家口送部队实力统计。”

“那好，你们一起走吧！路上可以互相照顾一下。”苏副政委又转向周副团长说：“按照咱们解放军的规矩，军人探家是不准携带枪支和随行人员的。”

“首长，还是让我带上枪吧，路上确实不安全。这个弟兄，不，这个同志和我是同乡，也多年不回家了，两人走有个伴，还是让我们一块走吧！”周副团长竭力恳求着。

“好吧，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走，但枪支绝不能携带，我们军队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路上不会出什么事的，牛科长和你们同行，他和通讯员都有枪，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周副团长没词了。他和警卫员把佩带的三支枪（一支冲锋枪、一支驳克枪、一支梭子）放在了桌子上。

苏副政委用眼睛瞟了周副团长一眼，慢声细语地说：“把你那支小手枪也交了吧！”

周副团长一愣，右手不由自主地向心口窝摸了一下，马上又笑了，“首长，这是我的护身枪，你就让我带上吧，都交了，那可怎么办呢？”

“交了吧，回来再还给你嘛！”苏副政委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着。周副团长无奈，很不情愿地从上衣内兜里掏出一支勃朗宁小手枪，也放在桌子上。

“好了，去领通行护照和探家的路费吧！”

苏副政委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他们可以走了。周副团长和他的警卫员对视了一下，给苏副政委敬了个礼，就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一起乘马上了路。一路上，周副团长和那个所谓的警卫员耍了不少花招，几次想摆脱我们，独自而去。但是由于我们步步警惕，明劝暗防，使他俩的企图一直未能得

逞。

到了察北军分区，我把周副团长叫到保卫科科长办公室，对他说：“老周，到察北军分区了，你就先别回家了——在这儿把你的身份和到我们部队的任务说清楚吧！”

“科长，你别开玩笑，我们是军区首长批准探家的！”周凌霄大声申辩起来。

“老周，你别急，我说的也是军区首长的意思。”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扣起来？”他质问道。

“说扣也可以吧！”我平静地说，“说清楚以后还可以探家嘛！”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他的警卫员喊叫着冲了进来，“我们副团长犯了什么罪？”

“这里没你的事！你的问题另作交代！来，把他带下去！”上来两个战士，把那个警卫员带走了。这个周副团长坐在凳子上傻眼了。

经过审查了解到，周凌霄也叫周兆民，任过伪军副连长，到那银泰部队之前准备任某师新闻室主任，他找那银泰是企图再把那银泰的队伍拉出去，不行的话，就把那银泰干掉。那个警卫员是国民党员，是来监督周凌霄执行任务的。他们请假“探家”，实际上是想借此脱身。

(四)

1950年12月至1952年春天，我与那银泰同志先后在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十二团、十一团工作。我任团党委书记、政治处主任，他任副团长。

在与那银泰同志相处中，我感到他是一个诚实、勇敢、处事果断的指挥员。起义之后，他立场坚定，真心实意跟党走，既经受了战争环境的考验，也经受了长期和平环境的考验，联系他的家庭和过去的经历，再看看他现在的表现和思想境界，就更加让人感到敬佩！

那银泰同志是哲盟科左中旗人，蒙古族，现年65岁，出身于贫苦牧民家庭。他很小的时候跟着父亲要过饭，他父亲死后，生活无着落，17岁就参加了伪蒙古军。他先在海福隆部队当过排长、连长、团长，后来又在鄂友三部队当了连长、团长。

那银泰为什么要率部起义？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他对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和优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早有耳闻，在思想上受到感召；二是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对他也是个有力的推动；三是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厌恶，他们部队的师长鄂友三，后山老乡都叫他“鄂毛驴”，可见其腐朽糜烂的程度；四是他对国民党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更加痛

恨，一次他们在宣化看文艺演出，台上的演员公开侮辱少数民族，他心里受不了，喝了不少酒，拔出手枪要打那个演员，很多人才把他劝住，他为此一连哭了几天；五是我党我军的统战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在锡察军区的部队里，不少同志是过去伪蒙古军部队的，那银泰同志早就和他们认识，有这么个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投奔我军；六是他有了投奔我军的思想准备之后，在执行鄂友三的命令时，消灭了国民党多伦县一个保安团（一百多人），把杨团长（也叫杨县长）为首的八个当官的全都枪毙了。当时，伪察哈尔省主席极为气愤，要抓那银泰，他不好回去向鄂友三交差，这是他起义的直接原因。

那银泰率部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容易的，对国民党骑兵十二旅是个沉重打击，对我军也是一个鼓舞。在后山一带老乡中，尤其是在蒙古族老乡中，影响是很深远的。就是现在提起那银泰团长的名字来，不少上了年纪的蒙族老乡也是知道的。

那银泰起义是有功劳的，他是在先消灭了敌人一个保安团之后才起义的，所以他的部队过来时都是双枪双马。

那银泰同志起义后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服从组织调动。1952年10月，转业到乌兰察布盟工

作，担任过畜牧处副处长、马场场长、公社副主任等职。后来担任了巴盟乌拉特中旗人大副主任。



孙马宁夏之战始末

沈克尼

按：孙殿英军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河套地区修整后进攻宁夏，最后在磴口县境内被歼。这一历史事件在我盟民众中有一定影响。故将《宁夏文史资料》12辑发表的《孙马宁夏之战始末》转载，以飨读者。

1934年一、二月间，孙殿英和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在宁夏的一场大战，是蒋介石施展两面派手法，利用异己消灭异己而玩弄的一个政治阴谋。当时人们把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叫做“令仇人杀鳞”。孙殿英为了夺取地盘，“三马”则为了保护地盘，便听任蒋介石摆布，互相火并。这场战争，历时三个月，牵动了甘、宁、青三省，在西北乃至全国都震动很大。我不是这场战争的亲身经历者，这篇史料是搜集散存的当时作战的有关文电、作战日记、记者报道及一些亲历其事者的回忆文章和口述记录，缀辑而成，供历史研究的参考。失误之处，在所难免，谨请知情者指正。

一、战争的起因

1933年夏，孙殿英的四十一军离开山西，参加了赤峰抗战后，退到张家口以东的沙城，正与

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商洽联合抗日。蒋介石唯恐冯、孙结合，遂于1933年秋，发表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但当孙殿英向宁夏进军时，蒋又电令西北“三马”堵截。这样既可以防止冯、孙结合，又可使孙、马互斗，坐收渔翁之利。

当孙殿英将部队向绥西开进，准备进军宁夏时，当时的甘肃绥靖主任、节制甘、宁、青三省军务的朱绍良，最初持“袖手观变”态度。直至西宁马麟、宁夏马鸿逵先后去电，表示反对，朱绍良方分别向南京军委会、行政院请示应付办法，但均未获复。嗣后，接到北平军分会何应钦电告：

“中央已任命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准带整编三师连同技术杂工人员共三万余人，经宁夏赴青海就任。请飭沿途军政机关、部队予以便利，并在可能范围内酌予协助，俾利进行。俟抵青时，并飭青海军政当局妥予划垦区，由孙自组屯垦督办公署，俾资工作。”

朱绍良接电后，即分别命令甘、宁、青三省政府及沿途驻军一体秉承。

这时，孙殿英已将部队开到绥西五原、临

①据邢邦彦先生稿本《我在孙殿英进攻宁夏战争中的一些见闻》。

河、陕坝一带，司令部驻在包头。收编了绥西骑匪杨耀峰（杨猴小）。孙殿英当时的打算是，先整顿队伍，积极练兵，待黄河结冰后，以绥西为根据地，逐渐向西北发展。与此同时，孙又积极与各方面拉关系，各方面也派有代表与孙接洽。如广东方面、福建人民政府，改组派，CC等，都有代表驻在包头。北平军分会也派高占魁驻在孙处。孙还聘请共产党人南汉宸做他的高等顾问。②

当时绥远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孙殿英久住绥西，对阎构成了威胁。他为了诱孙早日离开绥西，以支持为名，命令其骑兵司令赵承绶秘密从大同军械库中拨给孙部迫击炮弹五千发、手榴弹三万颗、步、机枪弹五十万发；同时，又命令所属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等部，在三盛公一带驻防，如孙军从宁夏后退，即就地解决。

孙殿英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要趁机占据整个

②米哲沉著《杨虎城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孙殿英的西进取得了杨虎成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合作，有南汉宸、常黎夫、崔孟博、刘继曾等人，随同孙殿英任联络工作。原拟俟孙军进展到一定地点后，杨的部队开始动作，并联合红军三面夹击，以摧毁宁青回军的反动势力，然后由杨和孙发出联名通电，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电报稿子已拟好并经孙殿英签字送到西安，等候拍发，后以孙的失败而告终”。

西北。他在向部属下达的《注意事项》中说：这次作战是“为自己找家”，“是为找出路而战”；规定：遇到青海骑兵就说我们是好朋友，请你们回去，我们决不到青海去。③当时一些报刊杂志的记者也报道说：“传孙委任刘月亭为宁夏主席，杨干卿为警备司令，于世铭为青海主席，孙本人兼甘肃主席”。④

面对孙殿英咄咄逼人的气势，马鸿逵极端恐慌。他一方面联合青海马步芳积极准备迎击，一方面急电朱绍良请示应付办法。电报说：“孙殿英已在绥西后套一带招收杨猴小匪部，并联合东北军某部共约十余万之众。武装整齐，枪械精良，并有山、野炮等重型武器不少。无技术工人及垦务工具，不象去青海屯垦模样。究竟如何应付？请示。”朱绍良接电后，派绥署总参议张春圃乘飞机赴北平面谒何应钦。而此时，孙殿英的部队已经按计划向宁夏开进了。

蒋介石见孙、马双方已经接火，遂授意行政院撤销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兼职，并命令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制止孙部西进，撤回磴口以北缩编。何遂令停止对孙军的一切供应，并分电

③见《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七分册《绥靖》。

④见《新中华》杂志1934年2月25日《孙马冲突愈臻严重》。

甘、宁、青军政首脑及孙军各部主官：

“查孙擅行进兵，袭取宁夏近郊与第十五路军对战中。孙魁元（孙殿英名）着免去北平军分会委员及四十一军军长、四十师师长各职，第四十一军及第四十师番号着即撤销。所有原第四十一军所属步兵部队着交丁旅长綽庭、刘旅长月亭指挥，编成三团；其所属骑兵着交由于副军长世铭指挥，亦编成三团。均归军分会直辖，退集磴口以北地区切实整理。……”⑤

然而此时孙殿英自恃兵力雄厚，武器精良，满以为可以一鼓击败“三马”联军，直趋甘肃，那里肯听何应钦的命令。

一九三四年元月十三日，蒋介石电令马鸿逵、马步芳等堵截孙殿英的军队。电称：“孙魁元部，前已明令暂时驻原地候令，如擅行冒进，除另电制止外，希秉承朱主任命令，尽力防堵，勿稍瞻顾为要！”

十四日，朱绍良也电令西北诸马说：

“孙部抗命西进，侵占磴口，勾结‘匪共’，扰乱地方，自应作正当防御，予以痛击。兹派马鸿逵为左翼军总指挥，马鸿宾为右翼军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右翼军总指挥，马步芳为总预

⑤见《新中华》杂志1934年2月25日《孙马冲突愈臻严重》。

备队总指挥。除分令外，特电查照。”⑥

在蒋介石的操纵导演下，孙马宁夏之战的序幕拉开了。

二、双方兵力及作战部署

孙殿英方面：孙部进攻宁夏的前敌总指挥为刘月亭，下辖四十一军，骑兵军及杨耀峰（杨猴小）的骑兵师。号称八万之众，（实际只有六万余人）。其部队建制⑦如下：

首先攻占石咀山，掩护大军集中后，先以平罗为进攻目标，分三路进军。中路直攻平罗，左右两路深入平罗以南，消灭自平罗败退的马军。骑兵迂回至平罗至宁夏城之间，扰乱和阻止马军增援部队。攻占平罗后，以主力进攻宁夏城，骑兵于击溃马军骑兵后，深入至广武、中卫，切断马军退路，截留辎重军火，并警戒甘肃援军，以便主力将“三马”部队聚歼于宁夏城及其附近地区。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孙殿英命令所部补充旅旅长颛孙子瑜，率领两个步兵团于十一日晚出发，星夜急进，于十二日晨占领磴口，待后续部队丁綽庭的第一一七师先头部队到达磴口时，继

⑥见《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七分册《绥靖》。

⑦见陈学浩撰《孙部进军宁夏纪事》载1934年《西北问题》。

——七师师长丁守庭——	——第一旅旅长夏维礼——
	——第二旅旅长杨干卿——
	——第一旅旅长魏子敬——
——八师师长刘月亭——	——第二旅旅长卫日恭——
	——第三旅旅长刘月亭(兼)——
	——第一旅旅长窦幼卿——
	——第二旅旅长鼓筱秋——
——九师师长卢丰年——	——第三旅旅长谢璞田——
	——补充旅旅长颢孙子瑜——
	——特务团团长王遂庆——

四十一军
 军长孙殿英
 副军长谭松胞

——炮兵司令(旅长)刘广德——

— 骑兵第一师师长(不详)

— 骑兵第二师师长赵旺增

— 骑兵第三师师长石文华

— 骑兵独立第一旅旅长李纯华

— 骑兵独立第二旅旅长吕存义

— 骑兵师师长杨耀峰(杨猴小)

— 骑兵司令高霞轩

骑兵军
军长于世铭
副军长徐理中

孙殿英的作战计划，据马鸿逵《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七分册所载缴获的孙军合同命令规定，概要如下：见78页

向石咀山进发。命令杨耀峰（杨猴小）的骑兵师进攻石咀山，待步兵赶到接防后，继续向平罗前进。于世铭率骑兵第二、第三师及骑兵独立一、二旅于十二日晨，由渡口堂出发，经河东沃野（今陶乐县）向平罗、宁夏城之间的李岗堡一带迂回，截断马军的退路。

马鸿逵方面：以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为首组成的甘宁青拒孙联军，以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部队为左翼军，以邓宝珊的部队为右翼军，以胡宗南的第一师为总预备队（时驻天水一带）。其战斗序列⑧

马鸿逵军作战部署

西北诸马抗击孙殿英的作战部署，曾由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会商过多次，但均未取得一致意见。有的主张：由石咀山起，经黄渠桥、李岗堡之战，各部署相当兵力，并在贺兰山根的洪广营一带配置大部骑兵。河东方面，因黄河尚未封冻，孙军不易强渡，不必设防。有的主张：在平罗、谢岗堡各部署一部分兵力，而把绝大部分兵力摆在宁夏省城附近。会商结果，最后同意了宁夏省保安处处长马全良的作战方案。马全良

⑧见陈学浩撰《孙部进军宁夏纪事》载1934年《西北问题》。

认为，孙军虽号称八万，实际只有五万左右⑨。

“三马”兵力共有三万余人，力量悬殊。必须灵活运用兵力，才能战而胜之。如果兵力过于分散，就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而被敌人各个击破；如果兵力太集中，敌人又会到处活动，也难以应付。因此，马全良主张在磴口部置少数骑兵，在石咀山布置一个骑兵团。磴口的骑兵若发现孙军偷袭，即刻撤到石咀山，连同石咀山的骑兵一同布防。若孙军先头部队为少数骑兵，就立即应战，兵力大时，就撤至贺兰山根的洪广营一带，俟孙军向宁夏城进攻时，威胁其右翼。平罗方面，驻一个步兵旅固守城池，作为支撑点。李岗、谢岗堡等处，不派驻固定兵力。其余部署在省城周围，相机战守。

根据马全良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案，马军兵力部署大致如下：

在平罗一带置步兵一个旅（两个团），平罗城内步兵一个旅，清水堡置步兵一个团，张政桥置步兵一个营，新城置保安处全部（步兵两团、骑兵两个大队），主力在宁夏城内及其附近地区。石咀山、宝丰、黄渠桥、大洼口间，通伏堡、姚

⑨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马全良撰《甘宁青三省合拒孙殿英战事的回忆》。另据孙军杨干卿旅参谋长王柏祥说，孙军号称八万，实际只有六万余人。

伏堡间，清（新）水桥，保家户，通昌堡，潘昌堡间，各置骑兵一个团，定远营置骑兵一个营。

三、作战经过

一九三四年元月十一日夜，孙殿英部王遂庆特务团及杨耀峰骑兵千余人，进占磴口，十三日攻占石咀山。十九日，孙部一一七师、一一八师各派一个旅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平罗城。

平罗，是当时宁夏北部最大的县城，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军事重镇。东临黄河，西靠贺兰山，唐徕渠流经南、东而北去，是孙军进攻宁夏的必经之处。防守平罗城是马鸿逵部马宝琳的独立第二旅。

平罗城仅南北两面有门。城北积沙几与城墙齐高。为此，马军在城外四周挖了一条两丈宽的护城壕，将南关的商店民房悉数拆除，命令百姓一律迁入城内。拆房的木料用以构筑防御工事。马宝琳在城外玉皇阁布置了一个连；在王家寨子布置了一个连，其余兵力全部守城。

元月十九日夜十时，围城孙军一一七师杨干卿旅首先在城西打响。但因该旅攻击点，正处于马军玉皇阁、王家寨子两个防御支撑点的交叉火网之中，故伤亡很大。孙军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架云梯奋勇爬城。城将破时，守军旅长马宝

琳用手电照看城下，孙军却误以为自己军队已胜利登城（孙军原定登城后，以手电为联络信号），即停止炮击。马军趁机反击，歼灭了接近城垣的大部分孙军。⑩

孙军围攻平罗多次失利后，遂变更计划，留四团兵力围攻平罗，主力于元月二十四日南下。一一七师杨干卿旅攻姚伏堡，一一八师一个旅攻占五香堡和通城堡，均一鼓攻下。

二十六日夜间，围攻平罗城的孙军，除留颀孙子瑜旅外，其主力一一七师、一一八师及炮兵旅，由刘月亭指挥，利用唐徕渠背作掩护，从渠中秘密南下，直扑宁夏城。

元月二十七日拂晓，孙军主力进至宁夏城北的满达桥及其以东的李家寨、马家寨、许家庄一带，其先头部队进至城西北的大小礼拜寺及城西唐徕渠一带，并开始架云梯猛攻宁夏城。马军守城部队全力抵御。同时，马英才旅出省城北门，协同保安处马全良的两个团沿唐徕渠向孙部攻城部队的左翼迂回攻击；卢忠良旅由丁义堡向南包抄孙部后路；青海军的韩起功旅进至满达桥，向孙军右侧攻击，对攻城的孙军主力形成全围之势。经过激烈战斗，双方伤亡数百人。马军保

⑩据马宝琳稿本《孙殿英攻宁夏的平罗之战亲历记》。

安处处长马全良进攻满达桥时左肋负重伤，副处长韩义斯麻阵亡。孙军退据城西北满达桥一带。

元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四日，孙军在接连失利伤亡较重的情况下，急图一拚。二月五日拂晓，夏维礼的加强旅由新城西南绕至唐徕渠西岸，从西南方向发起猛攻，又被守城马军击退。马部卢忠良、马英才两旅，趁机出城沿唐徕渠向孙军左右两翼迂回。此时，孙军夏维礼旅已撤退，马军包围了孙军一个未及撤退的步兵营，五百余名官兵全部投降。

二月十日拂晓，孙军再次组织全线进攻。此时，蒋介石看孙殿英败局已定，派飞机三架，自兰州起飞，轰炸孙军指挥部驻地李岗堡、满达桥一带。马军士气为之大振，孙军攻城又告失败。

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双方调整部署，无大战斗。孙军前敌总指挥刘月亭因指挥攻城屡遭失败，二十二日被孙殿英撤职。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孙殿英亲自组织部队进攻。孙军主力两次猛攻马军北塔阵地，激战两日，终被击退。

二月二十六日，阎锡山派其第七十师王靖国部接防临河。其先头部队已按二月十七日何应钦、傅作义、徐永昌、商震、蒋伯城等在北平居仁堂商定的剿孙计划①，进至三圣公附近，对孙

军形成夹击之势。同时，一直在甘肃平凉一带观望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师袁璞旅到达中卫，待机坐收渔人之利。

在此期间，孙军内部矛盾日深，各部主官相互猜疑，上下离心。马军趁机积极分化瓦解。结果，孙军驻梁渠稍的于世铭骑兵军撤出战斗；独立第一旅李纯华部，经北平军分会派来的马愚忱说服，于三月十三日宣布中立，听从国民党中央指挥。十八日，丁綽庭与马鸿逵协商后，也退出战斗，听从中央调遣。一一七师第二旅旅长杨干卿，后来投降了马鸿逵。

十九日，孙殿英由于丁綽庭、李纯华部中立，骑兵军于世铭部已不听他指挥，便在郑家油坊召开团长以上紧急会议，下达了向后套总退却的命令，于当夜全线撤退。第二天，马鸿逵分兵

①据1934年2月25日，《新中华》杂志记者报道：“阎锡山于晋方面态度已于中央一致，阎并派傅作义，徐永昌赴平谒何（应钦），全权代表商洽围剿孙部详细具体办法。十七日晨，何召傅作义，徐永昌，商震，万福麟，秦德纯，蒋伯诚在居仁堂会剿孙计划。决定晋绥军担任东北两路，甘宁青部队担任西南两路。晋绥军开拨费，兵站，给养，弹药，运输等事宜亦经商定，决定兵站设大同，绥远，包头等处。”该杂志于1934年2月28日又报道：“晋绥军准备向三圣公、磴口猛进，其先头部队已靠近黄河岸。……陕杨虎城令二十四师冯钦哉部，全部开陕北延安一带，以防孙军南窜。”

三路追击：右路沿汉渠，左路沿唐徕渠，中路由中央军第一师袁璞旅担任，沿宁平公路向平罗攻击前进。马军骑兵沿贺兰山麓向石咀山迂回堵截，蒋介石的空军亦配合地面行动，进行轰炸扫射。被围困两个月的平罗城遂告解围。

孙军残部由石咀山、磴口退至绥西后，被阎锡山预先布置好的晋军全部缴械。除将刘月亭、卢丰年部缩编为两个旅外，其余均补充晋军。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的部队不仅全部满员，而且每个班都有备补兵几名，孙殿英本人也被阎锡山软禁在太原的晋祠。至此，由蒋介石精心策划，历时三月之久的宁夏孙马之战遂告结束。

转自宁夏《文史资料第12辑》

国民党在河套的建立与活动

刘培荣

一、派系之间的倾轧角斗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提出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即国民党进行改组，实行国共合作。

会议通过“制定党歌案”，在黄埔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李大钊负责的北京执行部，领导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甘肃、青海、新疆、蒙古等十省区，指导、监督各地党务。

是年秋，李大钊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名义，派吉雅泰、任殿卿莅绥筹备成立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有杨绍萱、路作霖、杨晓曙、纪亮、焦守显。除后两人外，其余都是共产党员。那时，CC系的潘秀仁、赵允义及李正乐出头露面，而北京大学毕业的纪守光和包头中学的校长陈国英却

初露头角，并以爱捣乱出名。

国民党绥远省党部首先在归绥建立了市党部。接着在包头创办了《西北民报》，由蒋听松、胡英初主办。这是一张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报纸，虽然篇幅不大，却颇有影响。同年秋，冯玉祥由苏联回到五原，报社亦迁五原，并参加了“九·一七”誓师大会，随冯玉祥将军挥师北伐。当冯率部西开后，包头、五原、临河则为阎锡山的晋军和张作霖的奉军所占据。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作出反共决议，接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自此国共合作破裂。而绥远省党部的主要成员焦守显、纪亮、陈国英、纪守光等，在“四·一二”政变后，则伙同潘秀仁、赵允义、李正乐、张遐民组成清党委员会，负责清除共产党在党政机关和文教界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在清党中以反共起家，成为当时绥远省国民党内的显要人物。这年后半年，奉军进入绥、包头及河套地区，国民党省市县的负责人先后跑掉。

1928年北伐以后，祁志厚当上绥远省国民党的头目，他同省党部的其他主要成员焦守显、于存灏、杨令德、张国宝、陈志仁以及在归绥市党部担任常委的刘桂、刘士琦，教育界的阎伟、白映

星、霍世贤、阎秉乾、唐诚斋等人结成一派，即所谓的祁志厚派。这些人大都是祁志厚的同学、同乡和他的学生。后来焦守显从祁志厚那里分裂出来，另树一帜，打起焦于（存灏）派的旗号，公开形成了祁焦两派的斗争。祁派与焦派之争，是有其政治背景的。祁志厚属于汪精卫系统的所谓改组派，而焦守显那时走的是陈果夫的门子，靠近蒋介石一方，所以绥远的派系之争，实际上是和国民党中央内部的斗争相联系的。

1929年，焦于派在绥远搞垮祁志厚之后，潘赵派才介入省党部，把党权拿到手。此后，焦守显、于存灏和阎锡山挂上钩，参加了1930年阎冯反蒋的扩大会议，因有阎锡山为其撑腰，遂在绥远省国民党上层形成与潘赵派对立的势态。

同年1月，绥东五县由察哈尔划入绥远后，以张钦为首的东五县派，则和祁派、焦于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潘赵派，使潘赵派越发显得势单力薄。虽然潘赵在归绥、包头有一定的实力基础，但在祁焦于张的合力攻击下，处境很难。张钦出任绥远教育厅长后，让班浩、刘汉分任归绥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校长，祁焦派的白映星为中山学院院长，杨令德为绥远党报总编，樊库任民众教育馆馆长。

是年阎冯反蒋战事在中原大战中受挫，张学

良以调停之名，率部进入平津。阎冯宣告下野，扩大会议和它所产生的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对抗的北平国民政府随之垮台。10月末，潘秀仁、赵允义返绥远，和陈国英成立了新的绥远省党部，把焦于派的人排除在外，并让贾武、苗英、李桃园分任包头中学、职业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1931年，又由郭象友等发起，创办了私立正风中学，由纪守光实际负责。派侯璠担任了归绥中学校长。并由省党部委员陈国英兼任宣传部长及《绥远民国日报》社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绥远的国民党虽然声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强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国，”实则内部互相倾轧，各自争雄，搞得四分五裂。是年，绥远省党部在河套地区的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局，先后派来党务筹备员，进行党员登记及组建党事宜。

1932年，在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为了拢络人心，提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让汪精卫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就任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晋绥两省，并提出“实业救国”与“开发西北”的口号，动员内地人民到绥远投资。为了开发河套，由军人组成屯垦队进套开垦，并在包头设置“屯垦督办公署”，阎锡山

为督办，王靖国担任会办，负责领导屯垦工作。

1933年潘秀仁在国民党中央CC系的支持下，继张钦当上教育厅长，祁、焦、张、于采取联合行动，想把教育厅的权力夺回来，在焦守显的主持下，发动归绥各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砸了教育厅，并把潘秀仁续弦不久的洞房也给砸了个乱七八糟，潘在仓惶中越墙而逃，躲到建设厅厅长冯曦家里，潘的新婚妻子郭佩兰也回到娘家暂住。在地方派系的纷争中，傅作义主席还兼了几天教育厅长。

同年，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在五原、临河正式成立了直属区分部。五原县由曲步霄任常委，辛崇业、谢景开、刘笃仁为委员，临河县由王世重任常委，赵攀云、库培禄为委员。安北由齐寿康任党务筹备员，积极开展地方党务活动。吸收党员，侧重于政教两界人士，党的活动以学校为主要场所。从此国民党人在河套五、临两县的公开场合才不时露面。并在集会时，宣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孙中山著述，以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影响。后因派系角斗加剧，造成直属区分部组织涣散，党务活动陷于瘫痪。

1935年，在日本无理要求下，按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取消了华北各省市及地方党部，停止了国民党在华北的一切公开活动，潘赵派的

绥远省党部及所属县市党部转入地下，国民党在河套地区的党务活动也随之销声敛迹。

二、河套各县的党务恢复及其活动：

1939年2月，傅作义率部进套后，绥远省政府亦从榆林迁到陕坝。傅作义以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之名义，恢复了1935年根据“何梅协定”而被停止活动的党务机构，并经请准国民党中央，指派张遐民为省党部书记长，赵仲容为监察专员，潘秀仁、辛崇业、耿正模、吴桐、王华灼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指派赵攀云为临河县党部书记长（1940年后由祁继先接任）；李树茂为五原县党部书记长（后由白焕瑜接任）；柴生华为安北设治局党部书记长。他们各带工作人员二三人，分赴各县局建立党部，并在开展党务工作中，就地取材，物色适当人选，逐步充实党务机构。当时正在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整顿党务要点，要求在最近一年内，将有组织、有训练、对三民主义有坚定信仰的党员，在原有党员数的基础上，（即通过调查登记后的底数），增加一倍以上。根据这一要求，各县局党部在重建与整顿区分部的同时，首先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动委会中展开了强拉硬征的吸收党员工作。尤其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皆被列为吸收入

党的主要对象。在登记党员的过程中，随之重建党的区分部基层组织，指定各该区分部负责人。并以“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付诸实施，作为党务工作的重点。同年7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姚大海来河套视察工作后，傅作义即将在其管区内从事抗日工作的共产党员潘纪文、武践实、黄剑拓、李萍等礼送出境，转回延安。（这些人原系傅作义商请中共给派来的干部）。

1940年3月23日，傅作义光复五原后，河套地区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则通过报刊、广播、集会以及街头演说等，大肆重弹抗战以来的基本国策，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之要求。并在城乡机关学校所出的壁报和黑板报上，极力鼓吹“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党”的三一原则和抗战的胜利取决于军令、政令的统一”。为此在各县党部的指导与政府的领导下，设立了社教推行组，组长必须由国民党的骨干分子来担任。社教推行之目的，是为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限制异党活动制造舆论，确立社会基础。

1941年，为强化地方党务，建立特工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张庆恩来绥，担任省党部书记长兼调统室主任，并加派省府秘书长曾厚载为

副书记长。与此同时，绥远省党部在陕坝及各县的组织机构也相应地加以充实，执监委人事配备亦有所增加。其省党部在陕坝的机构人事是：主任委员傅作义，书记长张庆恩，副书记长曾厚载。

执行委员会委员：潘秀仁、张遐民、辛崇业、翟庭实、耿正模、王华灼、吴桐、高乐山、陈国新、陈国祯、邱明星、赵励师。

内设组织、宣传、社会、总务四个科和会计、人事两个室。

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莫淡云，副主任委员段锦华、卜效霞。

监察专员办事处的专员兼处长赵仲容，副处长张登鳌。内设三个科，分管各项业务。

调查统计室：主任张庆恩，副主任张忠一。附设战青团，负责管训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

是年7月9日，在陕坝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绥远支团筹备处。由傅作义兼任指导员，省府民政厅长袁庆曾兼筹备主任，赵仲容为书记。下设组训、宣社、总务三个组，每组设组长一人、主任组员和组员4—6人。从而在河套地区开始了盛及一时的团务活动。

河套地区为确立战时经济体系，以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加强经济管制，实行统制经济。并以粮食上的三一原则，贯彻粮食管理政策。同

时在各中小学强化了训导工作的职能，各学校的训导主任或训导员，必须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为了保证国民党中央和傅管区的政令贯彻执行，对省县政府的人事机构亦作了相应的调整。通过调整，密切了党政关系，增强了傅作义对党政军团一元化领导的权威。

河套地区的国民党省县党部，鉴于一党专政，限制异党活动的需要，在张庆恩的操纵下，大力发展中统特务，然后将他们安插到军政部门、机关学校、社会团体，披着公务人员的外衣，进行秘密侦察勾当。另外还派身穿便衣的特工人员，混在群众活动的各个角落，监视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行。

1941年，为强化特工效能，在陕坝东北五里处的张维世圪旦，成立了“绥远省战时青年训导团”，指派调统骨干张忠一为主任，随后又加派自首分子陈又新为副主任，樊洙亭任总干事，对逮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和进步青年实施管制教育。就在这年，他们对河套地区的共产党员大加清洗，不论是在抗日初期国共合作时已公开了身份的或隐蔽工作的共产党人，一律予以捕讯。凡共产党员若不悔过自新，声明脱离共产党的，要停止其职务永不录用。当河白色恐怖弥漫套地区时，校址在临河县四区境内梅令庙的“国立绥远中学”，

按照调统开列的黑名单，先后逮捕了该校师生60余人。在管训期间所讲授的课程有：《总理遗教》、《三民主义》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传材料及各国法西斯反共理论摘编。还有托派叶青所写的专著及其论文。并用强制手段，让每个被管训的学员填写“自首书”、“保证书”、“悔过书”，并登报声明表态，宣誓永远忠于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服从长官意志，为完成抗战建国而效力。在五原、临河、陕坝、安北等地工作的县乡行政人员，尤其是动委会干部，被捕者时有所闻，为数将近百人。就连在五原战役作战有功的203旅一团副团长梁伴池，也因涉嫌而被捕。一时间，把整个河套地区搞成乌云压顶，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

1942年6月，国民党在河套实施“新县制”，省政府在原来五、临、安三县局的辖境范围内，又增划出米仓县、狼山、晏江设治局、陕坝市政筹备处。随着“新县制”的开始，国民党县局党部也作了相应的人事安排，指派高光耀为米仓县党部书记长，白焕瑜为五原县党部书记长，柴生华为安北县党部书记长，杨一民为临河县党部代书记长，祁继先为狼山设治局党部书记长，李达唐为晏江设治局党部书记长，董淑民为陕坝市政筹备处党部书记长。同时，三青团也指派

分团筹备主任或团务筹备员，分赴各县局建立团组织，开展团务工作。

1943年杨一民、祁继先、董淑民调到陕坝省党部另作任用，所缺临河、狼山、陕坝党部书记长职务，分别由王炜、赵士英、赵浩然接任。当时的党团工作，以建立与整顿组织、健全机构、充实基层、严格防共为主要要求，对推行实业计划、地方自治、加强乡政之管教养卫、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等，则视为配合县局施政的辅助任务。并采取以党、团、政府三位一体，发动社会力量，协同一致，用管制经济的手段，设法解决物资缺乏、物价上涨的困难问题。

各县局党部为配合“新县制”的行政工作，促进“管教养卫”之付诸实施，以求强化兵役、粮政、治安工作起见，其党的机构和人事编制较前有所扩大，一般都设书记长一人、秘书一人、干事和助理干事各三人、指导员一人、工勤二人，共计十一人。分工掌理组训、宣传、社会、总务等项工作，并指导与视察基层区分部事宜。

组训工作的职能是：发展党员，建立与指导基层组织，确定吸收党员的计划 and 对象，办理入党手续，考核党员等工作。并以三民主义、总裁言行、总理遗教、党员须知、政治时事等为训练党员之教材。而党员守则十二条（附后）作为鉴

定鞭策党员之行动准则。

宣传工作依据上级党部下发的宣传要点，时事详述、政策法规等，利用集会、社教场合、文体活动和墙报等形式，随时进行宣传。

社会工作以推行社教，掌握工会、商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等人民团体的动向，以及对不法会道门的管制、教育、取缔等。

另外各县市党部附设党政联席会议，1944年改称为党政特种会报。规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必要时可随时召集。会议内容以密切党政关系，协调工作，防共反共，互通情报，侦讯敌特，防奸除奸，对政治性案件进行会商处理等。特种会报的法定参加人是：县长、协理县政、党部书记长、团务筹备主任、国民兵团长副团长、警察局长、民政科长、当地驻军首长、军警宪联合稽查处负责人。会议召集人及主持者，明文规定由各县县长担任，或委托党部书记长代行召集与主持会报。必要时，可让县党部秘书、三青团书记、县政府秘书等有关人员列席。会议时间一般不超过四小时，特殊情况亦可延长。

各县市的特种会报，是在省部统的指导下，以防共、肃奸为主要内容，是党政军团民警宪联合办事之特异形式。对特种会报决定的事项、上级下达的保密文件，均由县党部责成专人管

档。当时在河套地区的省、市、县各级党政军机关，都要执行“绥远省联合反共特种汇报会议”的各种决议和命令。因张庆恩兼任特指处处长，于是更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反共活动，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制造反共事件，破坏中共河套地下组织，迫害地下工作人员。

特种工作指导处从1944年春成立后，名义上和绥远省党部调统室是两个系统，而实际上它和省党部调统室的工作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并把它活动范围由地方扩大渗透到军队里。

1944年下半年，河套地区省县党部根据国民党中央五届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一贯方针和全会提出的五项任务：即加强战力，争取胜利；巩固经济，稳定物价；提高行政效率；加紧推行地方自治，健全民意机构；厉行法制，保障民权。对上述五项任务，河套地区的党政军团在傅作义的一元化领导和统一部署下，通过报刊、广播、集会、讲演，壁报、墙报、标语口号和总理纪念周等形式，大肆进行宣传。要求一切力量均应为达成军事胜利而作贡献；一切设施均应集中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并从省党政机关抽调部分干部，组成党政总队，在陕坝经过短训后，分别派赴与沦陷区毗邻的前沿地区开展敌伪工作和反共、民运

及情报工作，为恢复沦陷区的政治实施作准备。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加强物价管制的紧要措施。

1945年1月，第八战区党政总队正式成立，张庆恩为总队队长，柴治堂任副总队长，下设总务科、情报科、指导科和秘书室，其人员基本上是调统室特工处的旧班底。该总队直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董淑民，第二大队长杨格非，第三大队长祁继先。这是一个在中统特务指挥下的武装性特务组织，它在邻近地区分设五个活动据点：陕北据点设在榆林，主任祁继先，对外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榆林办事处代处长身份作掩护；晋西北据点在河曲，主任陈元夫，后为刘毅佐接任；伊盟十里长滩据点，主任鲁凤昌；大青山据点主任王明中；绥东丰镇据点主任贺凤午。各据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日伪占领区和中共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侦察、破坏、搜集情报、策动伪军反正及人民武装哗变。并设法在敌伪区和中共抗日根据地建立内线特务。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河套地区也选派了王玉宾、赵仲容、潘秀仁、辛崇业、白焕瑜等人参加。大会通过的政纲、政策和宣言，表示对中共问题要在“不妨碍抗战，不危害国家之范围内，通过协商，寻求政治解决”。于是国民党在河套地区的省县党

部，则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此作了大肆宣传，用以愚弄社会公众。

是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驻在陕坝的绥远省党团组织，亦配合军政东进接收，抢夺胜利果实。当省党部即将迁回归绥时，对河套地区部分县党部书记作了一番调整。如将米仓县党部书记长高光耀调回东胜县任书记长，遗缺由狼山县党部书记赵士英接任；狼山县党部书记长由李生祥接任；五原县党部书记长白焕瑜调到“绥西四首制石闸委员会”担任总务处处长，遗缺由安建国接任；晏江县党部书记长李述唐另有任用，遗缺由张鉴三接任；安北县党部书记长柴生华调往归绥市任职，遗缺由田增接任；陕坝市政筹备处党部书记长由张如春接任。同时随着收复区政权的建立，指派在陕坝从事省党政工作的刘效贤为包头市党部书记长，张国宝为萨拉齐县党部书记长，弓国华为归绥市党部书记长，高玉璧为武川县党部书记长，弓志中为集宁县党部书记长，将米仓县党部秘书司岩阁调升为丰镇县党部书记长。其他收复区各县也均分别指派了书记长人选，前往建立党部，开展工作。上述人事安排，系由当时省党部书记长王玉宾在陕坝与地方各派系磋商后，提交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决定的。河套地区各县党部负责人调整后，其中心工

作除推进地方自治，协同政府成立县参议会外，则以发展党员为主要任务。按照当时上级下达的在1946年各县新增党员的任务是：米仓县800名、临河县800名、五原县600名、狼山县500名、晏江县400名、安北县400名、陕坝镇300名。上述任务要求在年底以前务必完成。为此各县不择手段拉人入党，不但入党手续从简，而且弄虚作假严重，以致把机关、学校、社会团体、乡镇保甲人员、自卫队员、警察、乡保警等，统统按照在册名录，除去已入党者，完全填列为发展党员的新增数，以此欺上瞒下，蒙哄交差，求得上级的嘉奖。结果河套各县确有不少党员虽然注入名册，但却没有发给党证，甚至本人并不知晓。

1946年在大力发展党员的同时，又重申陈规老式，强调每星期一必须举行“总理纪念周”，下令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必须一律遵照执行。纪念周程序为：一、全体肃立；二、唱国歌（即国民党党歌，歌词附后）；三、向孙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四、静默三分钟（每个与会者各自默读总理遗嘱，全文附后）；五、精神讲话，由当地党政军团负责人轮流来讲。讲话内容以孙文学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总裁言行、政治时事、政策法规等为主。

1946年秋，河套地区各县党部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经省党部批准，正式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委会的日常业务工作，授权书记长处理；重大问题经执委会讨论决定后，交由书记长负责执行。监委会的职责，主要是以维护党纪，纠查失职，审核财务，并由常务监委一人负责日常监察工作。

河套各县首次党代会执监委员名录如下：

米仓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赵士英、刘培荣、王中、张子贤、韩莅政。

监察委员会委员：张懿、鲁宗廉、任怀道。

临河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王炜、高映明、库培禄、李致中、任振华。

监察委员会委员：魏子俊、武全体、王恒

春。

狼山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李生祥、高淑远、赵伯雄、徐友鹏、陈万

华。

监察委员会委员：马国珍等三人。

五原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安建国、李述唐、刘仁俊、张玉璞、吕璧。

监察委员会委员：张守仁、党伯伟、秦戎。

晏江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张鉴三、杨培业、张却凡、张恒信、李逢春、王会之。

监察委员会委员：成汉卿、师润林。

安北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田增、陈质文、韩士甫等五人。

监察委员会委员：韩凤礼等三人。

陕坝镇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如春、程云蔚、温广厚等五人。监察委员会委员：杜晋文等三人。

三、党团统一组织后的机构人事

遵照1947年9月9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系会议，决定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中国国民党内，实行党的改造，以便集中力量，增强统一领导。绥远省党团于1947年9月30日实行合并，组成了统一组织委员会，其委员名额，党团双方各占其半。统一组织后的河套各县党部书记长、副书记长是：米仓县党部书记长赵士英，副书记长刘培荣(兼)；临河县党部书记长王炜，副书记长库培祿(兼)；狼山县党部书记长李生祥，副书记长马国珍；五原县党部书记长安建国，副书记长张佩良；晏江县党部书记

长张鉴三，副书记长张却凡；安北县党部书记长田增，副书记长齐呈祥；陕坝镇党部书记长张如春，副书记长程云蔚（兼）。

统一组织后的河套各县三青团分团干事会干事，均转为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各县党部在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之下，设秘书、副秘书长各一人，组训、宣社、总务各配备干事三人、助理干事三人，分工承办各项业务。另外，各县党部内还附设政治委员会（由县长担任主任委员）、青年运动委员会（由副书记长担任主任委员）、文化建设委员会（由书记长担任主任委员）、农运委员会（由县农会理事长担任主任委员）、妇女运动委员会（由妇女会主任担任主任委员）。上述委员会的负责人，必须是党员或团员。事实上各委员会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很少有所工作和具体活动。

从1948年开始实行“以党养党”，地方党部经费自筹，国家和地方财政不予开支。以致形成发动富户捐献，采取向各乡镇摊派和党员认捐等办法，籍以寻求经费来源。后在经费筹措无着的困难情况下，而以溶党于政，接办民众教育馆，把党务工作人员列入学校和民教馆的编制，以维持员工生活。

1947年冬，国民党准备实施宪政，还政于

民，搞了一番声势浩大的假民主选举，凡年满16周岁以上的公民，不分职业、性别、民族、宗教，都参与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监察委员会的选举。为了竞选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绥远暨河套地区的国民党人，自上而下、从里到外大肆进行活动，就连侨居外地数年的陈国英，也回来为他老婆丁淑蓉四处奔波，拉拢选票，最后总算不虚此行，为其捞到一个监察委员；阎伟的妻子莫淡云也提出要竞选立法委员，在祁派与阎家弟兄和原三青团绥远支团干事及赵仲容的支持下，当上了妇女界的中央立法委员；多年来在中央担任立法委员的祁志厚，为了继续禅联立委，令其儿子祁登文、女儿祁登霞来河套各县进行活动。后联名推荐祁登霞为职业性国大代表候选人。

傅作义、董其武为使地方各派系在权力上保持均衡，以便利用矛盾，在圈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人选时，采取了不偏不倚、照顾各派的策略，经邀请省党部、省政府、参议会及地方知名人士进行协商，最后达到平分秋色的目的。河套区立法委员辛崇业是张于派的骨干；绥包区的立委牛进禄，是潘赵派的嫡系；五原国大代表郭永令是阎伟的亲信；狼山国大代表常三，是张钦的女婿；，晏江国大代表王会文，是张遐民的部属；米仓国大代表祁继先是张庆恩的干将；临河

国大代表王炜是由省党部提名；安北国大代表赵炽显，介于潘赵派和张于派之间，都想拉拢他，利用他在河套的资望；陕坝国大代表王乐天是傅作义在河套时最器重的地方人士之一。总之，每个立委、监委和国大代表，名义上是公民投票选举，实际上是由省方圈定，而投票只是个虚假的形式。

1948年春，河套各县在上级党政部门的指示下，向人民征粮、要款，购置自卫枪支，并积极征用民工，建筑城墙碉堡。同时各县成立了“戡乱建国委员会”，由县长担任主任委员，县党部书记长和参议会议长为副主任委员，委员除各县党、政、民意机关的副手外，还有县政府秘书、民政科长、教育科长、军事科长、田粮科长、会计主任、警察局长和自卫团长。各县在“戡乱委员会”的策划下，大肆征粮、征款、征用民工，建筑城墙碉堡，以图负隅顽抗。就以临河为例，在城乡建起三角城四座，并启用曾在屯垦部队任过团长的白贵元为清剿团长。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又发表了“四·一”声明，对绥远震动很大。国民党中央为了扭转绥远的局势，7月间，派国防部长徐永昌飞抵陕坝约见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面授机宜。让绥远部队能守则守，守不住则西撤

甘宁青地区，与马鸿逵、马步芳部队靠拢，共同把守大西北。同时指派张庆恩来绥，以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作掩护，在包头、归绥、河套等地，进行特工活动。并和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头目潘秀仁的党羽互为勾结，以期纠集一些人马，对抗绥远正在开始的革新活动，以阻挠绥远走向和平起义。

是年八月，傅作义、邓宝珊来绥协助董其武发动绥远起义时，张庆恩策划了以绥远省党部牵头的所谓“党政军民各界反对和平起义的签名运动”，向傅、董施加压力，以阻止绥远的和平解放。当阴谋未能得逞时，张庆恩于9月18日偕同“绥远省党通室”主任祁继先、省府社会处长杜品山、专员魏纯美等，乘二次来绥的徐永昌专机逃往广州。在这之前，绥远省党部主委（陕坝行署主任）潘秀仁、省府财政厅长张遐民、教育厅长苏班等，已在五六月间相继离开临河、陕坝，途经银川、兰州，转往广州、台湾。

河套各县党部在是年七月绥远成立革新委员会，开展革新运动以后，到绥远“九·一九”起义之前，就已形同解体，无所作为。起义后，即明令关闭省县党部，停止一切活动，所有党工人员，一律奉调省学习团学习。从此河套地区的国民党宣告覆灭。

附一：国民党党歌歌词

附二：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

附三：孙总理（中山）遗嘱全文

附一：党歌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附二：党员守则十二条：

- 1、忠勇为爱国之本。
- 2、孝顺为齐家之本。
- 3、仁爱为接物之本。
- 4、信义为立业之本。
- 5、和平为处世之本。
- 6、勤俭为服务之本。
- 7、助人为快乐之本。
- 8、学问为济世之本。
- 9、节约为治事之本。
- 10、服从为负责之本。
- 11、整洁为强身之本。
- 12、有恒为成功之本。

附三：孙总理（中山）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

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1925年3月12日

河套地区三青团的始末

刘培荣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三民主义、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会议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三青团（简称）中央临时干事会，蒋中正为团长，陈诚任书记长。当年4月9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五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其中指出：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而设立三青团。在未召开团的代表大会、制定团员守则之前，以党员守则十二条作为团员的行动准则。

1940年7月9日，三青团绥远支团部筹备处在陕坝成立，傅作义为指导员，筹备主任由省府民政厅长袁庆曾兼任，书记赵仲容，下设组训组（组长王克俊）、宣社组（组长高映民）、总务组（组长陈禄林）。每组设组员二至三人，分别

承办各该组业务。随于1941年首先在五原建立了五原分团筹备处，派郭秉章为筹备主任，王景泉为书记。同时指派谢西锋为临河团务筹备员。

1942年秋，随着新县制的实行，河套各县市普遍建立了三青团的组织机构，派林旭初为米仓县三青团团务筹备员、王有章为晏江设治局团务筹备员、马国珍为狼山设治局团务筹备员、薛必达为安北团务筹备员、韩佩兰（女）为陕坝团务筹备员。

1943年，夏绥远支团在陕坝召开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三青团绥远支团干事会，由干事11人组成，推选赵仲容为干事长，王克俊为书记。1944年，王调长官部人事室主任后，傅作义又派樊福煊接任书记，张彝鼎（战区政治部主任）等9人为干事。并选举产生了支团监察会，张恺然为常务监察，马修德任书记，周钧（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等三人为监察。在绥远支团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召开后，干事会下设三个组，并增设秘书一人，总揽日常业务。各县市团务负责人亦有所调整，如临河改建为分团筹备处，筹备主任由县长王一方兼任，派刘博为书记。米仓县分团筹备处主任刘培荣（原是部队中校政治主任），书记常进生。晏江县团务筹备员张却凡（原是部队中校团政治主任）。狼山、安北团务筹备

员，仍由马国珍、薛必达担任。陕坝改建分团筹备处后，任监察会组长，李鸿儒为筹备主任、韩佩兰任书记。五原县经过召开首次团代会，选举产生了分团干事会，推选郭秉章为干事长、王景泉为书记。王调任他职后，由组训组长张佩良代理书记。临河分团兼主任王一方调离后，由刘博任筹备主任，组训股长李嗣第为书记。东胜县分团筹备处经团代会后，由王昶第担任干事长、王司中为书记，并建立了绥干团分团筹备处，康保安为筹备主任（原是绥干团副教育长兼训导处长）。国立绥中分团筹备处由孙蔚章任筹备主任（原为该校训导处主任），派任兰田为书记，并在奋斗中学、陕坝师范、普爱中学组建了区队，开展团务活动。

1945年8月，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傅作义率部东进，绥远省政府从陕坝迁回归绥，省党团机关亦相继乘车船搬迁到省会，并立即在收复区建立了三青团组织机构，并指派阎实真为包头市分团筹备处主任，方安亚为书记；殷石麟为萨县分团筹备处主任，张玉行为书记；何清淮为归绥市分团筹备处主任，简宗荣为书记。为加强联系，互通情报，促进团务工作的开展，在绥远支团干事会增派王凤鸣为视导。

1946年绥远支团部在归绥市（今呼和浩特

市)召开第二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0余人,会议产生了新的支团干事会和监察会,推定赵仲容为干事长,樊福煊为书记。赵调任北平行营新闻处长后,由樊福煊任干事长、张维勇任书记。同时产生支团监察会,推定阎伟为常务监察(阎原是省府委员、视察室主任)、马修德为书记。

二次团代会后,河套各縣市三青团负责人亦有部分变更。如陕坝分团筹备处主任由程云蔚接任,派车如鹏为书记。五原县分团干事长郭秉章调任县长后,由书记张佩良代理。临河县分团筹备主任刘博调省后,由库培禄接任。安北团务筹备员薛必达调离后,派齐呈祥为安北筹备员。

关于三青团团员年龄和入团条件:团员年龄基本上规定为18至25岁,团务干部可以超龄入团,不受此限。其条件为凡愿信奉三民主义,遵守团章,并履行团员义务者,需经团员二人介绍,即可填报入团申请书,办理入团手续,经报请分团审定,支团核准备案颁发团证后,始可成为正式团员。但也有未经本人申请,由区分队擅自给填报入团而挂名充数者。同时规定三青团员不得参加其他党派或进行违法乱纪、有损组织声誉的活动。对团员的思想教育,以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孙中山遗教)、总裁言行(蒋介石言

行)、力行哲学、团员须知等为必修课。并以抗战建国的十条要计来策励团员，使团员树立理想抱负及虚幻的希望。

自1939年以后，国民党中央给各省区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责令党政军团各部门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社团的思想言论行动，并加强了学校的训导工作，以期把青年思想导入笃信三民主义之轨道。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强烈谴责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决定取消军队党部和学校里的三青团组织。1947年在南京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党团合并，以便统一领导，消除党团各自为政、分庭抗礼的分裂状况。同年9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组织处长蒋经国给各省市下达了党团统一组织的实施细则，并明确规定了党团合并后的人事制度，即将三青团各级干事会的干事，一律转为各级党部执行委员，将监察会监察一律转为各级党部监察委员。至于各级党部书记长、副书记长则由上级党团联席会议指定。在执行上，一般是以各级党部原任书记长为正职，三青团筹备主任或干事长为副职。但个别地区也有原三青团负责人任书记长，党部负责人为副职的。统一组织后以五人组成统一委员会，其统一委员基本上是三青团占五分之三，国民党占五分之

二。在未改建分团而设团务筹备员的旗县，党方占五分之三，团方占五分之一。总之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党团统一委员之人选的。

党团合并后，按照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修正了的“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和“国民党改选纲领草案”进行整顿党务。以“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作为振兴国民党各级组织之要素。

自党团合并后，所需党务经费，统由当地自筹，“以党养党”，不再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开支之内。傅作义管区在“整体干部统一使用”的调配下，把三青团的部分干部转往行政等部门，如樊福煊出任归绥市长，郭映宽出任晏江县长，梁子材担任《奋斗日报》社社长，张维勇担任包头市副市长，陈超担任和林县县长，马修德出任丰镇县县长，其它县分团负责人调察哈尔或留绥担任县、长副县长的各有其人，不一一赘述。

其次，河套地区的三青团于1942年实施新县制时，将久已有名无实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县政府移交三青团接管兼办各该县市的所谓“新运”工作。并于1945年春，责成三青团组设“三民主义文化建设委员会”，附属于三青团之内，由省、县团务干事长或筹备主任兼任该会主任委员，党政有关单位负责人为委员。并在1944年

普遍开展了“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运动”及征集知识青年参军运动。所谓响应蒋介石发出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其结果是虎头蛇尾，声势颇大，收效甚微。最后不得不借助行政命令，下达配购和配征任务，才算勉强交了差事。

纵观三青团的始末，从它在抗战掀起高潮时的1938年诞生，到1947年蒋介石反人民内战日趋败北之时终结。从中央到地方，它的日常工作及其活动，不外乎对青年进行唯心史观、蒙蔽现实的毒化教育；对社会团体及群众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鼓动。并通过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运动，来扩大其政治影响和思想阵地。还借抗日远征之名，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以增强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其它无可记述。

兹将1946年三青团组织系统列表随文附后：

我所知道的张庆恩

王廷英

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山西的国民党员苗培成、韩克温、刘景新以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返回山西，秘密进行活动。阎锡山于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即参加了同盟会。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改都督为将军，封阎为同武将军。阎为表示对袁的忠诚，宣布脱离国民党，并解散了国民党在山西的各级党部。

1925年，太原已发展秘密党员四百余人，并建立了秘密组织。同时在各县吸收了三千余名青年学生和工人入党，并在大同、运城、临汾、沁州、晋城等三十余个县市相继建立了组织。阎锡山看到全国实现国共合作，所以对山西国共两党的活动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于是两党渐渐由秘密转向半公开活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两党常常采

取一致行动。如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太原市人民闻讯，群情激愤，在傅懋功（彭真同志）、张淑平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太原市学联为中心的沪案后援会。以省立一中、国民师范学生为骨干，举行了太原有史以来第一次反帝示威大游行，参加者达一万余人。大会致电上海人民，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并献款四千三百元。

这次游行影响很大，它不仅促进了工农商学兵的大联合，还加速了国民党山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选出苗培成、韩克温、李冠祥、郭树堂、杨笑天和共产党员王瀛、孙真如、王鸿钧、彭兆泰九人为委员，组成了国共联合的山西省党部，下设组织、宣传、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商民七个部。国共合作在山西实现后，直接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对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悬青天白日旗，实行三民主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参加中统 镇压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北伐军占领南京不久，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改组各省地方党部，并派张继、何澄、韩克温、苗

培成和山西地方的赵戴文、南桂馨、温寿泉、孔繁尉、杨笑天九人成立了山西省党部，首先提出一个通缉共产党的名单，计有崔锄人（省委书记）、王瀛、彭兆泰、王鸿钧等十余人，交省政府通令各县执行。

接着南京中央党部又作出清党决定，通令全国实行。并在各省党部内设立了清党委员会。山西清党委员会初由梁永泰负责，后改为苗培成、韩克温等人，他们以平民中学为中心，进行清党活动，并在师生中秘密发展CC团成员。

这时在平民中学读书的张庆恩已崭露头角。由于他为人机灵、谦和服从、才气横溢、善于应变，在清党过程中，对平中师生的思想言行秘密侦察，详细汇报，颇得苗培成的赏识和信赖。苗为了壮大CC组织，便亲自介绍张参加CC团。张庆恩受宠若惊，欣然同意。他的特务生涯便由此开始。

张庆恩系山西徐沟县人，别号永铭，因做特工，曾经用过晋升、张渝、傅忠（在绥远峡坝时期）等化名。他出生于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母家人很器重他，愿他将来出人头地，光耀门庭。张参加CC团后，以攻读太原工业专门学校为掩护，从事监视师生行动、发展眼线、壮大组织的秘密活动。他对上阿谀奉承，谦虚谨慎，任

劳任怨，对同学彬彬有礼，乐于助人，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博得全校师生的好评。

一张在苗的支持和培养下，积极替CC二陈网罗干将，收买叛党变节分子，在山西掀起反共高潮，同时暗中监视阎锡山的军政动态。1929—1930年期间，他们在太原开设泰华昌绸布庄，以经商为名，暗中刺探阎锡山的军政要情。该号布置新颖，物美价廉，商品齐全，服务灵活，对山西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接待殷勤倍至，买货后还赠送回扣或儿童玩具。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手法，从阎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口中获得不少重要情报。

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以失败告终，阎被迫下野，逃亡大连。蒋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以胜利者自居，气焰嚣张，独断专横，对内开除清洗阎汪分子，对外组织特工，大肆侦察逮捕共产党人，使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人或被杀，或被判刑，或送反省院监禁。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山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分裂蒋的力量，利用阎锡山作侵略中国的工具，于1931年8月用飞机护送阎回晋。阎在大同赵承绶家休息一日，第二天即回五台河边村，不事声张，静观其变。

蒋闻讯后大为震怒，急命何应钦、孔祥熙电

告阎锡山火速离开山西，否则将采取严厉措施。刘峙、韩复榘也摇旗呐喊，相继致电中央，促阎离晋。正在紧锣密鼓反阎之时，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再无暇顾及此事。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寇，从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太原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起成立了“山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学联成立后，首先发动学生，举行了抗日救亡大游行，并选出代表三十余人，向山西当局请愿，要求抗日。教育厅长苗培成代表主席接见学生代表，他依仗中统势力，态度蛮横，说什么“抗日是政府的事，你们有什么妙计，我可代呈中央”。苗的搪塞胡诌，激起学生的愤怒。学生们高呼“你滚回去！”“打倒苗培成！”苗见势不妙，赶忙扭头溜走。

12月12日，太原学生三四千人，云集省政府门前，要求省主席徐永昌接见，遭到卫兵阻止。学生们一拥而上，冲进省府大院，因找不见主席，大家气愤不过，就将省府的门窗玻璃及桌椅砸烂，随后又将教育厅、《民国日报》社及苗公馆捣毁。18日，太原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又陆续列队，集合到省党部门前。当时省党部早已布置森严，在围墙上和厅楼上，由特务拼凑的武

装纠察队（以下简称武纠队）在王琚、张庆恩的指挥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学生面对此情，却井然有序地排列在大门前的空场上。经再三交涉，由各校推选代表二十余人，由省党部委员苏寿余接待。代表们刚进招待室，即被武纠队包围，并遭到棍棒殴打。在外边的学生听到呼喊声，怒不可遏，乃集中力量，冲击省党部大门，密布在围墙和门楼上的武纠队，突向学生开枪射击。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弹中要害，血流殷地，送到医院，随即死亡。被打伤的学生约三十余人，这就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制造的轰动全省的“一二·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在阎锡山的授意下，于当天下午派部队将武纠队缴械，将韩克温、苏寿余等扣押起来，并会同学生代表查封了省党部。阎就是利用这一事态，借助学生的力量，排除了蒋在山西的势力。从此，山西省的各级党部全部关闭。

1932年2月，阎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支持下，由五台河边村进驻太原，就任山西绥靖主任，撤销教育厅长CC分子苗培成的职务，并迫其离晋。苗不得已，将已暴露身份的特工全部转移出去，将张庆恩委派为国民党CC系地下平津工作团主任。张到平津后，为打开局面，不择手

段地勾结叛国投敌的中统特务，秘密进行特务活动，侦察地下中央组织和日伪动态，直接向国民党南京中统局汇报。

1935年，张庆恩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队扣捕入狱，后经调统分子和汉奸王揖唐等设法营救，方得出狱。张出狱后，即返回南京，暂留中统局工作。

二、锋芒再露，攫取中统要职

1938年冬，张庆恩提升中统局专员兼中统重庆市实验区副区长。张为了讨好主子，效忠蒋党，积极组织若干侦察小组，勾结利用帮会道门和各种反动分子，到处侦察中央地下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并指挥军警宪特联合组成的稽查处，大肆逮捕进步师生和一切认为可疑的人。

他们将被捕的人关进集中营里，采用鞭子抽、烙铁烫、灌煤油、让狗咬、通电流、悬空吊、压杠子、踩土钉、坐冰雪等惨无人道的酷刑进行审讯，使好些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惨遭迫害，使集中营真正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三、飞黄腾达 掌握绥远党特大权

1939年，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相继进驻陕坝后，蒋介石为了从政治上拉拢和

利用傅作义反共，瓦解阎傅的关系，于1940年特命中统局派遣张庆恩为第八战区傅副司令长官部辖区的总代表，其公开身份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兼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绥远调查统计室主任（以下简称调统室）。绥远调统室初设陕坝博爱巷五号，其使命是：（一）监视傅部所属党政军各部、厅负责人的政治言论和行动倾向；（二）开展党务活动，推行反共政策；（三）统一领导绥远各界的中统分子，并发展其组织；（四）训练特务干部，开展大西北的特务工作。

张来绥后，为了攀高结贵，取得傅的信任，便处处伪装忠顺、谦和、服从，并化名为傅忠（意即对傅忠诚），无论对下指示谈话，或是向蒋介石、二陈汇报绥远反共情报，总是尽力吹捧傅的忠诚；对外也大力宣传傅的治军理政成绩，有时还将蒋系二陈的一些密电呈送傅阅，以示对傅尊重。

张还企图从中穿针引线，把傅作义和陈立夫、陈果夫由私人关系变成政治关系。张很清楚陈家兄弟当时在蒋介石的反动集团内，虽然党、特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但却缺少强大的军队实力作其后盾；而傅在蒋介石集团中，虽与孔祥熙有过微妙往来，但未达成政治默契，终没找到得力靠山，且经常受到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军政部长

陈诚的刁难掣肘，使傅深以为虑。而张的这个“得意杰作”，正中双方下怀。如傅后来对张的支持和国民党中央不断对张嘉勉，都出于此因。

张在绥西得到傅的支持，顺利地组建了绥远省党部，在各级机关团体学校中，也建立了区分部或小组。并于同年四月在绥西成立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战时青年训练团（简称战青团），张庆恩兼主任，下设总干事一人，总理全团实际工作。他们将抓来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集中到这里，通过威迫利诱，或“感化教育”，企图使之转变思想，为其所用。

1942年，随着新县制的实施，在临河、米仓、狼山、晏江、五原、安北、陕坝相继成立了国民党县市党部，积极开展党务活动，并指派中统骨干分子，配合军警宪大联合的稽查处，通过公开盘查、秘密跟踪，对绥西军政机关、学校团体以及社会上的所谓嫌疑分子，大肆扣捕，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中共河套特委书记郭北宸同志，到伊盟找上级党委汇报工作，在行经巴拉亥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秘密审讯时，特务们先是用跪碗碴、坐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进行逼供，继而设宴招待，用高官厚禄和美人计等拉拢诱降，但是郭北宸同志始终大义凛然，坚

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施，由张庆恩指派三名特务人员，以送郭回兰州为名，从马如龙圪坦囚禁之地秘密押至渡口杨生春圪坦（今杭后南渠胜利一社）的沙窝里将郭杀害。

由于张庆恩网罗特务，明查暗访，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使中共在临、五、安三县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约有二百余人被捕。就在张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之时，国民党中央的二陈与朱家骅发生了派系争权斗争，朱凭借组织部长权力，于1943年春将张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代主任委员的职务解除，仅留绥远调统室主任职务。张对此虽然内心十分不满，但表面上却装得镇静若常，对中统局的指示，仍卖力执行。

1943年秋天，傅为了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将张庆恩委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中将高级参事，每月拨给六万元法币，作为活动经费。

四、阿谀奉承 得到傅的重用

1944年春，第八战区成立了“特种工作指导处”（简称特指处），任命张庆恩为处长，张利用“特指处”继续大搞特务工作并把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傅所指挥的军队里。本来长官部建立的特种工作汇报会议，给张庆恩进行特务活动提供了方

便，而特指处的成立，更使张庆恩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短暂的时间内，就获得地方当局的倚重与中统头子们的赞许与嘉奖。

同年秋，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会），也进行了改组，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常务委员会，张庆恩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张凭借其秘书长的身份，以中统特务骨干为基础，控制了战工会的整个组织，使战工会随之变质，即由原来单纯推进抗战工作而变为反共防共。为了加强对战工会工作的控制，便常住在战工会里，将绥远调统室主任的职务自行辞去，由魏纯美代理。不久战工会和特指处合并为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特工处，张的活动范围和权力也随之更大，成为绥西党特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反共风云人物。

五、操纵党政总队 抢夺胜利果实

1945年2月，在第八战区成立了党政总队，这是一个军统系统的武装性质组织，其人选理所当然地由军统支配，而张庆恩不属军统，是不能逾越这个界限的。但是由于二陈在中陕为其活动，国民党中央终于任命张庆恩为党政总队总队长，柴玉峰为副总队长。

张受命后，设队部于绥远省调统室的前院，

以绥远战地工作委员会特工处的旧班底，进行了组织调整，火速开展了反共的侦察、情报、策反、密捕、管训等活动。他首先把设在陕北榆林、安边、麻地沟的三个情报据点编为第三大队，由祁觉民任中校大队长，将矛头直指延安地区，侦察党政军的动态，并开展反动宣传活动。

抗战胜利后，党政总队随军东进归绥，驻旧城小西街六十六号，将调统室的特务分子与党政总队合在一起，门口由武装警戒，过往行人不准在此停留。特务分子身着军装，耀武扬威，所到之处，人所敬畏。特别是敌伪时期给日寇做过事的人，对他们更是敬若神明，设法接近，馈送财物，以便得到保护，逃避惩处。如青帮首领、一贯道头子、日伪民生会巴盟地方本部部长王明远，在保释出狱后，在晋谒党政总队秘书王兰田时，一次就贿赂许多黄金及大烟。张庆恩受贿尤为秘密，行贿人将金银暗装糕点盒内或茶叶筒里，借节日馈赠，或至其家乘便暗塞被褥之内，或在夜深人静时投入院内，但都附上便条，写明财物名称、数量，自己签字署名。在两三个月内，张王二人收贿数量非常可观。但张庆恩老奸巨滑，对此守口如瓶，隐匿不露。而王兰田则不遮掩，一时间，他家则皮箱罗列，用具一新，并雇上了厨子。张手下较低级的

特务分子，也手不干净，但与张王相比，甚为悬殊，致使内部嫉妒喧嚷，互不信任。这些人为了消除内心的烦闷，或酗酒闹嚷，或聚众赌博，或抽吸毒品，或寻花问柳，丑态百出。

六、配合军政 在绥东各地疯狂反共

1945年10月末，在解放军围攻归绥前夕，张庆恩把绥西和其他地区的特工分子集中在归绥，统一布置在城内和郊区，进行特务活动，监视进步人士，刺探情报，发展眼线。并在旧城小南街华泰商店占房三间，经常派特务化装外地商人，侦察监视来往客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6年初，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政治民主的压力，准备召开旧政协会议，于是下令撤销了党政总队，自此特务分子扣捕进步人士的活动有所收敛，对扣捕的人士也装模作样地放了一些。但这些措施，实际上是为了进行政治欺骗。

这年3月，张庆恩乘机到重庆总局述职，除留有绥远省调统室主任一职外，其他职务俱已卸任。张留渝月余，适逢傅作义抵渝述职，方随傅同机返绥。

张返绥后，于1946年5月，又着手组建民众工作总队，驻归绥新城西落凤街。其人员配备是张兼队长，魏纯美副之。队员虽不是青一色的调

统分子，但从军政部门抽调或选拔来的，都是一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在组建完成后，就配合军政，将这些人派到绥东各地，组建城乡反动政权，搜集解放军的情报，和捕共产党的县区乡干部，诬蔑共产党的政策措施，组织还乡团、暗杀团，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

1946年8月，张庆恩第二次担任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再次集党特大权于一身，成为反动集团中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显要人物。

七、狐假虎威 把手伸入平津张垣

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会同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强占了张家口。蒋政府为之狂欢不已，在第二天蒋就悍然宣布召开伪国大，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驻十二战区的中统总代表张庆恩，也狐假虎威，紧密配合。任命董叔明为察哈尔省调查统计室主任，火速开展特务活动，刺探中共军队部署等各种情报，协助国民党重建各级地方政权，侦破搜捕中共地下的组织人员，大肆清查户口，侦察进步师生的动态。

1947年12月，蒋介石到北平召集李宗仁（时为北平行营主任）和傅作义开会，撤销了北平行营，成立了华北剿总，任傅作义为总司令，蒋的

嫡系陈继永为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任张庆恩为“剿总”调统室主任兼军法处处长。这样军统、调统两条绳索捆缚着傅作义，使傅十分气愤。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长城各口进军华北，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傅在各种条件的促进下，从徬徨失望中摆脱出来，毅然选择了投靠人民的道路，于1949年初，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八、垂死挣扎 破坏绥远和平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张庆恩带着特殊使命来绥，将各地潜来绥远的军统、调统及阎锡山体系的特务，统一于“绥远党通室”的指挥之下，其主要任务是破坏绥远和平起义。张部署后，又匆匆赴南京述职。

7月份，张由穗乘机返绥。其任务是再次加强特务的部署与活动，以阻挠和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张以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作掩护，进行游说串联活动，并整顿特工的组织领导，在包头成立了“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张自任主任，魏纯美副之。其管辖区为五省（即晋、甘、宁、新、绥）、三区（即东北、冀热、平津、晋察、蒙旗）、两线（即平汉、陇海），选派各地

逃亡来绥的百余名特务，到解放区开展所谓“敌后工作”直线潜伏，进行破坏活动。

同时派遣特务分子、反动军政官吏，到津京张等解放区发展地下军，开展所谓的“敌后游击战争”，妄图配合在绥的特工，破坏绥远和平解放。张还到处网罗旧部，拉拢反动分子，组织反动武装，伺机而动。为增强特工效率，张将“绥远调统室”迁至包头，与“绥远办事处”两位一体，合署办公。

九、用尽心机 终以彻底失败告终

这年8月，毛主席、周总理委托傅作义将军偕同邓宝珊将军来绥，协助董其武将军发动起义。他们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和慰问金，到部队进行慰问，宣讲党的起义政策，发动与促进绥远早日和平解放。张庆恩得此消息，于8月20日赶到傅的驻地美岱召，将事先拟就的阻挠绥远起义的“和平建议书”呈傅，表示忠心进谏。

傅到包后，张又几次进行游说，都未得逞。于是急命杜品山、王国璋起草所谓“全面和谈”的《和平意见书》，由鄂友三（骑兵第十二旅旅长）向傅呈递。又发动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为首的党政军民各界反对和平起义的签名请愿运动，向傅、董施加压力，但此时和平起义已是大势所

趋，人心所向，张庆恩的种种伎俩只能是枉费心机。但张庆恩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为了挽回败局，乃急电国民党中央，请蒋介石亲临劝说，或电邀傅作义赴穗，磋商“全面和谈”之事。又电请阎锡山、谷正鼎来电劝阻，可谓挖空心思，竭尽效忠之能事。

国民党政府得悉绥远情况后，急派国防部长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与巨额黄金，乘飞机来包头，请傅赴穗，并劝阻绥远不要单独起义。但傅深明大义，毅然拒绝了蒋的邀请，坚持推动绥远省走上和平解放道路。

就在绥远各族各界代表及军政首脑签署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之际，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特务头子张庆恩，则在包头急急忙忙地指定李鯤生代理其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并对绥远解放后的特务活动进行了周密部署，对特工人员作了新的安排，然后偕同祁觉民、魏纯美、杜品山等，乘坐徐永昌的飞机逃命广州。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李鯤生将特务办事处从包头撤离，潜伏陕坝，进行隐蔽活动。12月底，张庆恩密电指示李鯤生，迅速与各调查处负责人磋商，设法网罗国民党军政要员，组建“华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统一指挥开展工作。李鯤生于1950年元月亲赴百川堡

(今临河新华乡)，与田树梅、崔正春、肖应轩等人共同密议，成立了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并草拟了章程计划，电呈蒋中央总局。其组成人员是：张庆恩任主任委员，田树梅（曾任山西独立八旅旅长、绥西围垦座办）、崔正春（曾任五原、临河县县长）为副主任委员，李鯤生为书记长，下设委员若干人，其主要任务是：策动起义部队叛变，收集流亡游散官兵，发展匪特武装，指导潜伏特务进行活动。正当这群匪特紧锣密鼓、得意忘形之时，即被我公安人员一一侦破捕获，除将首犯李鯤生、田树梅、崔正春、张朴等解送中央公安部审讯外，其他有关案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都受到应有的惩处。

注：本文是依据中统特工焦××的叙述写成的。焦是山西晋城县人，曾任山西晋城县党部书记。1949年7月随张庆恩来绥，驻陕坝秦晋客栈。一天在街上偶而相遇，因属同学关系，数月往来，除特工任务不准向外泄漏，其余无不畅谈。尤对张庆恩的所作所为，曾数次谈及。1950年焦在五原被捕判刑，始断绝往来。

1985年在写初稿时，曾得马××的帮助，马系陕西府谷人，长期在绥远活动，是老牌的中统特务。但马在解放后坦白自首，并有立功表现，

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后在陕坝镇小车队搞运输，对张庆恩在绥西时期的活动相当清楚。

我根据焦、马的忆述，并参考了有关张庆恩的一些资料，整理成本文。其缺漏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希得到知情者指正。

军统五原办事处的活动

张问之

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原绥远地区的活动，始于1935年，当时称“平津区察绥站绥远组”，组长为欧阳千。1937年设站，称“华北区绥远站”，站长史泓。日寇侵占绥包后，史泓潜伏归绥市开展工作。史为便于隐蔽，与归绥市牙纪张福元之女结婚，住旧城棋盘街46号；到包头则以“广恒西”商号起运货物的工头为掩护。军统绥远站电台台长为肖成章、张世杰，书记先后为崔公俊、陈绎儒、薛荫泉。下设大同组，组长先为赵文蔚，后为张存仁；包头组，组长先为芦浚英，后为许永济。1939年，史泓在归绥活动事败，因日本特务机关追捕甚严，他即携眷逃出敌占区，改任军统宁夏站长，而绥远站由察哈尔站站长马汉三兼任。马汉三往来于察绥之间，直接受潜伏在北平的军统华北区区长毛万里指挥。在归绥市的实际负责者，一是绥远站的书记陈绎儒，一是伪呼和浩特警察厅长刘建华。

以上是1940年以前军统在绥远日占区的概况。在绥远西部国民党统治地区，其组织则另成

体系，属军统西北区领导。军统西北区的掩护名称为军委西安办公厅第二科，地址在西安市玄风桥，负责人是张毅夫。1940年前，军统西北区在绥远地区设两个组。其一为傅作义的三十五军随军组，组长为李元超。此组于1939年初随军到河套地区，负责搜集日伪军军事情报，并监视傅作义部官佐的思想倾向。其二为伊盟组，组长诸大光。此组于1938年在扎萨克旗组建，其主要任务是掌握伊盟各旗王公，监视他们的行动，到必要时将协同王公西迁。

迨至1939年冬，军统华北区敌占区组织频遭破坏。事端起于天津站站站长王天木首先叛变。王天木号称军统“北方四大干将”之一，掌握内部情况很多。由于他的出卖，于1940年3月，继任绥远站站站长张季春、大同组组长张存仁、包头组组长许永济均先后被日寇宪兵队逮捕。其时被捕的首要人物，计有伪巴彦塔拉盟公署科长梁芝祥，伪和林县长萧兆庚，日特外围组织“民生会”顾问刘长荣等。刘建华、陈绎儒逃到绥远西部国统区，马汉三转道香港逃回重庆。

以次，军统华北敌战区工作惨遭破坏，人员损失严重，先后被日特机关杀害者七十余人，被判刑者百余人，被迫投敌者十人。余众先后四散逃匿，工作陷于停顿。

军统五原办事处是在上述情况下，于1940年成立的。其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五原办事处”，对外公开名称为“八战区副长官部调查统计室”。其主要使命是：整顿、统一平津、绥察地区下层特工组织，恢复华北日寇占领区工作。对我党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渗透，以实施其北线之特务包围。

军统五原办事处成立时，马汉三任主任，许揆一副之。总务科长王希田，情报科长史泓、人事科长马兰亭，译电科长欧阳云生，陕北无线电支队长杨秉仁，秘书赵汉臣，督察侯济川。1942年史泓升任副主任。1943年马汉三改任绥远省缉私处处长，史泓继任为主任。1944年五原办事处撤销，改组为十二战区专管部调查室，史泓仍任调查室主任。

马汉三，河北宛平人，是军统系统北方的得力干将。此人出身于西北军冯玉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据文强先生《大特务马汉三之死》一文记载，戴笠本人对马汉三在平津、绥察地区特务活动的评价是：“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人，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

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及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进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就未为冯发觉。他派员打入殷汝耕为首的晋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发觉。“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都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

军统五原办事处，直接指挥平津、大同、绥包、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及河套、伊盟之特务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其派出潜伏组织及活动情况如下。

平津两地潜伏组总联络处设在北平王广福斜街的一所大烟馆——“清香阁熟膏店”。负责人姜兴周，任熟膏店经理。其下属在北平的一个潜伏组，组长翟绥屏，职业为行商，经常往来于北平、天津间。该组分台长兼报务员为耿耀武，住北平西河沿，以卖红薯为掩护。交通为方凌云，经常往返于陕坝、北平间。翟绥屏于1943年派至

北平潜伏。他与马汉三派来的人和下属联络，接头地址在中南海励志社之武术亭，接头时间在清晨七至八点。翟绥屏清晨先到此处，把宝剑悬挂在武术亭门口，以为联络暗号。

晋北区潜伏组组长张季春，游动于大同、张家口一带。1943年日寇宪兵队逮捕了晋北潜伏组交通王珩。王珩叛变投敌后，张季春再次被捕，其组成员被一网打尽。捕后张季春被判无期徒刑，抗战胜利后方出狱。

马汉三、史泓曾亲至归绥活动。马化装进入归绥，住旧城小西街二号。他们在归绥布置陈乐、张乐、张佩贤、杨继山、张毓英为直属通讯员。1943年，张乐、陈乐被伪厚和日寇宪兵队侦捕，杨继山因爆破归绥发电厂未果被杀。

包头潜伏组早在1939年即建立。组长庞中兴，分台长兼报务员安华，交通为王振海。王振海系军统兰州班行动系毕业，曾任白凤翔手枪队班长。他们的主要特务关系是伪包头市公署日本人平山顾问之特务夏雨声，还有伪东亚同盟军之参谋温善亭。庞中兴经夏雨声将王振海介绍给平山顾问，当了她的随队警卫。他们由陕坝经潜伏在伪绥西联军内的随军组，把电台及爆破器材运入包头。五原战役期间，庞中兴曾给马汉三报告了很多日军的重要军事情报。1944年，马汉三派一

个爆破组进包头活动，不久被包头日寇宪兵队侦破，牵连庞中兴被捕坐牢至抗战胜利。安华、王振海逃回陕坝。

在汉奸王英绥西联军的潜伏组，组长高山巍，少校军衔。高任伪绥西联军司令部中校参谋。高山巍将伪绥西联军司令王英发展为特务关系。当时日伪绥西联军担负着西山咀以东至包头黄河渡口的封锁任务。军统五原办事处派往沦陷区及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特务，电台、武装、爆破器材的输送，一个重要通道就是由王英部控制的黄河渡口过境，再由王英派人护送上火车去，或进入乌兰察布盟境内。高山巍组随时将日军及大青山根据地的军政情报报告给马汉三。

在日伪东亚同盟军内的随军特务，为首者名张定九。此人系绥远地区势力极大的红帮头子，军统五原办事处委其为少校通讯员，时张定九任伪东亚同盟军附员。他衣袋里装着日伪和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差假证、护照，又广有其徒，故行动诡密，活跃异常。他经常流动于国民党敌后土匪军王有功、郭长青部；他还与深入大青山根据地的军统特务武装——绥远别动纵队联系，搜集我根据地的军政情报。张定九将各类情报交给军统五原办事处敌后联络组长史宜亭，由史转报给马汉三。

1941年，军统五原办事处曾派到绥包沦陷区一个敌后策反组。组长郭成孝，系军统兰州训练班三期行动系毕业；组员武子肃、胡燧珍。其使命为策反绥境日伪警察队、保安队，并负策反瓦解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武装。郭组在萨县、归绥一带策反了部分伪军武装，又收容了流散土匪、兵痞百余人，在大青山进行游击活动。“八·一五”日寇投降时，归绥市民盛传郭长清部队将入城，岂知率先进入归绥的却是想发劫收财的郭成孝的游击队。当时由伪商务会代表元怡如率众到南茶坊口子欢迎。郭成孝率队入城后，即大肆敲诈勒索，并在凤林阁、麦香村饭庄滥嚼狂饮，不成体统。因此，军统曾一度将郭成孝逮捕关押。

在伪伊盟准格尔旗保安司令奇子祥部随军组，组长名张月明，军统兰训班一期情报系毕业，为上尉通讯员。彼时张月明任奇子祥部副官，其任务为搜集绥南、托县一带日伪军及晋西北、陕坝毗邻绥远边境解放区的情报。

敌后联络组于1940年建立。组长史宜亭，他最先打入王英为首的伪绥西联军；副组长崔岩峙，军统兰训班二期情报系毕业；电台分台长郭占晶，军统兰训班一期电讯系毕业；组员有韩志忠、韩振家、王金璧、武毓美等三十余人。其任务是：（1）派遣特务进入沦陷区时，由敌后联

络组负责送过黄河；（2）联络派往沦陷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各潜伏组及各随军潜伏组和直属通讯员，转送指令与情报；（3）直接派遣特务入绥包地区刺探专题情报。此组先设在包头黄河对面之王爱召，后迁至萨县正南黄河南岸之宋家圪旦。宋家圪旦渡河便是二十四顷地、六犍牛天子。此地是史宜亭的家乡。

萨县南部的黄河渡口由伪警察署守护，史宜亭利诱控制了萨县伪警察署长巩玉林。这样，特务们过黄河先到史宜亭家落脚，然后由巩玉林发给良民证，再搭火车去。而包头以西至西山咀间的几个重要渡口，亦用类似的方式，由史宜亭派人与伪绥西联军潜伏组长高山巍安排，可随进随出。但至1943年，当归绥直属通讯员陈乐、张乐、杨继山等先后被日本宪兵队侦捕后，日军即封锁了包头至萨县的黄河渡口。至此，敌后联络组即失去作用，遂亦撤销。

在绥远西部国民党统治区，以诸大光为首的伊盟组，仍归军统西北区领导，傅作义部三十五军李元超随军组，拨归五原办事处直属，到1941年撤销。五原组于1940年组建，组长赵文蔚。丁红湾组于1942年组建，设在河西义合成，组长张印堂。中公旗组于1943年组建，设在五原柳树泉子村，组长赵晋镛。

我的片断回忆

朱宇峰

我于1940年由宁夏师范毕业后，即到磴口中心小学任教。1945年被调到磴口县教育科任督学。就在我逐步升任的1945年冬，县长为高中第，高的妻子和我是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我当督学还不到一年，高就将我提升为掌管全县教育大权的教育科长。在我任职期间，马鸿逵年年征兵，岁岁加赋，鱼肉人民，扩充自己的实力。由于官吏横行，权贵当道，人民几乎不能生存，逃难的人日有所增。而高中第此人，根本不管人民死活，整日沉醉于烟馆、赌场之中。属员上行下效，大小职员行商成风，不思政务，烟馆、暗妓比比皆是，吃喝嫖赌充斥整个县府所在地的磴口。一年一次的征兵，更是征兵大员们搜刮民脂民膏的大好时机，全县15—45岁的男壮劳力，几乎被征兵抓光，致使农村田园荒芜，无人耕种，到处是一片萧条景象。当时的教育状况更是一塌糊涂，国民党高唱义务教育，即普及教育，但学

生入学率的高与低，教学方法的当与否，教学质量的好与坏，以及师资配备、学校经费等情况，却无人过问，致使一些学校校舍坍塌，设备简陋，濒于关闭状态。所以群众当时对学校的评论是：“春满堂，夏一半，秋凋零，冬不见。”这种说法，确也是言符其实。当时全县十一所学校，入学儿童不到一千，教师不足百人，其中六所天主教会所办的小学，反倒名列县办学校之上，难怪群众见了我们这些人侧目而视，嗤之以鼻。我作为教育科长，对上述情况无能为力，只好听其向糜烂的地步发展，而上级对我任教育科长期间的工作情况也不加过问，反于1946年冬，将我升任为中国国民党澄口县党部书记长。

我任县党部书记长时，县党部有秘书、干事、录士、勤务共五个人。管辖全县8个区党部、16个区分部。区党部和区分部都设有书记一人、委员、监察员一人。全县国民党员130多人，半数以上没有党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历届区党部和区分部按照更换上来的保甲长人员名册，填报成国民党员名册，报送县党部，县党部再报省党部，省党部也不加审查，照样备案批复。因此绝大多数乡、保、甲长，都成了国民党员。说实在的，有些国民党员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入党。在我掌管党务期间，上级三令

五申要我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严密防共、反共。我照上述办法，下令各基层党部迅速发展党员，将他们报来的党员名册再报省党部批复。这样仅1946年一次就发展党员50名，而这些党员却多数不知自己入了党。这种自欺欺人的滑稽勾当，在我任职期间绝非个别之事。尽管那时我们这些当官的常常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但是一到乡间就要大搞反共宣传，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

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全国形势起了急剧变化。我则盼望国民党能挽回败局，幻想美国帮一帮忙，怀着矛盾和恐惧的心理，惶惶不可终日。

1948年初，宁夏省党部不再拨给下级党务经费，党务经费由地方摊捐，美其名曰“以党养党”。我这个从教育科长到县党部书记长效忠国民党多年的人，以及下属人员，连薪饷也无处领了，便只好带领全体属员到磴口中心小学任教，以维持生计。

1949年秋，磴口地区兵连祸结，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如牛毛，成股的武装残匪此去彼来。县政府各机关旧职人员，多数携眷逃散，只有少数行政人员守土待命，继续维持地方治安，准备迎接共产党的到来，听候差拨。而我这个由反共而

转为惧共的思想极为严重的人，根本不想和大家走迎接共产党到来的光明道路，却携带国民党县党部的印信和册籍，连同家小潜入偏僻村镇，隐姓埋名，坐观形势。

1949年秋，接石咀山电话，“包贵廷匪部被解放军击败，溃逃磴口”。我得悉后，赶忙带家眷，乘木筏，星夜逃到召滩（今杭锦后旗黄河乡），隐藏在那里。后来我见到磴口（今巴音牧仁苏木）的人说：“包贵廷到磴口后掘地三尺，杀人放火，自卫大队长马占仓被杀，好多妇女被强奸。县党部房舍内的档案公文被烧成灰烬”。磴口县的档案被毁，既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也使我无法向共产党交代。后来我又听说，磴口已和平解放，共产党已将磴口接收。当时我对共产党没有认识，只是怕得要死。错误地认为，如叫共产党抓住，我绝无生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在1950年春，我连同家眷逃往陕坝，改名朱少轩（实际少轩是我的字）。我当时认为陕坝人多，政府一时查不出来，于是就在陕坝同兄长朱福贵以每亩四块钱的租价，租了高根栓八亩耕地种菜，准备开个菜园子，做为长久谋生之计。在水萝卜刚种上两天，我上街遇上过去磴口警察局的警察马某某，他告诉我说：“你不能在这里住了，磴口县公安局正在追捕你”。我

听了后，吓得要命，结果在陕坝只住了三个月，又逃到黄羊木头齐盘柳子，租种了徐二达的十亩地，种了八亩小麦，二亩胡麻。我在这里只呆了半年，我二舅来了告诉我说：“你得赶快搬家，磴口县公安局要把你追捕归案，如果你被抓住，就没命了……”我听后，丧魂落魄，惊恐万状，夜不能寐，食不下咽，不敢出门，不敢见人，整日在生死问题上兜圈子，既不象人，也不象鬼。最后认为要想活命，还得再逃。于是我趁着黄河封冻，潜逃到河南伊克昭盟的补圪退村，投奔了大姨夫武某。当时这个村仅有四户人家，人少地广，易躲易藏。我又上了户口，改名赵亮。意即希望早点把我“照亮”，见到光明，脱离险境。我在这里不敢住在家里，而在黄河岸边的小土丘上挖了一个洞，如同老鼠似的钻在里面，不敢见人。到了夜晚才出外活动一下，吸一点新鲜空气，蹭蹭窝屈的身躯。我租种了武家几亩地，种了些扁豆和小麦。记得正在播种的时候，来了一个神甫，叫刘洪哲，就住在我姨夫家，我不敢见他，怕是来抓我的。他在武家住了五、六天后，雇了个骆驼从南走了。走后我才知道，他是从天津来的，也是个潜逃犯。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就在这偏僻的小村庄里，也能听到这次运动的声势和威力。

在这年的小麦开镰之际，补圪退村所在的福茂喜乡召开了乡民大会，会上除讲了要抓紧夏田抢收外，也宣传了党的镇压反革命政策。我又向某人借了一本《宣传员手册》，上面有好多文章是阐述有关党的“镇反”政策的。其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这条政策，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要想活命，要重新做人，只有走坦白这条路了。回去后，我又和女人进行了商议，征得她的同意，第二天便乘船渡过黄河，回到老家东堂，让我弟弟朱景峰领着我到渡口区公所投案自首，随后我又到县公安局，交代了磴口县的国民党组织情况，结束了我不敢见阳光，不敢见人的鬼蜮生活。

我住在县公安局，每日饭菜丰盛，又有亲朋给我送些瓜果肉类，生活很好，但我什么也吃不下去，整日胡思乱想，就怕“枪决”。“包袱”背得一天比一天沉重。住了一个多月，由于思想过于紧张，造成神经错乱，两眼发红，头发直竖。在公安局院里胡跑乱说，疯疯颠颠。公安局领导给我耐心解释，启发我放下包袱，安心养病。但我的病是由于“害怕”所致，见效不大。政府又允许把我保释回家，在家休养。三个月后，病情有所好转，由保人将我送回县公安局，后判刑十年，并没有杀头，我这才放下思想包

袱，决心重新做人，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61年刑满释放后，又留场九年。1969年回磴口县在坝楞乡落了户。

党和政府对我们非常关心。我和老伴每月都能领到一定数量的医疗费，还可得到生活救济款。这使我从心里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象我这样一个过去积极反共的人，而今天共产党却对我这样照顾，这不能不使我想到过去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那时国民党对共产党人，不是明杀，就是暗害，而我这个国民党时期的县党部书记长，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没有被杀掉，相反却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照顾，怎能不使我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呢？

1984年9月22日，我接到县政协的通知，我被特邀为县政协二届委员，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共产党不记前嫌，而以国家民族为重。从书记长到公民，从罪犯到政协委员，这是历史上少有过的事，而在新中国却变成现实。我于9月24日参加了县政协召开的二届一次会议，党给了我这样高的荣誉，是我今生今世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不由得从内心呼出：“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定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傅作义的宪兵组织

王兴亚

傅作义部有了宪兵，是在北伐成功、1928年他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开始的。那时阎锡山任平津卫戍司令，傅作义是山西第35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当时阎锡山增设了北平宪兵司令部和天津宪兵司令部，两地各编组六个宪兵营，归两地的警备司令指挥，并负责其编制。

这时傅作义请准委派袁庆曾为天津宪兵司令，司令部设部副一员（等于副司令），由李浩恩少将充任，副官长一员，由刘澄充任（刘系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下设副官处、教务处、军法处、军需处、军区处、书记处以及侦缉队、卫兵队、车迁队等。

六个营的宪兵，是由以前收容了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幼年学兵团一部分（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从太原宪兵中调来的原收容安徽宪兵的一部分，又在傅作义部中挑选了一部分青年，编成了六个营（人数不足）。第一营营长张家诒（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第二营营长林奎福（日本宪兵学校毕业），第三营营长张公量（保定军官学

校毕业)，第四营营长王全铭（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第五营营长梁新胜，第六营营长梁占魁（都是傅作义部的老营长）。

傅作义为了提高宪兵素质，加强服务能力，做了一个计划，报请阎锡山拨一部分经费，拟办一个宪兵教育机构。阎锡山批复：“无此项经费，如想创办，可以自行筹措。”傅作义乃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在受训宪兵的月饷上打了算盘。当时宪兵月饷为九元五角（比普通兵多三元），傅让在每名受训宪兵月饷内扣留三元，作为教育经费。就这样，便开始办起一个天津宪兵教练所。

随着，在天津市张贴招考宪兵的学兵广告，按照宪兵教育中的规定、考取宪兵的资格和课目，共招收学兵二百名（都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把宪兵第四营改为宪兵教练所，以营长王全铭为该所教育长，分编四个队，每个队有两个分队，每个分队两个班，每班十二人。

教官是从曾在皖系、直系宪兵中受过训练的人中挑选了十几名，又聘请了些外部的，共有三十多名。凡是宪兵要具备的知识，全部讲授。

训期暂定为一年，毕业后先加入宪兵连队实习一至三月，按实习成绩，随时充当班长和宪

。兵

这个宪兵教练所，共训练了两期学兵。这两期学兵大多数充当了班长（上中下士）。在第二期学兵刚刚毕业时，正值蒋阎冯大战，张学良率部进关，占了天津。阎锡山退回山西。北平、天津的宪兵都退到绥远。

平津两地宪兵共十二个营，在撤退途中，逃亡过半，待至退到绥远，所剩不到二千人。一九三〇年冬，由傅作义下令，编成绥远宪兵。

绥远宪兵设宪兵司令部，任袁庆曾为司令。以下编组六个营，连排班人数与天津宪兵相同。营长除天津的第二营营长林奎福在津未走，由北平宪兵营长杜海源接任外，其余都是天津宪兵的五个营长。

1931年3月，阎锡山下野，晋绥军归张学良指挥。山西、绥远两地的宪兵改为东北宪兵，绥远宪兵为东北宪兵第十一大队，仍归傅作义指挥，大队长由原绥远宪兵第一营营长张家治升任，因六营宪兵近二千人，容纳不下，傅作义乃另编了一个三十五军宪兵连和一个特务连。

1932年3月，阎锡山又上了台，任太原绥靖主任，晋绥军又都归还建制，把宪兵都改为晋绥军宪兵，共编十个大队，在太原设立晋绥宪兵司令部，指挥1—6队。在绥远设晋绥宪兵副司

令部，下辖7—10四个队，仍归傅作义指挥。

在绥远的四个队的宪兵，乃由东北宪兵十一大队、三十五军宪兵连及三十五军特务营合编组成。副司令是张家治，参谋长是张公量，第七队队长王金铭，第八队队长杜海源（后换齐执矩），九队梁新胜，十队刘汝砺（刘曾任冯玉祥部参谋学校校长及混成旅旅长，是大学生）。司令部编制有参谋处、副官处、警察处、侦缉处、军法处、军需处及车迁队等。

队的编制是，每队辖四个分队，分队有二个班，每班十三人。宪兵有一等兵、二等兵之分。一切待遇、装备与其它派系的宪兵相同，只是手枪多系山西造的大号手枪，军刀是指挥刀，而不是马刀。

从晋绥宪兵的四个队归傅作义指挥后，傅对宪兵更是精心培植，并把宪兵的工作任务随之扩大。

精密部署驻防地区：各县及各较大铁路车站，都派宪兵分驻所。包头驻一个大队，归绥驻两个大队，丰镇、集宁都派驻一个分队。武川、萨县、东胜、五原、托县都派驻一个班。其余各县都派二、三名宪兵，为分遣所。萨县、卓资山、包头、丰镇、大同等车站，都派有三至五人的分所。

同时挑选精干资深的班长和宪兵二十名，训练一个月，分别秘密打入省立绥远第一中学、正风中学、车站扶轮中学、土默特中学、省党部及阎锡山派驻大同的赵承绶骑兵司令部、派驻丰镇的独立第二旅周原健部、派驻集宁的山西两炮第十九团张潜部以及派驻包头的七十师王靖国部，刺探情报。直到“七七”事变才撤回。

1933年，又挑选了15名宪兵及班长，成立绥远省政府蒙务训练班，以学习蒙语为主。训练后，派往蒙旗，每旗一人，名为蒙旗联络员，实际是监视各旗军政活动及刺探情报。直到“七七”事变后，这些人有的被各旗所杀，最后星散回队的，只有两三个人。

从1934年7月起，又连续进行了三期宪兵训练，以第十队队长刘汝砺为教育长，十队队副为队长，下分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两个班，每班十人，合计六十人。训期为半年。学兵的来源少数由各队挑选，多数是从天津、北平招收的初中以上学生。

各队的驻防地，每半年调换一次，由司令部指定日期和对调分配。分队换替，由各队规定分配。各分所的调换，以成绩好坏为依据，成绩好的，可能长期不换，成绩不好的，可以随时撤换，普通的可以县与县分所调换，但都由队里

支配。

在司令部及各队办公室，以及会场、讲堂等处，都张贴粉红纸印就的标语两幅，内容是“清己奉法”、“典则在身”。在官兵宿舍内也有两幅，即“戒烟戒酒”“戒嫖戒赌”。

1935年7月，副司令张家诒与傅作义意见不合，傅作义给阎锡山报告：“张副司令嗜好鸦片，贪污受贿，不服从命令，请予撤差”。并请以马秉仁接任（马系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与傅同班）。经阎锡山批示：“张家诒准予撤职，遗缺由团长薄鑫继任，薄是傅部团长，阎的亲信，系少将级，一般团长都是上校级）。使傅作义未能随其所愿。

薄鑫一上台，参谋长张公量即辞职调走，由队长王全铭升任。薄乃调其旧属营长化智祥接任第七队队长。

薄鑫继任不久，因拔牙死于北平协和医院。傅随派马秉仁继任了副司令。

在“七七”事变时，傅作义由大同退往太原，急电令绥远宪兵五个大队全部开往太原（所谓五个大队是在1936年5月又增编了一个宪兵特务队）。因宪兵过度分散，只有九、十两队赶到太原。日本围攻太原时，这两个队的宪兵大部牺牲，十队队长刘汝砺阵亡。这样傅作义就剩下不

完整的三个宪兵队了。

傅作义退出太原后，闻知绥远国民兵副司令李大超不听命令，私带国民兵退到后套，他就派马秉仁拿着“把国民兵改为绥远游击军，归马秉仁游击司令指挥”的命令，前往接任，马秉仁奉命走后，宪兵副司令由参谋长王全铭代理。

三个残缺不齐的宪兵队，两个改为宪兵执法队，临时归执法司令张公量指挥，一个随三十五军留守处执勤。

傅作义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后，把三个队的宪兵改为北路军宪兵大队，任王全铭为大队长。下分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分两个分队，每个分队辖两个班，每班士兵十三名。

傅作义改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将所属部队开来后套，长官部暂时设在五原。这个大队由长官部警察处指挥执勤，派一个分队驻临河，组设临河警察分处，在西山咀、乌不浪口派设防空监视哨，派驻东胜一个分队，在碱柜、马七渡口设分所。并改换番号，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宪兵大队。

1942年元月，傅作义想扩大宪兵力量，意图成立一个宪兵团，上报蒋介石审批。蒋介石批复“各战区不准自组宪兵，如有需要，可由中央派去宪兵执勤”。傅作义又想办法，把宪兵大队编

为侦查总队，实际执行宪兵任务。

侦查总队下设四个大队，每个分队两个班（后又改为三个班），人数共四百人。

侦查总队归长官部督察处指挥，后督察处撤消，又归长官部副官处指挥。其驻地为：五原一个大队，临河一个大队，其余两个大队在陕坝（长官部、省政府都在陕坝），东胜一个分队，西山咀、扒子补隆、三道桥、三盛公、黄羊木头、蛮会、太阳庙、桃力民、渡口堂、马七渡口、碱柜等地，都有三、五人的分所。

前在宪兵大队密派到包头、归绥、大同、张家口、北平、天津及汪伪政府，以及打入奋斗中学（傅创办的）、国立绥中、省党部、长官部的政治部（系蒋派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坐探。还有派入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伊盟守备军陈长捷部、中央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的密探，仍顶入侦查总队编制名额内，但其工作则归长官部副官处第三课指导，侦查总队不得过问。

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侦查总队随长官部东迁，并改为第十二战区侦查总队，在归绥停留不久，总队部带领两个大队东进张家口，在包头留驻一个大队、归绥一个大队，其余各县、各车站都无分所，只在来往绥境的火车上派有两名查车的侦查兵。

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后，把驻包头和归绥的大队，各留下一个分队，其余都调往北平。在平津解放后全部瓦解。

留驻绥远的两个分队，由董其武指挥，在平津战役前夕，董其武想把这两个分队合编补充，成立一个宪兵营，因北平解放而告终。

“九·一九”董其武率全军起义，至此，傅作义的宪兵队亦告终结。

国民党特务在河套的暴行

苏希贤

1939年末至1940年春，正当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下，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时候，而傅作义将军所部却能以劣势的装备取得名震全国的“五原战役”的胜利。这使蒋介石认为：这显然是傅在晋西北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了他的部队，在“五原战役”中得到共产党帮助的缘故。蒋介石觉得，如果不及时制止，傅部就会逐渐质变；成为未来的“大患”。因此，他要傅作义加强“防共”和“清除内部”。并于这年7月派特务头目张庆恩来绥西陕坝接任省党部书记长，总理其事。

张庆恩为了掌握中共在绥西的活动情况，到任不久，即派他的心腹张忠一，以视察党务为名，赴临河、五原、安北三县进行侦察。张忠一侦察到的所谓“涉嫌分子”，其材料多半来自1939年夏秋两季傅作义在五原新公中和临河百川堡召开的“抗战建国讨论会”与会人员在大会小会上的发言记录，并将他临时搜集到的片断材料

拼凑在一起，和张庆恩综合判断整理后，拟定出“黑名单”，即上报“中统局”，作为扣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依据。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张庆恩就指挥调统室的特务，发动了所谓“清除内部”的大逮捕。从1940年9月开始，他们先后在陕坝、临河、五原、安北及伊盟东胜，扣捕了程昆山（后改名为程又新）、陈元甫、刘光明、高大羽、李佩衡、马汝才、王福田，刘映元、刘进仁、李丕才、周鸣、安建国、王海周、贾润芝、王国华、王会文、陈怀珍等十多名绥远省各级动员委员会和绥远土地委员会的人员。由于陈元甫、程昆山的叛变，又使临河、五原两县一大批进步农民被捕受害，使五原农村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全被破坏。从1940年9月到1941年夏初，在短短几个月内，被特务们先后扣捕起来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以及进步农民约计二百余人。特务们对这些人的暴行折磨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尤以张庆恩亲自策划的“巴拉亥事件”为最。

1940年冬初的一天，从伊盟到陕坝购买粮食的农民马汝才，住在一个小店里突然失踪。几天后，人们才知道马是因为在饭馆吃饭，酒后失言，露出破绽，被特务张忠一听见，立即扣捕到陕坝忠孝街一处秘密刑讯室进行逼供。张忠一从

马汝才带有矛盾的供词中，企图找出共产党在河套地下组织的线索。张庆恩得报后，认为机不可失，便立即指令特务张忠一、祁觉民、崔希云等人，率领武装侦察奔赴马汝才在临河城南住过的“魏羊馆地”各村进行搜捕。几日之内，扣捕了进步农民几十人，均陆续送往陕坝审讯。

在审讯时，有个年过三十、名叫宋四贵的人，此人态度强硬，破口大骂特务破坏抗战。特务们一听，便知这话里有话，就更加严刑拷打，在张忠一和张立德几个特务打手轮流拷打一昼两夜之后，仍毫无所得。特务们认为硬的不行，又改用软的，由张忠一亲手把宋四贵放下松绑，立刻换了一副笑脸，好言安慰。并口口声声地“老哥”“长”、“兄长”短的拉起本地老乡关系来。随即又用炖猪肉、大米饭置酒款待，还安排在暖屋子里休息。这么一来，宋四贵便在特务们软的一手诱惑下，背叛了人民，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

张庆恩获悉，喜不自胜，便立即和张忠一、祁觉民等谋划商定，请示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秘书长曾厚载同意，由张忠一和祁觉民率领武装特务和侦察兵等共约二十人，由叛徒宋四贵作眼线，二次去临河搜捕进步群众和共产党员。并连夜到临河对岸的巴拉亥，把去伊盟桃力民向上级党汇报河套特委工作而途经巴拉亥的共产党员、

河套特委书记郭北宸同志扣捕。特务们又在村子里进行了大肆搜查，遍掏房梁椽眼，获得了一些有关文件，即当时特务们所说的“巴拉亥文件”。张庆恩得此文件，如获至宝，经他亲自整理，排列编号，装订成册，誊录副本两份，一份留存“调统室”，一份送达傅作义，原件则遵照“中统局”电示，呈报重庆。

中统局收阅“巴拉亥文件”后，指示张庆恩要严刑审讯，彻底弄清，企图扩大扣捕范围，把在河套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但是只凭文件内容捕人，张庆恩觉得尚有困难之处。于是，特务们便向郭北宸同志施以酷刑，软硬兼施，力求补救。

特务们对郭北宸先是吊拷鞭打，继而又压杠子，跪碗碴，以后又步步升级，给他灌凉水、灌辣椒水、灌煤油、坐老虎凳、加油楔，企图用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逼郭北宸同志招供。但郭北宸同志宁忍裂身之痛，也不失坚贞之心。他在敌人严刑逼供面前，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却丝毫没有暴露别的同志，也只字未吐党的任何机密。

敌人看到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次，张庆恩把郭北宸叫来，用美酒好菜，设宴款待，并许以高官厚禄，劝郭北宸“走另一条路”，遭到郭的严词拒绝。张庆恩黔驴技穷，又别有用心地派

女特务到牢房里为郭北宸洗伤敷药，妄图用这种卑鄙手段，诱使郭北宸同志屈服就范，但同样遭到郭北宸同志的痛斥。对郭北宸同志这种不为富贵所动、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女色所诱的浩然正气，特务们再也无以为计。

张庆恩在郭北宸身上费尽心机，毫无所得，焦虑得这个特务头子神经衰弱，夜不成眠，其病日甚一日，卧床不起。“调统室”内部的几名特务，乘张卧病之机，互相争夺权利，矛盾发展日益尖锐。到1942年6月下旬的一天，郭北宸同志被特务们从“战青团”提解回陕坝省党部，接受最后一次审讯，敌人仍无所获。第二天，特务陈国兴手拿重庆中统局来电和张庆恩给长官部秘书长曾厚载报批的签呈一纸。到了司宁房间，经过秘密策划，张庆恩即派崔希云和司宁，又带一名特务，用省党部的马车把郭北宸同志拉上，扬言要送兰州“西训团”受训。当走出陕坝十多里的刘七贵地方，趁附近芦苇滩无人，即将郭杀害。特务们草草挖坑将尸体掩埋后，立即回去报告，说是因为中途逃跑，将他击毙。当然，这样杀人也不行，但为了掩人耳目，只好将崔希云等三人暂时关押，听候处理，敷衍了十来八天放出了事。因为当时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对共产党人不能公开处决。张庆恩和陈国兴再三安抚崔希云、司

宁和另一名特务说：“事关机密，不可泄露，此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万一发生问题，谁能负起这个责任？”

郭北宸同志是河套地区早期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光辉典范。他出生在山西省左云县助马堡村一个农民家里。因家境贫寒，幼年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直到十九岁时，才进入县立第一高小。他的叔父曾给阎锡山当过排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阵亡。他以阵亡将士子弟的身份，于1931年就读于太原遗族学校。毕业后，到太原兵工厂当徒工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在党的培育下，锻炼成为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35年，郭北宸同志参加了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举办的“乡村建设委员会”指导员第一期训练班。受训六个月，被分配到兴和县，后调到归绥县任乡村指导员。日寇侵占绥、包后，他和战友随部队撤退到河套陕坝。在绥远省游击军政训处我党地下领导人的教育帮助下，进步很快。1938年，郭北宸在五原工作时，经中共河套特委宣传部长刘一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党派郭北宸同志去安北县，在绥远省游击军第二支队宣传队工作。次年，离开部队转入地方。在其他同志的配合下，建立了安北县小学教

员救国联合会和安北县民众抗日后援会，又先后接任中共安北县委书记、中共河套特委组织部长等职。1940年冬，接任河套特委书记。他被害时年仅三十一岁。

在“清除内部”的大逮捕期间，特务们审讯被捕人员，除了常用前边所述的种种酷刑外，有时用挖好土坑准备活埋的办法，把被审讯者推到坑内，拥土没膝，进行逼供。有时还用手枪对准被审讯者的脑袋加以威逼。由于审讯时，特务们的诈唬声、斥责声和被害者的惨叫声常常传到外边，不仅街坊邻里为之惊骇，也不利于保密，因此“调统室”便把审讯室由陕坝普爱巷二号移至“张维世圪旦”南的一个独院，任由特务们在那里滥施酷刑。

在这个所谓“清除内部”的大逮捕告一段落后，有些人仍被关押继续审讯，但多数人则被送进“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即集中营）受训。至于被捕的农民，后来有的讨保释放，有的也送到“战青团”，经过较短集训，写了“悔过书”，讨保释放。但这些人回乡之后，并不算事情了结，而是把他们编到“管训小组”管训，并由各县县党部随时考核监督。

笔者1939年至1942年在绥远省动员委员会（地址在陕坝）当干事，曾见过郭北宸同志，对他

的遇害经过和当时“清除内部”的大逮捕情况亲有见闻。我们省动员会的几个人，如罗吉照（我的上司）、王滋桐、张亨信、耿吉午（郭北宸同乡）等，常在一起议论，使我印象最深。又且在郭北宸被捕地的巴拉亥村，有我的表舅杨海，曾跟我说过郭北宸被捕经过，现还记忆犹新。1942年夏，实行新县制，我被调到晏江县政府工作。是年秋，国民党绥远调统室又进行过一次大逮捕。晏江县有王鸿雄、张玉书、张玉庭、耿吉午、韩俊杰等二十多人被捕。当时我因和韩俊杰说了些不满时弊的话，被特务们听见，说我有思想问题，被收监一个多月，亲身尝过坐老虎凳，加油楔的酷刑滋味。这种刑罚是把两条大腿绑在长板凳上，从小腿部下往进加砖。加至两三块时，就疼得忍受不了而昏死过去。后来粮食科长王廷奎硬保我没有问题，才放我出来。其他人都会被送到陕坝“战青团”受训。在那个年月，凡是被特务认为有点嫌疑的人，都会被戴上一顶“红帽子”，遭到扣捕迫害。结果搞得人心惶惶，都有一种朝不保夕之感。由于我对这段历史有所闻所见所历，又参考有关资料验证，写成此文，以供参考。

五原县参议会的回顾

刘仁俊 张杰 白焕瑜 忆述

武英士 霍正富整理

五原县参议会是1945年冬跟绥西各县市参议会同时成立的。在成立时，先由全县各团体和各个乡、镇按照县里给分配的名额，民主选举产生出席县参议会的参议员。然后将各选出的参议员统一报县核定后，再由县长主持召开首届一次参议会。在首届一次会议上，再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议长和副议长。随即由议长主持会议，宣告参议会正式成立。县参议会按规定是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例会，而实际上，却因各种原因多不能按期召开。五原县参议会在第二届后一个阶段，仅仅召开过一次会议。参议会每届任期为二年，任期届满后，仍由全县的各个团体和各个乡、镇，按照分配的名额，改选新的参议员。县参议员可以连选连任，参议员改选完毕后，报县里核定，由旧议长主持召开二届一次会议，同样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新议长和副议长。新议长主持会议，继任议长职，前任议长就

此卸职。五原县参议会跟绥西其他县市参议会一样，寿命均为两届，时间是从1945年11月到1947年10月为第一届；从1947年11月到1949年的9月，奉绥远省令撤销时为第二届。

二、参议会的本质：

旧社会的参议会，从名义上看，它是一个民意机构，是代表各界人民利益，是为各界人民服务的。而实际上，它是完全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那套议会制度，假借民主形式，盗用民意，用以欺骗人民的。是完全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从五原县两届县参议员的成份来看，除了一、两个教育、医务工作者外，其余都是地主、资本家，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从其职能来看，当地参议会按理是有权向当地政府要求执行其决定议案的，反过来说，当地政府如果要是推行一些有利于地方的建设事业，或向当地参议会提出些建设性的交议案，参议会也应给予通过，给予支持。而五原县参议会自成立以来，对全县范围内比较重要的设施和财经预算，县府固然要在参议会开会时作出报告，提交参议会，审查通过，或作出决定。但因彼此因职权不同，其主张也往往各异。如政府主张要办的，参议会总是尽可能地迁就考虑，一般给予通过。但是有些不合理的主张，一经参议会否定，县府则可不听。它还可直

呈上级，请予另行核准执行。可是有些参议会按民意主张要办的事情，假如县府不同意，就会遭到阻拦。当然有时县府也给转报核批，可是这个批就成问题了，有时即便是批了，也行不通。如在1947年五原县政府依据上级的旨意，将扩充警察编制，加大警察局的预算，提交县参议会核议，被县参议会否决。但县府不从，将其转报省府后，省府则按县府的意图给批了。参议会也只是看得两眼，奈何不得。又如五原县清剿团的组建，县府早就按照命令予以执行，可是拖到1948年9月，县府才将清剿团的经费预算提交参议会交议追补。尽管参议会与县府常有矛盾，也否决过县府的一些提案，但多数还是开了绿灯。这样县府那些反人民的决策，一经参议会审议通过，就算取得合法地位，县府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强令执行。由此可见，参议会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是反动政府反人民的帮凶。

届别	职务	姓名	家庭成份	界别	备注
第二届	参议员	甘雨霖	地主	平太乡	由小学校长魏建德继任
"	"	卜根长	"	平元乡	
"	"	马唐	"	平乐乡	

五原县两届参议会成员情况一览表

届别	职务	姓名	家庭成份	界别	备注
第一届	议长	刘仁俊	教育工作者	教育工会	
"	副议长	白焕瑜	地主	隆镇	
"	参议员	王乐瑜	"	农会	
"	"	刘文	"	"	
"	"	车云生	资本家	商会	
"	"	赵明	手工业资本家	工会	
"	"	刘树滋	中医师	医师工会	
"	"	党伯伟	地主	中诚乡	后由张喜兰递补 张系地主
"	"	李述唐	"	"	
"	"	王贵成	"	中忽乡	
"	"	白焕彩	"	中元乡	
"	"	张映奎	"	正风乡	
"	"	吕子卿	"	正礼乡	
"	"	张清	"	正心乡	
"	"	刘裕糖	"	平善乡	后由张成录继任， 张是地主
"	"	辛志强	"	平安乡	
"	"	卜根长	"	平元乡	

届别	职务	姓名	家庭成份	界别	备 注
第一届	参议员	甘雨霖	地主	平太多	
"	"	马 唐	"	平乐乡	初选参议员是张守仁张后任副县长职务
第二届	议长	白焕瑜	地主	中兴乡	
"	副议长	李述唐	"	中圣乡	李补省参议员后，由刘仁俊递补。
"	参议员	刘 文	"	农 会	
"	"	杨文秀	"	"	
"	"	赵 明	手工业资本家	工会和商会一人	
"	"	安建国	党部秘书	隆 镇	
			书记长		
"	"	刘仁俊	教育工作者	医师 工会一人	
"	"	张喜兰	地主	中诚乡	
"	"	白焕瑜	"	中恕乡	
"	"	张映奎	"	正风乡	
"	"	张 清	"	正心乡	
"	"	张成录	"	平善乡	
"	"	辛志强	"	平安乡	

救 济 总 署

王兴亚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为在中国收买人心，变中国为它的附庸，以联合国的名义，拿出一些物资，救济中国贫民，特在首都设立救济总署。

救济总署由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蒋廷黻任总署长，由美国派来的麦克尼斯为总办，内分总务、物资、运输、核计等四处。

在北平、沈阳、太原、重庆、武汉、西安、广州、昆明等各大城市设有分署。每个分署负责两省或三省的救济事宜。当时绥远省的救济工作归太原救济分署负责，分署长是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政治部中将主任张彝鼎担任。省以下不设救济机构，而由省方指派专任单位县、乡、保负责。

救济的物资为面粉、医药、现成的衣服、鞋袜、罐头、饼干、毛毯、线毯以及少数皮帽、皮鞋、棉手套等。

救济的对象，是难民收容所、养老院、育婴

堂的人、城乡贫民、鳏寡孤独和病残无人赡养的人以及灾区的人。医药多分配在各慈善医院，如平民医院、红十字会、卍字会等。

发放救济物资，没有固定期限，往往是隔一月、两月或几个月才发一次。凡被登记的贫户，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救济物资，而是挨户轮流，按领到的数目分发。

本来从上边发来的救济物资为数不少，一次，我看见从火车上运到包头的物资就是十二个车皮。可是经过分署、省、县、乡、保、甲的层层盘剥扣压，最后真正分到贫民手里的，也就是“要也可，不要也可，吃不成、穿不成”的东西了。

那时老百姓把救济的物资分作七等：第一等为最好的毯子；第二等为次好的毯子和最好的衣服、上等罐头；第三等为最次的毯子、较好的衣服及罐头；第四等为线毯、面粉和不好的衣服、较好的鞋袜帽手套、中等的罐头饼干等；第五等为少数面粉、最次的衣物。到六、七等上，连面粉、大的衣服、皮帽、手套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三、两岁小儿穿的旧衣服、尺许长的女人穿的旧高跟鞋。虽然还有点饼干、罐头，还必须是有乳儿和有病的才能分给一两筒。这就是由总署到贫民七个阶层，按阶层把救济物资分成七等，

每个阶层把每个等级的物资都扣留了。

各阶层为了瓜分、贪污救济物资，经常发生伤害、斗殴、争吵等事。太原救济分署的科长们，因分赃不均，打伤了一个，另一个因伤害罪被判徒刑三年。省县及以下，也不断发生殴打争吵事件。此事我在包头所见所闻的就有不少。

我的家住在包头西前街一个小院的东房，院内西房是一个保长办公处。每到领发救济物资时，不是甲长来找保长大吵大闹，就是户民哭闹着来找保长，骂声、吵声，每天要闹到半夜。有的甲长把所领东西扔下不要，骂着走了；有的甲长揪住保长去区上评理。在任何一次领发物资时，没有平安无事过一天。

一次，一个未过满月的产妇，抱着乳儿来质问保长：“我的小孩还不到满月，他的小孩快一岁了，为什么分给他两筒牛奶，我连一筒也不给？我非到市政府告你不可！”她跟保长吵闹不休，结果保长给她两筒牛奶，并说，“下次可没你的了”。

有一次，我看到保公所领回不少物资，其中有面粉、线毯、大的衣服等，比以前领到的要多十倍。过去从未分配的物资，这次也分配了。凡是救济户登记有案的，都分到了面粉、大些的衣服和罐头等。这次虽然发生了小的争吵，总算是顺利

地分配完了。后来才知道上边有通知，救济总署和分署要派员来视查了解省以下的单位对救济物资的分配情况和地方民众的反映，并且还有美国人参加调查。

还有包头县某乡，为领发救济物资，纠集乡民二十余人，打伤了保长、乡长和乡指导员，捣毁了乡、保公所，后经省里派员查明，将带头闹事的乡民逮捕法办，将乡长、乡指导员和几个保长都免去职务，并追还了所贪污的物资。

因为当时救济物资从上到下层层截留贪污，因此有人在大街上贴了黑报说：应在救济总署和救济分署后边再添一个“长”字，在省、县、乡、保前面各添“救济”二字，后面各添一个“长”字，这样就名副其实了。

这个救济总署从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到一九四七年的八月，开张一年多的时间，就停止营业，关门大吉了。

保甲制度在河套的推行

苏希贤

国民党保甲制度在河套推行，是从1942年才开始的。1939至1949年间，我在临河、陕坝、五原、晏江、安北以及固阳等县市做过十年地方行政工作。对傅作义先生在河套推行保甲制度的情况比较了解，现将自己所历所见所闻，写成此文，以供参考。

关于闾邻新村制的建立

河套地区在未实行保甲制度之前，其基层政权组织是实行的闾邻“新村”制。其大体规定是：到十户为一邻，设邻长；五至七邻为一闾，设闾长；七至九闾为一村，设村长。这个“新村”是从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承袭过来的。傅作义虽在1930年就主绥政，但当时绥远的一切军政实施都得受山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节制。就连绥远各县县长的任命，也得由阎锡山推荐委任。又且河套是阎锡山的军垦地区，一切政权组织必得仿照山西的模式建立。阎锡山为

了巩固和发展他在绥远的统治势力，考虑到与河套毗邻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对河套的影响，想在河套实地试行其建设新农村的方案，以与红色边区的土地革命抗衡。于是他以军垦部队驻屯所在地的32个村落为示范点，普遍建立以闾邻为基层建制的“新村”。他标榜在新村内实施“政治民主”与“经济均产”，想着通过改革，变农村土地私有制为“土地村有制”，进而做到以村集体生产与生活，以振兴农村，寓兵于农，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

同时鉴于工农民主红色政权在全国各地的不断建立，使阎锡山意识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他统治晋绥两省的威胁。为了“防共”，他规定凡住在新村二十到四十岁的壮丁，都要接受军训，以担任“守望巡逻”、“清查户口”、“剿除匪患”、“绥靖治安”，以及“防御水火灾害”等职责。当时傅作义也推行“乡村建设”新政，各乡村都配备“乡村建设指导员”专职干部，与阎锡山的“新村”建设实施并举并进。

阎锡山为了显示“民主”，笼络人心，还规定在“新村”内部设置五个机构：（一）村民会议，为新村内的最高权力机关。其职能是：行使选举村长、村副及村民委员会委员和创制“村民公约”、议决村中兴革事宜；（二）村民委员会

(亦称村公所)，是执行村政之机关，执行者为村长、村副；(三)调解委员会，调解村内民事争端；(四)监察委员会，检查村内的公共财产，监察办事各机关；(五)经济建设委员会，兴办村内各种公营经济和公益事业。其经济建设的原则有三：一是平均发展，实行均产；二是生产、消费、分配合理化；三是创办合作事业，同步发展。其合作组织之建设有四项：(甲)，建立信用合作社，主持新村之金融与信贷；(乙)，创立公营贸易所，购置供应村民的消费品，运销村民的生产品；(丙)，组织农业经济合作社，主持农事、农具之分配，制订种植计划与产品保管；(丁)，联合邻村合组试验场，以改进农业。此外，在新村内还实行全民教育，进行国防教育，并开挖渠道，兴办水利。举办社仓，赈济与抚养孤寡老幼。建立医院，开展卫生保健。阎锡山总的目的，是要在新村内做到“幼有所育，壮有所业，老有所养，智有所用”。

综观上述新农村建设之组织纲领，可以看出阎锡山原想振兴河套农村经济，以刷新国人的视听。只因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使他这个在河套建设新农村的计划，只是在新公中、永安堡、百川堡、良忱乡、八岱等屯垦新村点上付诸实施，没有

来得及在面上全面推广，面上只是编组了邻间组织。

保甲制在河套的推行

1938年冬天，国民党统帅部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为了削弱阎锡山的势力，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绥远省主席，并指定在河套设立“副司令长官部”，这使傅作义早就盼望离晋返绥的愿望得以实现。1939年春天，傅作义摆脱阎锡山的束缚，从河曲率部进驻河套五原，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绥包沦陷后流亡到榆林的绥远省政府亦于这年冬天迁到陕坝。第二年，长官部亦自五原移驻陕坝。此后在八年抗战中，河套成了绥远抗日的重要基地。

1942年，傅作义出于抗日和“防共”的需要，在行政体制上达到统一，以储备和发展抗日力量，决定在抗日根据地的河套实行“新县制”。新县制的实行，在行政组织上废闾邻，立保甲，缩大乡，划小乡，裁区增县。在河套新组建了米仓、狼山、晏江三个县，加上原来的临河、五原、安北三县，总共发展成六个县。陕坝太安镇升格为市，称陕坝市，是绥远省战时省会。全河套由原先36个乡镇增加到86个乡镇。乡

的面积缩小了，乡公所的人员增多了，乡长的权力扩大了，由原来的民选变成成为省政府委任，强化了乡级政权。

实行“新县制”时对保甲的编组，一般是每乡四至六个保，每保五至七个甲，每甲十几户到二十几户，大体上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甲。每保设保长一人、副保长一人、保警（老百姓称跑保的）一人，组训“国民兵”的保队副一人，专管征购粮的保干事一人。一个保总共不过一二百人家，就常设五个办事人员，以此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与统治。

保甲制度的沿革

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曾使用过的一种统治人民的基层组织制度。据考证，在北宋时代曾实行过保甲制度。国民党蒋介石于1932年在鄂、豫、皖三省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时，从总结前三次围剿失败中看出，“仅凭军事力量想根绝共产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所以在第四次围剿中，他要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作战方针，“争取民心”，以消灭红军。怎样争取民心呢？最主要、最具体的措施，就是在鄂、豫、皖三省实行北宋时代实行过的保甲制度。就在这年八月，蒋介石以“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的名

义，颁布了《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明令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开始实行保甲制度。1934年11月，国民政府在蒋介石授意下，更把这一制度令行全国实施。但在阎锡山控制下的晋、绥两省，直至抗日军兴后的1937年以后才渐次施行。而河套地区是因傅作义与阎锡山于1939年分家进套后，先是忙于整军备战，抗击日寇进犯，到1942年才开始推行。

按蒋介石当时所令行的保甲体制编组是：户为最基层的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一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保设保长；七至十保为一联保（相当于乡），联保设联保主任。蒋介石把他在部队中用过的最残酷的“连坐法”加在全国人民身上，把所有的人民不分职业、地位、性别、年龄，全部编组起来，以甲为单位，让老百姓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在“切结”内的各户，“声明相互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速密报惩办；倘若瞻私隐匿，各户应负连坐之责”。这个“连坐法”的实行，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民主自由权利。它象一条绳索，把老百姓捆绑住动弹不得。而当保甲长的，多是豪绅地主或其爪牙，这样就把所有的土豪劣绅组织了起来，给他们以压迫人民的合法权利，使这些人聚拢在蒋介石的周围，为其“剿共”竭

尽全力。

蒋介石所颁布的《剿匪区内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中规定，凡是编入保甲的人民，都要实施“国民抗敌公约”。“公约”要人民以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如违誓言，依法治罪”。用这个“公约”禁锢了人民的思想，控制了人民的革命活动。

蒋介石这个《保甲户口条例》没有给人民半点民主自由权利，但对人民所要负担的各种义务却规定的无微不至：如修筑碉堡、修建公路、输送作战物资，都要人民来做，如稍有迟缓违误，即要治罪，对老百姓的婚、丧、嫁、娶、出生等也得一一呈报，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关于保甲内所需的经费，《保甲户口条例》规定，“都由保内住户征集”，这又给土豪劣绅以敲诈勒索的方便。“条例”还规定，保甲长的职权“是政府官员的助手”，他可以“监督、教诫、看管、处罚、督率保甲内的人民”。这就使保甲长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当时有些保甲长，也确实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人民对保甲长惹不起，愤恨地诅咒保甲制度说：

“保甲、保甲，人民披锁又带枷”。又有一段流传的民谣说：“保甲长进了户家院，里里外外

打量了个遍，查户口，派负担，敲诈勒索不安然”。这是当时蒋管区人民对保甲制度坑害人民的生动概括，也是对保甲制度憎恨的一种反映。

傅作义强化保甲制度

傅作义于1942年在河套实行“新县制”后，在推行蒋介石的保甲制度上又有新的发展。他在临河八岱给“绥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五期学习新县制的学员讲话时说：在河套编组保甲，实行的是管、教、养、卫“四位一体”并举。他解释废闾邻、设保甲是“管”；乡设中心小学、保设国民学校、县办民众教育馆是“教”；省县设立地政局、科，进行地籍整理，把清丈出的多余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并实行“二五减租”，减轻农民负担是“养”；训练国民兵，组织乡自卫队和县保安团是“卫”。做好这四件事，积蓄抗日力量，就能达到“抗日必胜”，“建国必成”。

实行新县制后，傅作义为了征兵打仗的需要，仿照日本人的办法，给河套人民填发“良民证”。这个良民证是用白市布制成的二寸半长，一寸半宽的长方型布块，就象士兵佩带的“符号”一样，上面印就姓名、性别、年龄、籍贯、

住址、特征和贴像片的方格（没像片的用指纹代）等项目，凡年属18岁（女16岁）以上的国民，每人必须领带一枚，才能证明你的身份是“良民”。带上这个良民证（老乡称）“生死簿”，出门经过关卡查验无误即可放行，否则寸步难行。

在填发良民证时，又给保甲长留下了敲诈勒索的“吃口”。那些和保甲长有嫌怨的人，如不先给贿赂“敬贡”，就会受到挑剔刁难，就要费好多周折麻烦。清查户口时，检验“良民证”是第一道手续，如果丢失或新来未领的人，保甲长不给疏通，说声“不认得”，就会被县乡查户口的当成“汉奸坏人”，立即带去机关，拘押审讯。保甲长一旦吃到当事者的贿赂，再给查户口的人分送点“人情”，钱可通神，也就没事，即可放行。象以此狼狈为奸、鱼肉人民的，在那时并不少见。

在填发“良民证”的同时，就便登记户口，发放门牌，以稽查“汉奸坏人”。当时由省政府发来一张“十二属相岁数对照表”，各乡的乡长、干事在保甲长的导引下，挨门逐户查问壮丁属啥，并观察面貌，辨识壮丁的真实年龄。好多人为了不当兵，隐瞒了岁数，但有的人忠厚老实，忽略了虚报属相，以致四十岁以里的人虽然

留下了胡子，也混不过去，想逃避当兵，万不可能。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河套抓兵时，由于保甲制度的严密无漏，不论岁数大小，只要是壮实的男人，都被抓去当兵。如果碰上老汉，保甲长也有办法：那就是“剃头刮胡子，把个脑袋换”。因此河套人民咒骂保甲制度说：“保长甲长和乡警，凶神恶煞转周城，要粮抓兵灰折腾，害得百姓不安宁。”

在登记户口的基础上，也仿照蒋介石“连坐法”的办法，以甲为单位，办理联保连坐“切结”公约，凡是联保内的各户，都在“切结”表上签名划押。“切结表”一式两份，一份交乡公所备查，一份由甲长留存执行。在当时“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非常时期，住在保甲内的人都得相互联保起来，如果一家有窝匪、通匪事情，他户隐不举报，就得受到连坐处罚。真是一家有事，四邻不安。同时为了“防共除奸”，保甲制度实施后，不准人民分散居住，强令分散居住的民户，都得搬到大村内居住，以便保甲长的监督控制。对因贫寒而搬迁有困难的户，当时的政府也不管，一律强制搬迁。河套人民怨声载道地说：“联保连坐连环套，折腾得百姓受不了！”

这个“联保连坐法”对人民来说，是一个紧箍咒与绊脚索，套住人民不自由。年青的人去当

兵，年岁大一点的人走民工，各户负担的军粮、田赋和捐税等摊派，都必须依时按数交清，如果一户交不清，他户都有督促以至垫交责任。贫困农民被保里号下当兵，或是交不起负担也不敢轻易逃跑。因为在联保连坐的保甲制度下，跑了既怕连累他人，又怕殃及妻儿老小，所以只好坐等被抓，或忍受捆绑吊打。河套人民为此叫苦不迭地说：“房漏偏遇连阴雨，坐船又碰顶头风，捶胸顿足问苍天，世道何日得太平！”而地主老财则不怕“联保连坐”这一套，因为一来保甲长是他们自己的人，二来与上边的人有拉拢，给吃上好的，拿上硬的（现大洋）应付应付，总会照应。而苦了的就是那大众贫寒老百姓。

傅作义为了强化这个保甲制度，从1942年开始，不但县乡干部要去绥干团受训，连保甲长也要接受县里组训。陕坝的绥远奋斗日报社，每月还出刊一期《贯彻》刊物，分发到县乡基层，作为指导办好保甲的参考资料。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民主建政，河套人民才摆脱了保甲制度这个枷锁，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各种特务组织在河套的 活动及我肃特概况

李珍整理

河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成立较早，成员较多。解放前，对我党地下工作、民主运动不断进行破坏，逮捕杀害了不少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们又改头换面，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活动。

因河套解放较晚，外地的特务分子也大量涌来这里，钻入各个阶层，有的甚至拚凑成了新的组织，与当地特务互相勾结，利用潜伏电台，与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联系，接受指令，造谣惑众，策反起义部队，进行破坏捣乱。解放初期，为了保护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牧业生产，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肃特斗争。现将解放后河套地区的特务组织情况和解放初期的肃特斗争简要记述如下：

一、解放前河套地区的特务组织

(一) 中统（亦称调统）特务组织。

河套地区中统特务组织是1940年在陕坝建立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陕坝是绥远省政府所在地。这年7月，蒋介石指派天津市中统负责人张庆恩到陕坝，担任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张任职后，组建了“绥远省调查统计室”并兼主任，地址设在陕坝普爱巷5号，由张忠一（陈国兴）主持。内设秘书、译电、情报、侦察、管训、统计、事务等股，下设陕坝通讯网和宁条梁、榆林两个据点，共有特务240余人。抗战胜利后迁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省调统室成立不久，即指令临河、五原、安北三县（当时河套只有此三县）党部书记长白焕瑜、马学援、荣生华兼办调统工作。

当年秋，在陕坝成立“绥远省党、政、军、团特种会报（简称特种会报）”。张庆恩任主席，下设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研究、总务、指导三个科。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在临河、五原、米仓、狼山、晏江、安北、六县先后成立“特种会报”。各县“特种会报”均设主席一人、秘书一人，内设执行、除奸、肃反、侦察、行动、审讯、统建运动等组。“特种会报”的任务是：统一指挥党政军团的情报交换。

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起，绥远省调统

室在河套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并在陕坝西的长胡子圪旦（现南渠乡永长村）设立了临时拘留所。开始时，押着10名“问题已搞清的人”，以后逮捕的人员陆续增加。同年4月成立“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战时青年训练团”，张庆恩兼主任，张××任总干事长，其任务是集训扣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并从叛变分子和不坚定分子中选拔一些人为其充当特务。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将该团改称为“第八战区长官部战时青年训导团”。樊××接任总干事（病后由辛××接，不久由王××代）。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将团址迁到张威世圪旦（现杭锦后旗光荣乡），由吴××接任总干事。总干事下设队长、军事管理员、事务员、指导员。抗战胜利后，该团迁归绥市石塔寺召。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与统建队合并。

民国三十九年（1940年），在米仓县成立“第八战区便衣混成爆破队”，负责训练行动特务。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秋，各县党部设立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专查共产党地下活动，并监视党务干部思想言行。

同年7月，成立通讯网（党纲）。各县、市通讯网的书记长是：五原白焕瑜、晏江李述唐、

临河王炜、陕坝董淑明。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8月，中统局为了监视绥蒙边境政治、军事动态，特令绥远省调统室在陕坝（有的资料为临河）设立“绥西分区”。王炜兼主任，化名严×，李××任副主任，兼书记。并配电台一部，直接与南京调统局和省调统室联系。该组织下设狼山口、太阳庙、乌兰不浪3个据点。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撤销。

另在各县、市设有民谣站，各站均设站长一人。并且建立了各种名目的情报组织。如米仓县的“戡乱建国委员会”、“敌后小组”、“米仓情报组”；五原县的“金星五情报组”、“华北办事处五原联络组”、“陕坝师资培训班驻五原通讯员”；狼山县的“秘密组”、“督导站”；临河县的“华北办事处联络站”，“党政特别小组”；陕坝市的“华北办事处联络站”、“陕坝省立师范学校师资进修班”等。

（二）军统特务组织

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军统局在五原设立办事处，后迁陕坝，对外称“第八战区长官部统计室”，后改为“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统计室”。先后由马××等五人担任正、副主任。

内设督察、总务股、情报股、人事股、警卫组，下设行动队、情报组，并有直属通讯员若干人。他们配有电台，专门搜集情报，进行暗杀、侦捕、破坏等活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改为保密局绥远站，迁归绥市，在五原留下了潜伏组。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在陕坝成立缉私处，名义隶属财政部，实由“军统”掌握、运用。处长马××，副处长冯××，专员徐××，内设总务科（辖人事、文书、会计、总务等股），查缉科（辖情报、税警、司法、保管等股）。下辖6个查缉所和8个分驻所。

6个查缉所是：

陕坝查缉所、安北查缉所、善克提查缉所、五原查缉所、榆林查缉所、东胜查缉所。

8个分驻所是：

安北查缉所管辖的四柜、马七渡口、林保卫三个分驻所五原查缉所管辖的乌镇、碱柜两个分驻所，和榆林查缉所管辖的3个分驻所。

陕坝查缉所辖园子渠、三淖、头道桥、百川堡、陕坝、临河6个据点。

缉私处的任务是：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和搜集情报。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第十二战区

司令长官部邵××，组建了保密局菩克提办事处。全称为“保密局驻蒙区情报办事处”，主任巴××，下辖自治队、电台队。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撤销，但仍留有特务活动。

民国33年（1944年）1月，在陕坝成立“军事委员会第四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即陕坝中美训练班），地址在陕坝西北的大顺城村（现杭锦后旗光荣乡团结四社）。主任由军统局头子戴笠兼任，副主任为高荣，教育长是饶××，刘××。

陕坝中美训练班前身是“通讯训练班”。民国29年（1940年），第八战区挺进纵队指挥官高荣，在重庆接受戴笠的任务，在米仓县二道桥（现杭锦后旗二道桥乡）建立。该班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3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班。共训特务两期。第一期200余人，学习内容为通讯联络、潜伏隐蔽，学期两个月。第二期300余人，学习内容为行动破坏和爆破等，学期5个月。两期学员均来自自卫队中的骨干和青年学生。

民国31年（1942年）6月，在陕坝成立“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绥远邮电检查所”，陈××任所长，内设审查组，外辖临河、五原、东胜邮检组。其主要任务是，控制邮电，检查新闻、信件，搜集情报，查扣进步书刊，控制新

闻。到民国35年（1946年）3月撤销。

民国35年（1946年）4月，建立“保密局西北特区宁夏站派驻临河磴口情报组”，组长魏××。民国36年（1947年）配备电台，当年12月，组、台同时撤销。

民国35年（1946年）9月，建立“保密局驻热察绥蒙旗联络专员办事处通讯组陕坝支台”。组长孙×。下设18个组、台，在河套地区的有三个：（1）后套组台、驻陕坝；（2）五原组、台；（3）柳树泉子（现乌拉特中旗宏丰乡境内）组台（亦称乌盟组、台或中公旗组、台）。

在河套地区的军统特务组织还有：国防部空军总部中央防空情报所绥远支台五原分台和陕坝分台，军委会驻狼山地下军，西北区军统驻陕坝联络组，保密局驻晋北站大同组驻五原小组等。

（三）国防部二厅特务组织

国防部二厅特务组织，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中的公开特务武装与“军令部第二厅”合并组成的。亦称“军事委员会第二厅”。

民国32年（1943年），军令部第二厅为了搜集绥远省境内各蒙旗及外蒙情报，派黄东楼到陕坝，成立“军令部二厅边务处绥远情报组”，

以“中央各军校毕业生通讯处驻绥通讯组”的名义进行活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改称情报组，代号526，后改为720。下设秘书、译电员、组员16人，交通员、通讯员若干人。所配电台，设台长、报务员。该组与设在北平的国防部第五总台联络。北平解放后，与西安、广州联络。“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后转入地下。

民国34年（1945年），设绥西专员区，专员×××，下设晏江、五原、临河、安北、狼山五个站和一个直属组。各站设站长、司书、站员、组长、通讯员等。

民国35年（1946年），在陕坝建立“国防部二厅驻善丹庙（现乌拉特后旗那仁宝勒格苏木境内）组”，代号538，设有电台，由陕坝益友书店转送情报。民国36年（1947年），组织扩大后迁白彦花（现达茂联合旗白彦花苏木），对外称“绥西边疆新闻通讯社”。在乌镇（现乌拉特中旗德岭山乡境内）设“边闻通讯社”，在同义隆（现乌拉特中旗宏丰乡）和乌不浪口（由五原通往乌拉特中旗的山口）设据点，各县设通讯组。民国38年（1949年）3月撤销。

民国37年（1948年），驻包头的东胜组撤至陕坝，配有电台一部。

(四)、阎锡山的特务组织

民国19年(1930年),阎锡山讨蒋失败后,为了另辟天地,于第二年(1931年),派军官400余人来绥,在包头组成三个队,二队在狼山、三队在五原。

同年在包头成立“绥西督办办事处”,下设“驻五原办事处”。

民国21年(1932年)在祥太魁(今新华镇)成立“绥西垦殖联合办事处”,并改祥太魁为百川堡。

民国22年(1933年),在百川堡成立屯垦队,派警备旅旅长徐子珍任座办。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改由205旅旅长田树梅任座办。

民国37年(1948年),阎以绥远省军务处名义,用飞机送来60多人找田树梅,然后将这些人安排在河套各地,作为下步打算。同时田树梅在五原农林试验场召集屯垦队长开会,成立了“绥区屯垦训练队”,提出准备成立“反共自卫救国军”。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不久,田树梅召集屯垦军官会议,成立了“实验农场”,并部署“我们实在不行可以打游击”。

上述阎锡山在河套部署的这些组织,成为解

放前夕和解放初阎特活动的中心。

二、解放前夕潜伏下来的和解放初期拼凑起来的特务组织及外地潜逃来的特务。

(一)、中统系统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设绥西站,主任史××,秘书魏××。作为下步打算。

同月,张庆恩派第三特派员孙××来河套,组织了“中国反共抗苏调查团”。

同年7月,张庆恩令孙翔臣在包头组成“冀热察绥反共自卫救国军”(又称华北讨共联军),该组织传星五纵队第一总队长牛××等,“九·一九”前夕,一直在陕坝、磴口一带活动。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统治中心南京,继续南下。国民党中央局为了便于指挥,在全国设了五个办事处。华北办事处设在包头,绥远省调查处亦迁包头,与华北办事处合并,对外仍称“绥远调查处”。“九·一九”前夕,办事处主任张庆恩逃往广州,由李鯤生代理主任。“九·一九”绥远省宣布和平起义的当天,李鯤生召集会议,解散了调查处,根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潜伏区斗争工作纲领》,和《大后方政治斗争

工作纲领》，研究部署了潜伏计划和潜伏点。在河套地区的潜伏点有：

魏××（调查处科长）等潜伏 258师（驻中滩——乌拉特前旗前山地区）。

胡××（调查处科长）等潜伏319师（驻狼山）。后改编为111师。

李××（调查处绥南站站长）等，潜伏310师（驻陕坝）。

焦××（中统河北省调统室分区书记）等，潜伏五原。

吴××潜伏安北县。

张××（察哈尔省情报处审讯科长）等，潜伏258团（驻蛮会——今杭锦后旗永胜乡）。

保五团（驻狼山）内也派进了潜伏人员。

代理主任李鯤生带三名心腹在陕坝以行商为名，坐镇指挥。并将绥西定为绥远省的后方工作区，联络点设在陕坝，主任为李××。

1950年2月10日，胡××策动驻狼山起义部队叛变未遂，逃至安北县。3月25日，在大余太建立了据点，并策动杀害了安北县副县长王景荣同志。6月12日胡被捕，据点垮台。

（二）、军统、国防部二厅的特务转入地下，与其它系统的特务相勾结，进行破坏活动。

(三)、阎锡山的特务

1949年9月初，由山西省潜逃到五原的人员组成了“军官队”。在“九·一九”前夕，“军官队”的头目聚集百川堡，组成“反共自卫救国同盟会”。

“九·一九”后，阎锡山通过电台任命田树梅为“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田受命后，将“反共自卫救国同盟会”改组为“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

另外还有由原来已在河套地区的和解放后从山西潜逃来的阎锡山的特务中的年轻成员，拼凑组成了“铁血青年团”，临时领导为朱执如。

同年4月，在111师（原329师）333团与该团参谋盛天达等研究，又改称为“铁血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副主任委员盛××，委员朱执如等五人，内设政工，经济、宣传、组织四个科和一个书记室。下设狼山区团部和第一军。

(四)、由各特务系统成员拼凑起来的特务组织

1、“华北军政委员会”

1949年8月，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来绥远阻止和平起义时，会见了临河县参议长崔春正，要崔“在绥西一带联络地方军打游击”，并任命崔为“华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直接受中央军事

委员会领导，有权指挥当地的和外来的军、中统和军政人员。崔受命后，即组成这一反动组织。内设秘书长、军事组、政治组、党务组、事务组。

2、反共义勇军与反共复国军

1949年8月，徐永昌阻挠绥远和平起义未遂，绥远和平起义在即，崔正春通过军统乌盟组长阎××，两次给阎锡山发电，要求成立“华北反共义勇军”，阎复电：“关于成立反共义勇军，必须把握民众，坚守据点”。此后，崔即派张庆恩的秘书李××、刘万春的秘书张××等人在部分起义部队中活动，密谋开展所谓的“敌后游击”。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不久，崔正春派申××等3人在五原开会，成立了“华北反共义勇军”，当即受到一些恶霸地主和反动军官的支持和响应。

该组织的总司令为崔正春、副总司令田树梅、参谋长申××、秘书沈××、电台台长吴××，副台长阎××、政工处长刘××、运输官皮××，并设有主任医官、财务主任、会计、联络员、通讯员、临河地下县长、直属卫队等。该组织下辖5个支队、8个纵队，军、旅、保安师、游击师、警备司等师、团16个，共计30个番号。并下辖复国军的挺进军、军、师、骑兵团、特务

团、屯垦守备师等12个番号。这些组织，当时均处在地下，等待时机。

3、“华北、西北、东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三北指委会）

李鯤生带心腹潜伏陕坝后，于1949年10月10日在陕坝开会：“部署联络各处之交通据点、潜伏电台、建敌后游击。”派原中统华北办事处会计马××驻包头，建立中心联络站，与驻五原百岁堂药铺的焦××（河北省中统分区书记），安北农场朱××、驻北京之方××、驻天津之李××、驻陕坝之万××，构成一个情报联络网。

10月14日，潜伏在狼山张朴师的胡尚儒等的电台，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来电指示：“速完成潜伏计划，重点控制军队，速报绥西军队情况和共军动向，蒋总统向绥西各军、师、团、旅致慰，做好反攻准备，新战争即开始。”

12月底，张庆恩从台湾来电：“要收罗各地的党、调工作负责人，迅速成立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统一开展活动。”

根据上述电示，于1950年1月19日，由李鯤生主持，崔正春、田树梅、齐××、申××（河北省石门区主任）、单××（河北省调统室科长）、张××、张×、王××（中统绥蒙陕北处

处长)、王富国(甘肃省调查处处长)、朱霁青、胡尚儒等在百川堡开会,成立了“三北指委会”,并电报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来电,正式批准。

该组织的主任张庆恩、书记长兼指导委员李鯤生、副主任崔正春、田树梅,委员:王之铸、张富之、张朴、王元令、刘剑、朱霁青、王富国。内设党务组、政治组、军事组、调查组、联络组、总务组。下设河西(青甘新一带)、大河(陕甘宁一带)、三山(狼山、大青山、乌拉山)、太行(晋察冀一带)、辽河(热辽一带)等五个边区,分别由梁剑、李信通、赵贤杰、郭文淮、李瀚周等分别负责各边区的工作。

(五)、外地逃来河套活动的特务组织和重要成员

“九·一九”绥远省和平起义前后,大量特务分子逃来河套地区,以各种职业作掩护,互相勾结,进行活动。这里只列举其重要成员。(上述各拼凑组织中已经提到的不再重复)。

中统大同据点程得庵等,军统华北区绥远站站长庞中兴,晋察绥区调查处长魏纯美,军统榆林站长马芝祥等(逃来后称“绥西潜伏组”,共26人)。军统陕北站长张富堂等。甘肃省军统室主任甘裕如、侯济川等。保密局晋北站洛克明等。

宁夏调统室主任韩坤山等。军统清河县上尉组长刘毅祥、东胜少校组长龚政、伊盟中校站长高仰山，扎莎克旗中校组长张玉池，鄂托克旗上尉组长蒋吉祥等。察哈尔省游击队司令张厉生。天津公教报国团（忠效报国团）团长刘鸿哲等（潜来后组成了“华北讨共联军”）。察哈尔省反共挺进军司令张天聪。察绥反共救国军司令耿存仁。河北反共救国军司令崔义成、谭国栋。反共人民救国军第一路总指挥白玉珩（白佩珊）。

还有一些人数不多、旗号挺大的特务组织，有的名称是用原来的，有的是新起的。如华北剿总民众服务团、华北反共救国委员会、河北反共游击队、晋陕绥挺进军、新乡军统站等。

三、特务破坏活动

1、解放前，特务们在河套地区不断搜捕共产党员，革命青年，破坏中共在河套的地下组织。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后，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绥远省由调统室主任张庆恩，西北通讯社社长曾厚戴等人组成“肃反领导小组”，派张忠一等人以视察党务为名，加紧侦察活动，并增加了调统人员，拟订了扣捕名单，由长官部稽查处抽调人员，开始了“清除内部”的大搜捕。在陕坝、临河、五原、安北等地逮捕了

王国华、程昆山、王福田、周鸣、贾润芝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当年8月，扣捕了来临河买东西、在伊盟桃力民以小学教员作掩护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赵××。赵叛变后，供出了河套党组织线索。张庆恩派张忠一等四人和侦察队的刘文祥、王玉珍等，扣捕了中共临河县委负责人之一的赵××和部分党员及进步农民。×××叛变后，交出60余名地下党员名单，使党在河套的地下组织——绥西交通站遭到了严重破坏。

当年冬，又在五原扣捕了以桃力民供销社主任作掩护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王×，在特务们的软硬兼施下，王叛变投敌，供出了一批共产党员。

截至1941年4月，特务们即在河套地区扣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200余人。河套特委书记郭北宸同志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而被杀害。党的地下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2、解放后，暗藏的特务散发反动传单，制造政治谣言；策动起义部队叛变；指挥政治土匪，攻击人民政权，扰乱社会治安，组建地下反革命武装，妄图死灰复燃。

(1) 散布谣言，扰乱人心。“反共自卫救国同盟会”，“华北军政委员会”、“华北反共

义勇军”、“华北复国军”等特务组织，通过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革命布告，在人民群众中散布耸人听闻的谣言。胡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占领了朝鲜，日本在东北打得很好。43个国家组织了一千万军队，把苏联包围起来了”。“后山修了一百多个碉堡，现在有5000多人和蒙古打仗，你们准备欢迎国军吧。”“共产党要被赶走，交公粮也是白交”等等，以此扰乱人心。

(2)、策动起义部队叛变，杀害我派入起义部队的干部

1950年，河套地区共发生起义部队叛变事件20起，其中9起是由特务分子直接策动的。并在叛变时杀害了我派进去的政工干部。

(3) 妄图夺取政权，死灰复燃

1950年8月2日，崔正春派靳××、刘××等人到狼山县十八里桥开会研究，决定于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五）夺取陕坝，以实现其“夺取陕坝，占领河套，进一步向华北发展”的计划。

四、肃特斗争

解放前夕，我公安机关即派出人员，对特务组织进行了秘密侦察。“九·一九”后，特务由公开转入隐蔽，潜入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及其它行业。当时的政权结构是：“以傅（傅作义）

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根据和平起义协议，党的政策是：“包下来，团结改造，地方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根据这一情况，在肃特中，当时不能大量逮捕人，因而在行动方针上确定：“先蒋、阎，后地方，先大后小，先搞行动（破坏性）的，后搞做情报工作的”。

1950年2月26日，在包头捕获了中统特务，“三北指委会”委员、联络组长张××等三人。（此人企图逃香港）。

三月二日，逮捕了甘肃省调统室主任甘××。

同月捕军统华北区绥远站陕坝组少校副组长高××等三人。

3月23日，捕军统华北区绥远站站站长王××等二人。

4月24日在磴口捕冀热察绥反共自卫救国军传星五纵队第一总队长牛××等5人。

4月26日，公安处侦察科长郑贵等化装在陕坝特务接头的地方，扣捕了“三北指委会”书记长兼指导委员李鯤生。后又捕获了其心腹万××。

5月中旬，捕调统局绥远办事处第一科科长李××等4人。

5月17日，捕“三北指委会”副主任，“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田树梅。

经过多日监视，于6月2日捕国防部二厅直属526组组长黄东楼等5人。

9月24日，侦察员刘来虎、武振义、李保章、魏宗元等4人，步行200余里，到伊盟杭锦旗麻迷图，在“华北反共义勇军”总部，巧妙捕获“三北指委会”副主任、“华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北反共义勇军”总司令崔正春及其重要助手周××等四人。

10月6日，捕“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参谋处长、“铁血青年团”主任委员马×等3人。

以上只列举了肃特中捕获的重要头目。到1950年10月镇反前，共捕主要特务头目69人，摧毁了全部特务组织。而残余的特务分子，在镇反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应有的打击或处理。

华北反共义勇军的覆灭

李珍整理

1949年9月1日绥远省和平起义，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但是一小撮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反革命分子，却不肯放弃他们失去的天堂，仍在拚命进行垂死挣扎。“华北反共义勇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拼凑起来的一个政治土匪组织。它从1949年10月开张，1950年9月总头目落网，到1951年3月就彻底覆灭。成为一个反动派殉葬的短命儿。在五十年代上映的电影故事片《虎穴追踪》，就是根据当年我盟公安人员巧施妙计，不畏艰险，打入敌巢，一举擒获其总司令等四人的具体事实，经过艺术加工、描写刻划而成的。

巴彦淖尔盟在历史上是一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偏远、荒漠的地方。这里既有高山、大漠，便于藏身，又有得天独厚的

米粮川、大牧场，便于谋生。且在宁夏、绥远交界处的一些地方，是鞭长莫及的三不管区。因而，历史上是亡命之徒逃亡隐蔽之地。

抗日战争时期，陕坝是绥远省政府所在地，也是绥远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活动的中心。美蒋联合举办的“中美训练班”在此培训了大批特务。阎锡山在河套创立的“屯垦队”，又将山西省“同志会”的势力发展进来。鉴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河套便成了反革命分子理想的落脚点和活动地区。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部解放。同年12月20日张家口解放，这些地方大批特务和战败的军、政官员，则似丧家之犬逃窜于此。

1949年1至8月，平津、太原、大同、兰州等几座孤立的都市相继解放，在北方地区只留下绥远省仍由国民党占领，于是各地的反革命分子便纷纷涌来绥远，多数落脚于套内。据1950年初统计，全国有19个省、市，230多个县的人员，以各种身份来到河套落脚，仅陕坝一地即猛增了一万余人。在整个河套，国民党师以上的人员即达130余人。如阎锡山手下的少将专员齐××、河北省石门区调统主任申××、中统华北办事处主任李鯤生、宁夏调统室主任朝××、宁夏建设厅长李景贤、128军军法处长肖荣、22军参谋

长苗玉田、31师师长曹子谦、归绥警备司令李志平等，即是外地潜来河套的军政要员。

就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绥远上下正在酝酿起义，而各种反革命势力麇集河套的时候，一个在临河县任参议长的老牌政客即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积极组织反革命力量，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这个老牌政客就是本文所述的“华北反共义勇军”的首脑人物崔正春。

崔正春，又名锡慧，是山西河津县人。1905年他毕业于太原高等林业学堂。1909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任清军排长、连长。辛亥革命后，任都督府中校团副。

1914年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山西军事教育团教练、保定军官学校教官、冯玉祥部上校参谋、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1931年任绥远省政府军事处长、后历任五原、临河县长。

1935年后，历任绥远省保安处参谋长、北京红万字会会监、会长、第八战区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等职。

1940年卸职，在临河县永胜乡（现曙光乡）出租土地。

1948年任临河县参议长。

由于崔正春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教时，傅作义

是其学生，因而在傅、董（傅作义、董其武）人员中有一定威望。又因崔在临河近郊经营着大量土地，1948年就有一批外地逃来的反动分子如河北省石门区调统室主任申××，望都县还乡队长刘××等人。即投靠在他的门下，并力促他出面阻止绥远解放。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后，这些人更加紧了活动。但这个老奸巨滑的反动老手，却静观其变，等待时机。

是年4月21日，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崔如坐针毡，感到不能再等。而从外地大量涌来的反动人物也加紧了对他的纵容和催促，于是崔于5月间给阎锡山发电，保荐屯垦办事处座办、曾在阎锡山的晋军中任过排、连、团、旅、副师长、副军长和晋东南保安司令等职的田树梅在绥西组织军队。阎复电：“已转送国防部核办。”

8月，崔正春等不及阎锡山的通知，便率国民党清苑县党部秘书刘××及申××、刘××、保定还乡队官员刘××等，到包头、固阳等地活动。此时正值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奉蒋介石之命，来包头阻止绥远和平起义。徐被董其武拒绝后，正准备返回广州，崔与徐见了面，报告了他们的意图。徐听后正中下怀，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任崔为“华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直接由

军事委员会领导，有权指挥外地逃到绥远地区的军、中统特务及当地军、政、特人员。并授意要“阻止绥远部队起义，收容和安置好逃来人员，将各方面的人包括土匪、官僚、地主等组成武装力量，刺探解放军情报，暗杀共产党干部，在绥西一带打游击，以绥远地区为根据地，向整个华北地区发展”。

徐永昌走后，崔又通过乌盟军统组长阎××（驻柳树泉子，现属乌拉特中旗乌加河乡）等，两次给阎锡山发电，报告徐永昌布置的打游击情况，并请求成立“华北反共义勇军”。阎复电指示：“成立反共义勇军，必须把握民众，坚守据点。”并任崔为“华北反共义勇军”总司令。

在此前后，崔派中统华北办事处主任张庆恩的秘书李××、原刘万春的秘书张××及刘××等，到保五团、258师、319师、骑13旅、骑5旅、328团及陕坝机场的驻军、后山茂明安旗游击队等部队中活动。崔本人在包头联络了万字会的白××。

经过这一段紧锣密鼓的活动，在“九·一九”起义后不久，崔派申××、刘××、李××等，在五原开会，正式成立“华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崔正春、副主任兼秘书长申××，军

事负责李××，政治负责刘××，党务负责张××，事务负责刘××、单××。同时建立了“华北反共义勇军（与华北军政委员会实为一体），崔任总司令，田树梅任副总司令，申××任参谋长。

接着派张××与后山土匪张××、张崩颅、李×、李××、张××等联络，委张××为复国军第26军军长兼47师师长。继与狼山县大地主周××联络，周拿出私藏枪100余支。又与达拉特旗大地主张××联络，任命张为第5路军总指挥，张献出藏枪30余支。

1950年1月，联络巴营长和临河惯匪那大臣，任巴为“华北反共义勇军”骑兵第一师司令，那为副司令。任命河北省王风岗部逃来的干事姚××为“华北反共义勇军”专员，临河县科长李××为地下副县长兼督委主任，安插在崔的出租土地上。并在临河的大板仁圪旦、刘兰圪旦、刘三地、陕坝南门外设了情报站。

此时崔潜伏在陕坝万字会，在大转盘、城西建立了据点。

1950年春，我公安机关以“先切头”的办法，陆续扣捕了一批特务重要头目，崔正春感到在河套不易存身和活动，于3月间经与临河二十五里桥地主周××联络，转移到伊盟杭锦旗的麻迷

图（现属巴拉亥苏木）潜伏指挥。并与该地郝二维圪旦甲长魏××、呼和木头地主庄××联络，组成直属卫队，庄任队长。

崔在此立脚后，充实了指挥机构，如附表：

指挥机构充实后，即派出参谋刘××、吴××、靳××、刘××、张××、阎××等人进一步策动起义部队叛变，并联络原有的散匪。崔本人也偕同庄润保（化名王玉），伪装卖毛驴，去乌审旗、郡王旗、东胜、桃力民等地，在王公和地方团队中活动。将叛变的起义部队、地方团队、散匪，编入“华北反共义勇军”，或“华北复国军”（亦为一体），崔以“华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发给委任状。并在黄河两岸和临河、狼山、米仓、陕坝等地建了一批交通联络点。另外，还派冯××、阎××等去河北、察哈尔两省活动，以统一全华北的行动。附组织系统表：

6月25日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于是大肆进行造谣破坏。并以“华北军政委员会”、“华北反共义勇军”、“华北复国军”的名义，联合散发布告，胡说什么：“同盟50余国讨赤，欧亚围攻飞机炸巡。国军沿海登陆多处。美日进入东省吉林。各省起义蜂起灭共，唯我西北观望困循。告尔军民放胆起义，重阳匪败原子降临。”以此来煽动骚

乱。

到了八月初，崔觉得“占河套，进而向整个华北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派靳××、刘××等人，在十八里桥交通联络据点开会，研究夺取河套计划。会上决定于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五），以沿狼山叛变部队为主，由山西省窜来的“反共救国军”旅长齐××率领进占陕坝，出临河328团、狼山329师断后，然后占领整个河套，作为根据地。

此时，我公安机关经过艰苦的侦察，已掌握了其组织状况和反革命阴谋。为了防止其大规模的暴乱，决定加快侦察工作，在其9月26日行动前，捕其总司令崔正春，使其群贼无首。于是，加紧了对其内部的分化瓦解和对崔的行动的掌握。并积极做好抓捕的准备。经过对崔的贴身心腹某某反复工作，对其讲明形势，晓以利害，某某表示愿意为我出力立功，并以全家担保，协助人民政府抓获崔犯。

9月上旬，某某向我汇报，说崔正春与周××于8月24日外出活动，30日返回麻迷图，近期无外出准备，命他来河套筹款。得此消息后，河套行政区公安处立即抓紧研究，制订了抓捕方案。在报请公安厅、河套地委批准后，处长李贵、侦察科长郑贵与侦察员刘来虎、吴振义、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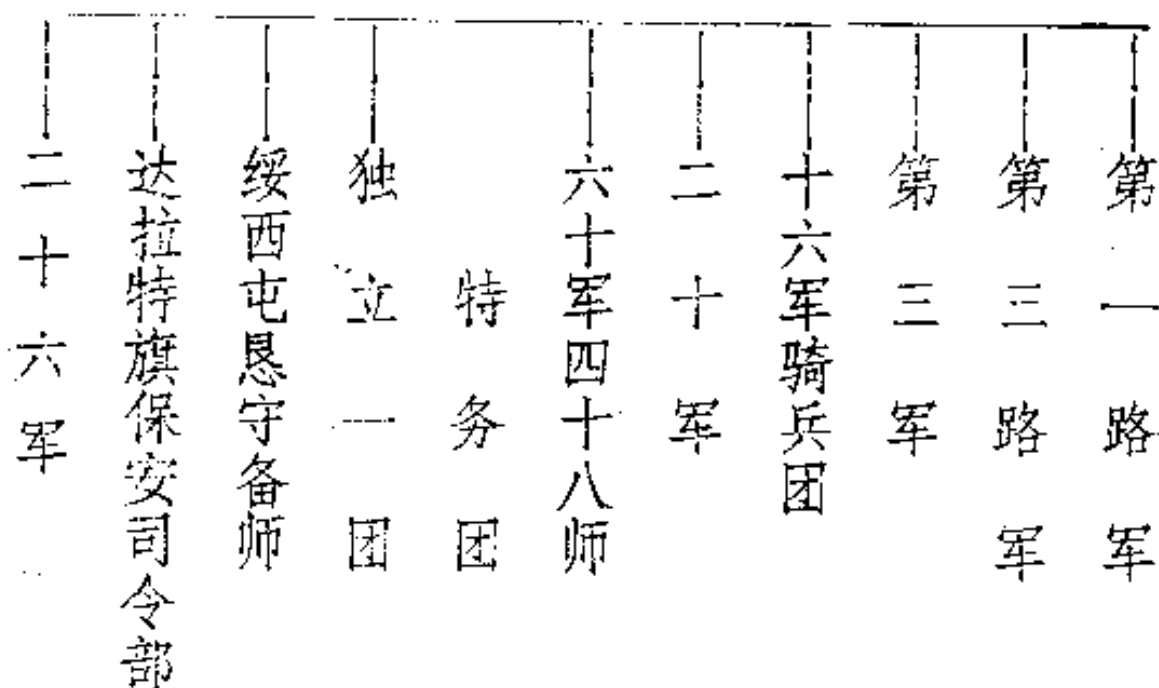
保章、魏宗元又认真研究了每个细节。

9月17日，我四名侦察员有的化装成地主的儿子，有的化装成资本家的子弟，某某带了15元白洋，由陕坝步行出发，不怕饥饿、劳累和寒冷，绕过土匪巢穴，日夜兼程，于19日夜到达目的地。某某向崔献上15元现大洋说：“这是已经筹到的款子，过些天还能筹来一些。”并向×介绍四名侦察员说：“这四位是新入伙的兄弟，他们受不了共产党的压迫，情愿为总司令效劳。”崔听了非常高兴。我两名侦察员趁机以给总司令掏烟为名，掏出手枪，对准在场的四名匪首，令其举手投降，并高喊：“一连、二连各就各位。”一名迅速到门外警戒，一名对四犯进行搜身。等崔反映过来，崔和其同伙靳××、周××、王××，已成笼中鸟、网中鱼。我侦察员立即带其转移。时隔不久，匪伙即派人追。这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后半夜没有月亮，大地一片漆黑，看不见我侦察人员去向，总以为走了小路，于是便抄小路跑步追赶。想不到我机智的侦察人员走了大路，匪伙也怕我人多吃亏、追了一段，则灰溜溜地返回。我侦察员带上崔正春等四名要犯，过了黄河由公安队接应上了汽车。9月21日回到陕坝。

崔正春被捕后，群匪无首，其暴乱计划流

产。此后经过剿匪和镇反，其匪众陆续被歼和逮捕归案。崔正春和另一名匪首田树梅也在北京处决。到1951年3月，整个“华北反共义勇军”彻底覆灭。

复国军系统



智擒特务头子李鯤生

李珍 整理

解放初期，河套地区公安机关认真贯彻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们以坚强的党性和大智大勇，把解放前原有的和解放后拚凑起来的大小特务组织一个一个摧毁。把当地原有的和解放前后逃来的特务分子一一抓获。现将抓获特务头子李鯤生的详细过程记述于后：

李鯤生、又名李金升、号达明、化名陈效平，1904年生于河北省魏县，1926年加入国民党并进入政界。由于效忠国民党，在1945年就爬上了河北省调统室主任的宝座。1946年得到中统华北办事处处长郭××的赏识，被提升为中统沈阳区区长。同年11月，又调北平区任副区长。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李鯤生逃到上海，不久又从上海来河套安北县，投奔安北农场场长朱××庇护，朱任其为该场秘书长。当时的中统华北办事处主任，李鯤生的反共同行张庆恩，发现李在安北农场，就将他叫到归绥（今呼和浩特），让其担任该办事处副主任。“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前夕，张庆恩逃往广州，李代该办事处主

任。

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各族人民敲锣打鼓，共庆解放。但李鯤生却在包头的—个阴暗密室里，召集张××（张庆恩之弟，中统华北办事处督导员）、王××（中统华北办事处秘书）、祁××（中统绥远调查处处长）、魏××（中统华北办事处—科科长）、史××、胡××（中统华北办事处二科科长）等人开会，研究决定解散了中统华北办事处，安排部署了在258师、319师、310师、258团、保五团等起义部队和归绥、包头、五原、陕坝等地进行潜伏的特务人员，研究制订了9至12月的活动计划。

部署后，李鯤生于9月22日潜至五原，开会研究了“加强敌后工作”等事项，而后带魏××、万××（李的交通）潜入陕坝，以行商为名，进行活动。10月10日，又在陕坝秘密开会，进一步研究了交通据点的联络，布置了五部电台，决定“建立敌后游击”。14日，潜伏在319师的胡××第一指挥站的电台与国民党中央叫通，来电指示：“速完成潜伏计划，重点控制军队，速报绥西军队情况和共军动向，蒋总统向绥西各军、师、团、旅长致慰，做好反攻准备，新战争即开始。”11月1日，李鯤生派仲×（中

统绥西分团五原站负责人)，冀××等人赴香港联络。12月底，张庆恩从台湾来电，指示“迅速成立党政军联合工作委员会，统一开展活动。”1950年1月19日，李鯤生由陕坝到狼山，主持召开秘密会议，会上组成了“华北、西北、东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三北指委会）。张庆恩挂名主任，李鯤生任书记兼指导委员、崔正春、田树梅任副主任。“三北指委会”成立后，李鯤生、胡××由狼山到百川堡（现新华镇）与319师副师长庞××等秘密策划了该师的叛变。庞率部走到同义隆附近，被我派进去的通讯员打死，叛变基本流产，只有营长董××等一个连，不足百人，乘乱逃走。

李鯤生的行踪，早在我公安机关的视线之内，单等条件成熟后拘捕。但自从2月28日在包头抓获了由陕坝潜往包头，准备逃往香港的张茂堂等三人，并缴获了给蒋介石的电报三份、文件一份、手枪一支后，李则惶恐不安，行动诡密，每次潜回陕坝部署工作后，迅速离开，并透露要去兰州一带隐藏。

李鯤生指挥的破坏活动，直接影响着华北、西北、东北部分地区的安定，特别是影响着绥远省的政权建立和生产、生活。因此，上级决定“擒贼先擒王”，必须抓紧捕获此犯。河套公

安处慎重地分析研究了该匪及其核心人物、心腹干将的活动规律、特点，全面细致地制订了抓捕方案，决定加强侦察，控制力量，严密监视，掌握其活动，予以秘密逮捕，以防打草惊蛇。绥远省公安厅、河套地委批准了这一抓捕方案，公安处作了严密布置。

当时，陕坝正在开展扫盲，街道早已议定在李鯤生住的院内设了一个识字班。借此机会，公安处派一位女同志和河北省来的两位姑娘，以妇联名义在李院内办起了识字班，并拉李的姑娘学习。晚上学文化，白天两位姑娘拉着弟妹在其院门口做针线活，进行监视。同时由外地集中到陕坝五名内线人员，加强了侦察力量。也加强了对其心腹人员行动的掌握，以便于李鯤生回陕坝与他们接头时采取措施。并对其心腹人员的思想活动逐个进行分析。经过调查分析，发现这些人中，有的看到我工作团逐步深入，惊慌害怕，产生了动摇。加之李鯤生在经费问题上一再欺骗，手头拮据，感到前途渺茫。于是我公安人员对×××进行了政策攻心，晓以利害。此人表示愿为我工作，并主动提出在抓捕李鯤生中立功。

工作进行一段后，了解到李鯤生于4月25日回到陕坝，住在其交通联络员万家珍家中，26日要与某核心人物接头，布置任务后就要离开陕

坝。接头地点在陕坝北部。

为了做到捕获李鯤生后，不使其他特务成员发觉，以免大批潜逃，给下步工作造成困难，决定在其会面之前或之后，将李、万二人一齐秘捕。前一天即派侦察科长郑贵、侦察员张学勤等，秘密查看了接头路线，万家珍住址的地形和周围情况。26日凌晨，我侦察人员即身着解放军服装隐蔽等待。天亮后，李鯤生与其心腹接了头就向北走去，我隐蔽在北边的侦察员站了起来，李匪盯见北边有人，迅速返回向南走，我隐蔽在南边的侦察员站起来问：“你是干什么的？”李答：“做买卖的。”侦察员说：“我们是开小差跑出来的，借给我们些钱。”李说：“我没带钱，家住北城里，回去给你们拿。”侦察员说：

“白天我们不敢回去，你坐下，等晚上去拿。”这时侦察员把他拉到凹处，给其换上已经准备好的解放军服装，带上墨镜，口罩，带回陕坝。这里要说说为什么我们穿的、给他换的都是解放军服装呢？因为当时陕坝周围很乱，起义部队不稳定，不穿解放军服装就容易暴露，办不成事。

原来估计，接头时万家珍必然和李一起来，但出乎预料，万没有到。不捕万，必然要走漏捕李的消息，于是决定立即捕万。万住大顺城附近，但确实地址不详，我们派人去找，找了两个

村子方才找到。当时万正给其家属拴晾衣服的绳子。我们进去后，狗子咬，我拿出手枪说：“再咬打死你。”目的是警告万家珍。万看见不对就往西走，我们也跟上，他又返回来，张开双臂，以让家为名，企图抱住我。这时我用枪逼住他说：“不准喊！不准动！”把他逼进家里，将其逮捕，并在炕席底下搜出了其送往各地的信。然后给他穿上解放军衣服，戴上口罩、墨镜，带回陕坝。

捕万后，怕其他特务来万家找李、万，泄露了已将其逮捕的消息，于是将万的家搬到其它地方。因而半年以后，其他特务也不知道李、万被捕。

李、万被送到公安厅后，供出在万家存有文件、笔记本、联络图、电报稿。我们又到万家原来住处，以查大烟为名，进行搜查，在屋里、屋外、房顶、地下到处寻找，也没找到，最后在凉房墙上用土坯堵的一个洞内搜了出来，为一网打尽其余特务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此后陆续扣捕了该组织的大小头目，将敌人苦心经营的“华北、西北、东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及其部署的潜伏组、交通联络站彻底摧垮。

注：此材料系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忆述、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河套地区剿匪纪实

霍建

在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绥远方式”感召下，1949年9月19日，原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先生率领绥远军政人员光荣起义。

绥远起义后，周总理对绥远作出了“地区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的指示。

1950年初，从包头到河套地区，驻扎着未经改造的数万国民党起义部队，等待我党对其整编。党的政工干部进入后，在军、师、旅、团都建立了政治机关，所有连队都派进一名政治指导员。这期间绝大多数起义干部，包括中上层干部，都衷心接受思想改造，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政工干部团结相处，感情融洽。至于士兵，更是盼望早日解放化，为人民立功。

2月21日，由绥远省委、省军政委员会、省政府派出以沈新发同志为团长、邢情魁、黄波为副团长的绥西生产建政工作团，进入河套陕坝市及各县。三月末，陕坝军分区干部、战士进驻陕坝。此时暗藏在河套城乡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便大肆活动起来。他们到处散布谣言，恐吓群众，扰

乱人心，破坏我生产建政工作，离间河套人民和我党干部的合作，策动起义部队整连整团叛变。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特务分子与流散在地方上的反动军官、旧职人员、叛变部队、地痞无赖和原有的惯匪，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结成多伙股匪，抢劫群众财物，杀害无辜百姓，破坏社会治安。一些较大的股匪，在特务的操纵下，竟公开打出国民党的旗号，攻打我区所在地，杀害我县区干部，成为政治土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河套地区的匪特活动更加猖獗，为害也愈来愈烈，加之驻扎在狼山县和陕坝附近的起义部队内部很不稳定，一些反动分子蠢蠢欲动，图谋叛变，以致搞得一些县镇人心惶惶，日夜防备。

根据这一情况，政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由绥远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和省军区派出人民解放军步兵、骑兵部队，进套执行剿匪任务。经过近两个月的进剿，将河套地区的股匪基本消灭。

现将河套剿匪前和剿匪中的一些情况忆述如下：

河套地区大批匪特之形成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解放前的河套，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傅作义率部进驻河套后，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就给第八战区的绥

远地区（当时傅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副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设在陕坝）派来大批中统、军统特务，在党政机关和军警部门担任要职，秘密进行特务活动。接着美蒋在陕坝附近合伙开办的“中美合作技术训练所”，又训练出一批职业特务，派入当地驻军部队、地方机关、团体学校和临近解放区做特务工作。当时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特务头子张庆恩等，为了从事反共活动，在省县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积极发展网罗特务，秘密监视和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抗战胜利后，上述这些特务有的随机关东迁，有的随部队东进，有的则留在当地活动。

“九·一九”起义前夕，蒋介石派国防部长徐永昌等从广州乘飞机来到包头，妄图阻止绥远党政军官员和数万部队在董其武领导下即将举行的和平起义。徐在劝阻失败后，即同绥远当地和各省逃来绥远的特务头子秘密策划，重新调整了特务人员，严密整顿了特务组织，详细规划了未来形势下的特务活动。尤其对作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反共根据地的河套地区如何开展反共活动，更是作了精心安排。为了适应共产党进入后的环境，徐将面目早已暴露、不利于留下活动的特务头子张庆恩（中统华北办事处主任）、祁觉民（绥远调统室主任）等带走，而将

李鯤生（中统华北办事处副主任）等留下，以指挥绥远地区的特务活动。徐还利用与崔正春（保定军校一期学生，曾在绥远等军政各界担任过各种要职，时为临河县参议长）的旧关系，把崔叫到包头，委崔为“华北军政委员会”主任。时过不久，崔主持成立了“华北反共义勇军”，并以“总司令”的名义在绥远起义部队里为其委任了一些“军长”、“师长”，积极网罗反革命力量。

1948年，各省解放后，一大批特务逃来归绥、包头及河套一带；天津、北平、张家口解放后，那里的大批特务和原从绥远随国民党军队出去的特务，又混在愿回绥远安家的国民党官兵中间，一起来到绥包。

太原、西安、银川、榆林、兰州解放后，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特务也纷纷潜来河套。如山西阎锡山的专员齐敬德一伙，甘肃有名的特务头子王富国，榆林有名的“调统”特务头子王之修，都带了一群特务来到河套。

“九·一九”后，绥包二市的特务绝大多数都转移到河套。以上这些家伙都深知河套地域辽阔，社会情况复杂，国民党统治多年，宗教势力雄厚，城乡早有长期潜伏的根深蒂固的美蒋阎特务的立脚点，特别是数万起义的部队中有不少人和

他们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陕坝一地，原只有三万多人口，一下猛增至六万多人，街市上各行各业中，有许多人是有政治色彩的。于是他们便通过各种关系，在河套城乡和起义部队中潜伏下来，乘“九·一九”后到一九五〇年二月下旬之前近六个月的时间，在河套地区作了许许多多对抗我党的准备。光电台就汇集了十三部之多。他们利用密码电台经常与台湾、香港联络，接受那里的指示。这是河套地区匪特形成之一。

在“七·七”事变前，原绥远省归阎锡山统辖，因而有“绥远是山西的殖民地”之说。傅作义、董其武都是阎锡山手下的军官。“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已暗地里把傅作义拉在手中。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又把绥远省划在第八战区，后又划为十二战区（山西为二战区），委傅为十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但傅与阎总有那么点微妙关系。天津、北京、张家口、大同解放后，阎锡山在这些地方的特务，便跑来绥远；六原解放后，除被我们抓获的特务外，有一些特务也千方百计地转来河套，理直气壮地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在河套秘密组织“华北反共自卫救国军”，发展“铁血青年团”等特务组织。张选、马壮（原阎锡山手下的两个副师长）还公开成立“军官纵队”以及“山西干部收容所”，前后集中了

四个中队，共三百多人，进行特务训练，妄图将他们安排在绥远各部队内，渐渐掌管权力，反共到底。“九·一九”后，他们估计到绥包二城和绥西一隅，很快就有共产党的军政人员进入，于是张选、马壮便带上这四个中队，欲经河套过宁夏，转赴广州。此时，西安、兰州、宁夏先后解放，这些人遂滞留河套，一部分潜藏城乡各地，一部分进入阎锡山在百川堡（百川为阎的号）的屯垦队，隐藏下来。另外，曾在山西榆次、徐沟等地执行阎锡山“自白转生”（坦白自己过去的言行后，誓死拥阎反共。如认为坦白不彻底，就乱棍打死，山西人死于阎这一暴政者众多）暴政的特务专员齐敬德，在太原解放后，偷偷转至西安、兰州，组织起一伙“特工队”。这两地先后解放，他又带着这伙“特工队”转来河套，与马壮等特务联系上，一同投靠了潜伏于河套多年的特务崔正春。齐敬德手下的特务，装扮成各行各业者，活动于绥远党、政、军、警、团和绥西各地。密设电台与香港、台湾阎锡山、蒋介石的情报机关联系。这是河套地区匪特形成之二。

“九·一九”起义后，绥西数万起义部队中的广大指战员，准备欢迎我党派去的政工干部，接受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但是极少数顽固分子和美蒋阎特务相勾结，处处与政工干部

对抗，反对改造，并暗中发展其实力。他们虽然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戴着五星军帽，却采用“借水养鱼”的策略积蓄力量，或使用“水萝卜”伎俩欺骗同人。他们时时寄希望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反攻复国，因而时时准备将部队拉上山去和共产党打游击。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便迫不及待地率部叛变。如起义部队编为37军111师的副师长庞茂青率321团营长董钊50余人叛变；110师329团一连连长张泰魁、三连连长张德彦，将我党派入这两个连的政治指导员、通讯员杀害，率60多名士兵叛变；110师直属警卫连的两个排长杨天升、胡生明率30多名士兵叛变；329团副团长梁钊带24名士兵叛变；37军安恩达骑兵旅一团三连排长鲍喜才，带20多名士兵叛变；该旅二团康英带12名士兵叛变；该旅三团二连高水庆等14人叛变；该旅三团四连连长刘喜才带领一个整排、27名士兵叛变。住后山份子地的鄂友三骑兵师一连长带领全连叛变，打死该连政治指导员、通讯员，又到团部杀害了团政治委员彭志超同志；安北县保警队杨世雄带领18名队员，杀害了该县副县长、秘书等叛变；西公旗卢万惠部的杨林等23人叛变；后王如意、郝鸿荣带出西公旗旗队20多名队员叛变；达拉旗的旗队长加木苏带随员叛变……他们

的口号是：“背起枪，杀政工，上山投国军。”

“九·一九”后，我党为了安置改造流落在社会上而无正式职业的旧军官、旧职员，在五原县、陕坝成立了“无职干部招待所”，这个所也混进了特务，6月25日后，也拉走一部分人叛变上山。

以上多起叛变的武装人员，成了匪特的主力。这是河套地区匪特形成之三。

河套地区的匪特，尽管是一些乌七八糟的狐群狗党，然而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却是共同的。1950年2月，当我党人员进入河套，要和河套人民一起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建设社会主义新河套的时候，他们组织特务团伙，拉起股匪，持枪行凶，瓦解起义部队，破坏我生产建政工作。6月25日以后，他们得到蒋介石集团的指令，认为美军很快就要打过鸭绿江，占东北，进华北，国军在美国协助下要反攻大陆。于是乌七八糟、股头庞杂、番号林立、三五人为一连、二三十人为一团、五六十人为一师的股匪，便公开打起了“华北反共义勇军”、“国民党游击队”、“反共自卫救国军”、“敌后游击第五纵队”等旗号，并在他们活动的地区，委派了他们的“县长”，“乡长”，向人民强要大烟，搜刮钱财和衣服鞋袜，甚至还摊派电

池、手表。如在魏柜、赵三圪旦，每甲要手表三块、手电两个。在六八七圪旦，仅有十来家老乡，就给派下十二块手表，限半个月交齐。有的县有几股匪伙，都委任了自己的“县长”，如米仓县的各股匪特，就委任了三四个“县长”，

暗藏在河套的美蒋阎特务，基于各股匪伙虽然反共目的一致，但是各自为政，不便同共产党斗争，于是便把这些各自独立的股匪纠合起来统一在“中国国民党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的番号下，把多数股匪分子分别编为军、师、旅、团、营、连。在崔正春的领导下，由田树梅任总司令，马壮任参谋长，齐敬德任政治代表，李映南任参谋长。任张疤子为师长，董钊、梁钊为副师长，下辖三个旅，十二个团。三个旅长是张德彦、刘喜才、加木苏，并各兼一个团长；其余团长有：鲍喜才、王如意、郝鸿荣、陈进才、王耀武、魏殿文……另有一个李再团。匪司令部各处都有人选，各带几个随员，司令部直属一个宣慰团，团长王建和，一个动工团，团长张相辅。这些匪特总共不到一千人，多数骑马，装备都是轻武器，但有一些美造卡宾枪，多是起义部队叛变时带出来的。这些匪特盘踞于狼山西部西补隆、炭窑口、太阳庙一带，诡称万人，简称“国民党救国军”。他们每日拿着国民党的旗子，升旗训

谕，高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大总统万岁”等口号！

匪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以崔正春为首的这帮政治土匪，内部成员相当复杂，有中统、军统特务，有“铁血分子”，有“绥干团成员”，有起义部队叛变为匪的分子，还有各种反动会道门头子。在这些成员中，多数是些亡命之徒和大烟鬼。当匪首的只要手里有大烟，只要任下属胡作非为，就可以拢络住大伙。因此尽管他们口头上自称“救国救民”，而实际上却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在米仓、狼山、晏江、五原、安北等县的乌加河两岸和沿山地区，在东、中、西公旗的前山后山地区，直到伊盟境内的达、杭二旗和宁夏的阿拉善旗，匪特所到之处，见牛羊猪鸡就杀，见金银财物就抢，见妇女就强行无理，致使好些地方生灵涂炭，十室九空。在米仓县的白柜，匪徒们抢走白忠家4匹马、150只羊。为了要大烟，把老汉捆打了一夜。在太阳庙附近，一伙匪徒抢走了宁夏商人满载东西的19峰骆驼；在米仓一区平城乡三保五甲袁在家抢走17头牲口；在狼山县三区孟四村孟满发家抢走衣服、布料、毛毯几大包；在上蛮会，把一个老太太捆吊起来，要她把嫁闺女收的财礼和干板子

(大烟)拿出来，老人没有，匪徒们就用烧红的火钎在老人脸上乳房上烫；在平城一保一甲，把一个姓张的家抢了个一干二净，还将张氏打死，害得留下三个小孩无人养活。

匪特的烧杀抢掠，使蒙人同汉人一样都深受其害。在中公旗一佐附近，匪徒们抢走218匹马、24头牛、46峰骆驼、80个鞍子、17副妇女头戴、48个银碗、47个鼻烟壶。至于抢走的栽绒毯子、绸缎布匹、皮袄皮袍，其数目都在几十匹、几百件以上。匪徒们在什尼乌素一带，把蒙民们的牛羊杀光，骡马赶走，妇女奸污，并把他们最珍爱的头带首饰抢走，锅碗砸碎，炒米木箱踏扁，糟害得家破人散。在乌拉哈拉沙图西，刘喜才匪伙一去，就杀了蒙古族老阿妈十来只羊。老阿妈在夜里把其它羊藏了起来，第二天刘匪把老阿妈藏匿的七十多只羊搜寻回来，全部杀光。临走还把老阿妈家的三顶蒙古包全部烧毁，害得老阿妈一家老小无处栖身。在本巴图附近，有七户牧民的东西，几乎被匪特刁抢殆尽。在太阳庙一带，有140多家蒙民，都遭到匪徒的洗劫。匪特们到处抢掠，连喇嘛庙也不放过。如本巴图庙、哈尔叶格庙、太阳庙、乌兰奢力盖庙、阿贵庙、善丹庙等，都遭到匪特的洗劫。他们将这些召庙的神佛搬倒，把银铸的小佛抢走，把殿里的大铜壶、

大蜡台砸扁，把旗幟帷幔扯碎，把庙里存放的奶皮、黄油、红枣、核桃、红白糖吃光，牲畜杀掉，把喇嘛个人的衣服和马匹通通抢走。在匪特们抢劫过的召庙，到处是人屎马粪，臭气熏天！

奸淫妇女是剥削阶级反动军队的一惯恶行，匪特在这方面更加残无人性。在崔柜圪旦一伙匪特一次就强奸了十一个妇女，其中有户人家两个儿媳和一个闺女都被强奸。在匪特们骚扰的地方，如果发现容貌俊秀的姑娘，往往是一二十个人一起扑去轮奸。在魏柜圪旦，刘喜才带的一伙匪特强行轮奸了一个十九岁的女人。在李五合村，有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被匪特追得流产在野地。匪特到了杨柜，把村子包围起来，然后强迫妇女出来“应酬支差”。有两个女娃娃没跑脱，非得去“应酬”不行。其父母给匪特跪下央求说：“孩子年小，积积德吧！”匪特把枪对准其父母脑袋，硬是把哭成泪人的女娃娃拉走。她父母哭着喊道：“她才十四岁呀！”匪特狞笑着说：“没有十四岁的女子，过不了老子们的瘾！”一家小姑娘才十二岁，同样被匪特像老鹰抓小鸡子似的抓走，她妈“哇！”地一声哭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匪特们为了尽快扩大实力，对付我军剿捕，向部下提出：谁扩充的人员多，谁的官就升得

大。一个当团长的，如能将手下的二三十人扩充到五六十人，就可以委任为师长。于是一些股匪头头，不论走到哪里，在抢劫财物的同时，都要挨门逐户搜抓青年，抓到多少就带走多少。有的股匪走在路上，碰见放羊的青年也要抓走。在米仓县西六八圪旦，一次就抓走刘得玉、徐三小等四个青年。一天夜里，匪特们住进义泰魁村，当夜就抓去赵小二、赵余儿、官财、郭三纳、辛旦志等八个青年……

匪特们还向群众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蒋总统反攻复国指日可待”、“共产党是先甜后辣”，以此来吓唬群众。如果谁不信他们的谎言，不跟他们逃走，便被扣上“通共分子”的帽子，进行烤打枪杀。仅在米仓一区匪特就杀害无辜十三人之多。因而很多群众被匪徒裹胁，被迫离开妻儿老小，上山为匪。

我剿匪部队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由于河套地区匪特活动猖獗，危害日甚，我绥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根据政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带该师十团以及中公旗游击队，命令起义部队改编的人民解放军步兵37军109师唐副师长带该师327团，命令陕坝军分区张福来

司令员带军分区红马、白马两个骑兵连和步兵营，在河套及后山地区共同执行剿匪任务。同时组成前方剿匪指挥部，由毕、唐、张三位同志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军分区参谋长刘生凯担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剿匪的部队既有蒙族，也有汉族，既有步兵，也有骑兵，既有老的解放军，也有新改编的起义部队。由于各部队首长十分重视部队间的亲密团结和互相协作，在部队出发前，都向所属全体官兵强调了搞好与友军的团结和互相支援的重要性；同时学习了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要求部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戳穿过去国民党对我们的诽谤和匪特的欺骗宣传，为孤立和剿除匪特创造有利条件。

九月初，我各路剿匪部队在狼山县北刘富春的公中会师后，随即进入匪特自称“中国国民党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盘踞的西补隆、炭窑口一带进行围剿。但是狡猾的匪特却多次突围，四处奔逃。有些则逃到后山的沙漠草原深处。

当剿匪部队分头进到匪特盘踞过的西补隆、新城、太阳庙、铁匠圪旦附近时，老乡们远远瞭见大马队来了，便慌张外逃。到六缸房子时，全村跑得只剩下两个老头和一个老婆儿。战士们非常和气地对他们说：“我们是人民解放

军。”可他们心里却疑惑地想：“土匪也穿着这号衣裳呀！”同志们说：“我们是来打土匪的。”他们也不相信。因此战士们对他们说上好半天话，他们只是点点头，“嗯嗯”几声。但事实却是最有说服力的。当老乡们看到解放军一个个精神焕发，威武雄壮，站有站法，坐有坐相；没有分好住房前，都整齐地坐在村边等着，或唱歌，或学习……在分好房子后，指战员们扫院的扫院，担水的担水，做饭的做饭，秩序井然，说话和气，尊称老乡声不绝于耳时，便对解放军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使那些污蔑解放军的谎言，不攻自破。有些地方在匪特逃离时曾经恐吓老乡说：“共产党来了敢回村的我们绝不留情。”所以开始时，老乡们迟迟不敢回村。可是老乡们看到来的解放军不仅人数多，没一个抽大烟的，甚至连抽旱烟的也很少，而且武器精良，子弹充足，有炮、有机枪，有步兵、有骑兵，兵强马壮，土匪是打不过的。再加上河

套各县市党政军团的男女干部随解放军向群众做工作，使老乡们知道这些解放军就是当年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于是，先是岁数大的男人回村了，继而年岁大的女人和男青年也回村了，最后姑娘们也回村了。解放军指战员向老乡们宣传河

套、绥远和全国大好形势，老乡们便向指战员哭诉匪特们的罪行。有些老乡看到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便把藏在外面的牛羊赶回来了，把埋在地下的锅碗什物也挖出来了。

一次，部队住在太阳庙附近的一个村子，做饭烧了老乡十来捆从洪水中捞出来的柴禾，给了一万五千元（合新人民币一元五角），这个老乡拿着钱愣在那里，甚为惊异。部队在六缸房子做饭时，不慎火燎了老乡的锅盖片子，给赔了两千元钱，老乡发笑。战士们在西补隆吃小米饭没菜吃，老乡柜上放着几苗葱，却没有一个战士去拿点葱叶吃。老乡们都说：“从祖辈也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这样规矩的军队”。一次，部队走了一天，也没见到一家老乡。到阿贵庙沟地，随羊粪蛋爬了七八里高山，才找到一家蒙古族牧民。当时部队要用马馱的糜子换他五只羊吃，老阿爸要两石五斗糜子，而部队给了两石四斗，只要了四只羊。老阿爸感激地说：“比，吉仁那素胡日特勒，伊木，赛音其日格，赛，乌吉勒！”（意思是：我活了六十多岁只听说有这样的军队，今天才亲眼见到了。）

部队为追堵匪特，夜以继日地行军，一天走六七十里甚至八九十里，脚上起了泡，也没有借老乡一头牲口骑。可是每到一地，只要看到老乡

成熟而没有收割的庄稼，就帮老乡抢收。军分区骑兵连在公主圪旦用一个下午帮老乡割了二十多亩糜子。骑四师十团，一天给老乡割了一百八十多亩庄稼，拾粪五十筐。三二七团在平城只住了两天，就将各家老乡多日来未起完的山药、秋菜全部给起运回家。而部队不论在哪个村，买一斤白菜、一斤土豆，都要按价付钱。但老乡们说啥也不收，可是不收也得收，老乡们说：“你们永远不要走了，我们养活你们。”“有你们在，我们夜里就能睡个安稳觉。”“不然，土匪来了，我们又是野外芦草地里的客，连出气还得低声点。”

骑四师十团和军分区的红白马连，不论走到哪里，都自己蹿马，自己铡草，自己滴料，自己拉着马放青，生怕吃了老乡的庄稼。老乡们大人小孩都围着看，他们说：“过去国民党的马队和土匪的马队一到村，总是强迫老乡给蹿马、铡草、喂料……有谁敢说个不字。象解放军这样一切都由自己干的马队，过去从来没有见过。”

河套地区人口稀、村子少，大村二三十家，小村二三家。部队到一个村子，实际全睡在房子外、屋顶上。一次，骑四师十团住在太阳庙附近的王少东村，三四百人全睡在露天里，不巧半夜下起大雨，战士们被雨淋成落汤鸡，可谁也没有

进老乡家去避雨。

部队在山后沙漠地带剿匪，不仅走二、三百里找不到人家，找水尤其困难。部队天天在沙漠里行军，天上骄阳似火，脚下热沙如焙，身上汗都流干了，嘴唇粘得张不开，可就是找不到水。当得知再走二十里才能到多索罗尔时，战士们忍着渴挣扎着硬是赶了去。可是那里只有一家牧民，被匪特刁抢的惨不忍睹，一看泉水，只有一点点。多索罗尔的意思就是一滴水。部队为了给老乡留下够饮用的水，几百人只用水滴润了润嘴。

战士们每次路过喇嘛庙，或露营在喇嘛庙附近，谁都想进庙里看看装饰、佛像。一些过去当老百姓时进过喇嘛庙的人，又说喇嘛庙里有这有那，和汉人的大庙不完全一样，这就更引起大家想进去看看的兴趣。但是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谁也不进庙里去看。有些战士渴了，也不进庙去找水喝。有个新战士在庙前阳坡下擦枪，班长看到了，就立即把他拉走，并说：“你忘了喇嘛庙前不准乱坐吗？”

由于我军的种种行动，感动了喇嘛。在部队离开时，往往是从活佛到大喇嘛、二喇嘛、三喇嘛，数十人、数百人同时颂经似地高呼：“宝日汗其日格！（佛军）”“腾格林其日格！”（救命爷、是天兵）。在部队离开善丹庙时，庙里的

大小喇嘛欢送部队走了很远，并且高呼：“阿拉旦，齐力格！”（意思是金子，队伍）。战士们也高呼：“巴叶斯太”（即再见）。

痛歼匪特 为民除害

八月十日，三十七军一〇九师三二七团，追击张德彦股匪，在大小红山口一带打了一仗。九月三日，李再匪伙窜至魏柜一带奸淫抢劫，我三二七团赶去，将其歼灭一部。齐俊德率各部匪众由山后窜来山前段六八、牛场湾一带刁抢，九月十日被骑四师十团、三二七团和军分区的步骑兵包围，痛歼其一部，余众四处逃窜，后被我一一歼灭，当场击毙齐匪俊德，活抓匪动工团团长张相辅、宣慰团团长王建和、营长丁芝仁及其以下匪徒五十一名，缴获战马六十九匹。九月二十四日，三二七团在铁匠圪旦以北的三柜补隆，将王耀武匪部歼灭，并将王匪耀武击毙。接着又在勾心庙再歼李再残匪，李与少数匪徒逃走。九月二十八日，刘喜才匪伙刚逃至善丹庙附近，就被我埋伏在那里的骑四师十团，中公旗部队快速歼灭，击毙和生俘匪众四十五名。张疤子率残匪逃往善丹庙方向，九月三十日被我骑兵部队包围在南坑坑岭，击毙匪徒数十名，生俘匪团长杨天升、杜宝山及其以下匪众四十余名。这时李再匪伙向东逃至郭四圪旦，被三二七团再歼。自此李再与手下数名匪

徒再无音信。十月七日，军分区骑兵在信义昌牛犊，歼贾效起匪部二十余名，生俘二十多名。张德彦率领残匪二十多名逃至东升庙北十八台，于十月十二日被骑四师十团全部歼灭，活捉了张德彦和齐部参谋处长李映南等。……

匪特在我步骑兵部队日夜追击围剿下，走投无路，匪团长郝鸿荣于九月十七日在阿贵庙投降，王如意于十月五日率残部投降，刘喜才带十四名残匪，逃无去路，于十月十一日向三十七军骑兵旅假投降，随即被扣。匪团长李建堂带三十二名匪徒向我剿匪部队投降，另有二十三名被地方政府缴械。至十月下旬，股匪只有鲍喜才、陈进才等匪首带数十名匪徒向同义隆北方向逃去，我骑十团进行了跟踪追击。

美蒋阎在河套操纵的股匪开头人数众多，他们又拉伕，又拉杆，扩充匪众；在起义部队中又不时有些连队叛变与其合伙，因而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在我人民解放军新老部队的密切配合、协同进剿下，在这不到两个月的十三次大小战斗中（不计地方公安、保安人员的小接触），击毙政治代表（特务）齐俊德、匪团长王耀武、贾效起及其匪众近二百名；活捉匪师长（后升为司令）张疤子、匪参谋长马壮、旅长兼团长张德彦、特务张静、政治主任马子刚、参谋处长李映

南、匪正副团长张相辅、王建和、杨天升、杜宝山、森可玺、康玉忠、加木苏等及其以下匪众二百三十九名。另外在我剿匪部队与地方公安人员的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把潜逃到伊盟杭锦旗麻迷图的“中国国民党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也称“反共义勇军”的总指挥崔正春抓获，在另一处将匪总司令田树梅抓获。

在剿匪战斗中，我军共缴获步、马、卡宾枪等一百八十五支、子弹五千多发、军用物资一部，战马三百三十多匹，驴、骡、骆驼各一批，以及伪国旗、伪党旗、文件、信件等各一部。

缴获物资 归还原主

在山前，在后山，在农村，在牧区，每次战斗一结束，部队便动员附近老乡来认领从匪特那里缴获来的牲畜和财物。在善丹庙打完仗，牧民们一次就认走马五十多匹、骆驼十多峰。凡战斗结束后没有人认领的东西和牲畜，都一批一批地送到陕坝绥西专署“剿匪物资管理委员会”，妥为管理。计有布绸213块、皮布衣裤238件、地毯63块、被褥98床、牛马羊皮101张、蒙人文八长的腰巾多条、妇女首饰三副、银镯五只、金银戒指多枚、白洋92元、五十两元宝一个、铜锅银碗一堆。另外还有喇嘛的大红黄袍、皮靴，念珠……

蒙族的皮靴、皮袍等。这些仅仅是匪特使用毁坏丢失埋藏后剩下随身带的。对缴获的牲畜，除认领走的外，都交军分区喂养，计有马273匹、骆驼50峰、羊142只、牛、驴12头，马鞍266盘。

专署、各县、乡都发出通知：凡是被匪特抢走的东西和牲畜的失主，只要带上县乡保甲介绍信，说明东西和牲畜的特征，来陕坝专署大院和军分区隔壁院领取。发出通知没过几天，各县、旗被抢的蒙汉族群众纷纷来到陕坝。狼山县三区大换圪旦梁来承认走棉被、衣服、布块多件。米仓新中乡六保八甲王治平领回马鞍一盘、牛皮数张。米仓二区刘子煜认走赤红大儿马一匹。米仓平城三保袁再，一次认走四匹好马（匪特抢走了他六十七匹）。凡是认准领走的东西的老乡，都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如说“共产党、解放军是世上最好的人。”

大批蒙古族老乡是从一二百里的中公旗、西公旗、杭锦旗、达拉特旗来的，还有从四五百里以外的阿拉善旗、鄂托克旗来陕坝认领的。十月十八日，在专署大院把所有缴获的物资陈设起来，在军分区附近把缴获的马匹都拉来拴好。汉人、蒙人都笑着在东西前、马群里来认自家的东西和牲畜。有的认去衣裤、牛羊皮，有的认去腰刀、银碗，有的认去头巾绸缎……但对不是自己的东

西再好也不摸一摸。如中公旗一佐伦崩在所有的鼻烟壶中，却认领了一个较差的。如阿拉善旗的阿瓦干一进专署大院放东西的地方，就高兴地喊：“米尼！爪到拉！”（我的），随即抓起一双较新的仰头蒙古靴，当他拿起来看到靴内有一双新布袜子时，便立即揪出来放在原处，喊着：“米尼比先！”（不是我的）。杭锦旗吉告吾米得妇女，她家三副头带都被匪特抢走，这里陈列的三副头带，没一副是她家的，她只摇头，连这三副头带上一粒珊瑚珠珠也不动一动。西公旗维儿布已经认好一匹马，登记了，当他拉着马出大院时，他又仔细察看了马臀上的火印，发现有一点不对，便立即解开缰绳，把马放回马群。从晏江县来的一位大嫂，在衣物里只认走一双穿过的布鞋，说这是她亲手给她男人做的，有好几双新布鞋，她说不是她的。

这一次，只认领走缴获物资的一部分。计有衣物二百来件、马七十多匹、马鞍四十多盘、骆驼十七峰……牧民们骑在马上、骆驼上，举着认领上的财物，高兴地唱着感谢共产党、解放军的歌子走了。

王毛仁股匪覆灭记

许闻新

在解放前后那几年，在固阳县、乌拉特前旗后山地区及包头附近，提起匪首王毛仁，无人不知。当时有些人家的孩子哭起来乖哄不住时，大人则用“看王毛仁来啦”来吓唬孩子。可见王毛仁对上述地区的祸害程度绝非一般。

王毛仁，又叫王占山，是固阳县福盛庄附近的十二分子村人。王在年幼时，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到十八、九岁时，就开始“刮野鬼”、当土匪。抗日战争时期，因王毛仁从后山地区给傅作义往后套招兵买马，傅给王毛仁挂了个团长军衔。但王并不真正抗日，而是跟随乔二安和安华亭等人，在后山地区、乌梁素海东西及西山咀一带，打骂群众，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干了不少坏事。1944年，王毛仁投靠了驻扎在后山地区的杂牌军王国祥旅长，因二王之间旧有交往，王国祥将王毛仁任命为四连连长，令其驻在明安川和小余太一带。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王国祥深感王毛仁这个人不好管训，经常给惹事生非，同是当地人，过分祸害当地百姓，多方招来

非议，遂将王毛仁推荐给守备包头的赵炽昌旅长。王毛仁到了赵炽昌旅，仍当连长。从这时开始，王又与明安的张贵生、张五小勾结起来，重点抢劫后山和乌拉山前的群众的马匹和大烟土等物。

解放前夕，赵炽昌逃往台湾。王毛仁预感到情势复杂，后果难以判断，于是决定暂回固阳县十二分子村，观察形势，待机而动。

1949年深秋，武川县一个外号叫“干豌豆”的惯匪，他用两辆胶车搬着两个女人，载着两挺机枪，还带着名叫贺参谋、李排长、赵德胜等几个武装匪徒，打听寻找王毛仁处。在王毛仁家住了下来。当天，“干豌豆”就对王毛仁说，象你我二人若落到共产党手里，不活剥一层皮，也不会有好结果。依我看，咱还不如组织起来跟共产党对抗，咱们熟悉地形，又骑着四条腿的跑得快，谁也奈何不得。王毛仁在“干豌豆”的煽动下，顿生再度为匪之念。几天之后，“干豌豆”带着那两个女人，离开王毛仁家，奔他处去了。而王毛仁则到海湾沟等处寻找上当年一起“刮野鬼”的张五小、张贵生和他们的小舅子马二虎，在回的来路上，又遇到特意来投奔王毛仁的原匪伙成员白海，几个人合计了一番，便一起来到十二分子村王毛仁家，然后又将贺参谋、李排长、赵德胜三人招呼上，共八人再次拉起股匪，重新干

起祸害地方、残杀无辜的土匪勾当。

这股土匪经常活动在崆石太山前后及乌拉山这个易于隐蔽的地区。王毛仁则常去后山海湾沟村和姘妇王有成的女人鬼混。

一次，王毛仁匪伙来海湾沟村住了几天离开时，村里的民兵王石海和苗二娃对匪徒们说以后你们少来这里，免得让乡亲们蒙受耻辱。王毛仁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便对匪伙说，咱们还能受这两个人的气，下回来了给他个厉害看看。过了一些日子，王毛仁又带着匪伙来王有成家，当他和王有成的老婆鬼混够了要走时，便派匪徒将王石海和苗二娃抓来，捆绑在王有成的院子里，命令张贵生把王石海和苗二娃一起打死。张贵生自感处于风烛之境，想为自己留条后路，遂用顶撞的口气说：“我不干！”王毛仁瞪着眼对张贵生说：“叫你打，你就打，这是命令！”在王毛仁的威逼下，张贵生翻身上马，转回身来，“当、当”两枪，将王苗二人打倒在地。匪徒们草菅人命后，遂扬鞭策马，匆匆离去。后经查明，王有成夫妇因犯勾结窝藏土匪、坐地分赃罪，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1950年正月初四，我骑四师剿匪部队在小余太德合昌把王毛仁股匪包围，匪徒匪首们见势不妙，便抄小道向山里逃命。我剿匪战士纵马追

击，打得匪徒抱头鼠窜。匪伙中的贺参谋、赵德胜，因是山西人，初到后山，地理不熟，又且骑得是抢来的笨马，跑得慢，因此在逃跑中先后被击毙。那个叫李排长的土匪，觉得再呆下去只有送死，于是化装偷跑回了武川，最后被我剿匪部队击毙。王毛仁的内弟马二虎，也看到跟王毛仁当土匪终归没有好下场，他为了脱身，在石门村向王毛仁提出，女人快要生小孩了，得请假回去照料一下。说完，放下随身带的枪就走。而翻脸六亲不认的王毛仁，在马二虎出门时，掏出手枪对准马二虎恨恨地说：“好！你小子也不跟我一心了”。在他抠动板机时，匪徒们上去一夺枪，子弹射在门框上，差点要了马二虎的命。第二天，马二虎向王毛仁说了好话后才回了家。马二虎回家不久，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并交出家里存放的一挺机枪。经人民政府教育后，给予从宽处理，让其回去参加农业劳动。

这时，以王毛仁为首的匪伙，连死带走损失了一半。留下的四名匪徒，丧魂落魄，昼夜逃窜。在人无吃的马无料的情况下，匪徒们强行抢夺，更加凶残。一次这伙土匪在小余太西边的太白山附近遇到了叫官山虎的熟人，官骑着毛驴，带着一匹役马。白海又饿又馋想吃马肉，就将官山虎的马用枪打死。他怕官山虎回去向剿匪部队报

信，又用枪将官山虎杀害。匪徒们逃到什纳干后，杀了农民的一头牛，用来充饥。什纳干有个叫四喇嘛的老乡，因经常外出谋生，准备下些干粮，不巧遇上了这股土匪，将干粮抢走，还将四喇嘛的肩膀上打了一枪，致使四喇嘛半年不能下地劳动。

我剿匪部队为了早日肃清匪患，为民除害，经常夜以继日追捕匪伙。在与固阳县交界的大怒气发现王毛仁等后，经过一天多的追击，匪徒们丧魂落魄，逃入深山躲避。通过这次追击，虽然没有将王毛仁等歼灭，但却进一步瓦解了匪伙。白海、张五小二匪离开王毛仁，各自奔逃。他们每日东躲西藏，不久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剩下王毛仁、张贵生二匪，日不敢入村，夜投宿山洞，经过三天多仓惶逃遁，自认为摆脱了剿匪部队的跟踪追击，在广生隆山上停下马脚，由张贵生给马拔草，王毛仁瞭哨。就在这时，我剿匪部队犹如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二匪面前，并向二匪猛烈开枪，打得王、张二匪猝不及防，丢下子弹一百多发，十五响盒子枪一支，“汉林春”步枪、“七九”步枪各一支和一架望远镜，逃入北山走了。

1951年秋季的一天，阴雨连绵，王、张二匪窜到乌拉山的大坝沟，从一户蒙民家中抢了一些

吃的。因疲困不堪，就去沟里找了个隐身处，将马拴在附近的丛林里，而后倒头去睡。当被风吹醒后，发现乘马不见了，他们就吹起口哨进行招呼。两匹马听见口哨声嘶叫起来，王、张二匪顺着马叫的方向走去，看见两匹马被拴在一个较高处靠近大石头的一棵松树上。由于二匪不明底细，不知是什么人将马牵走，虽索马心切，而又不肯轻易靠近马匹。二匪在丛林中窥视了一阵，牵马人发现了二匪，首先开枪射击，子弹从二匪身边飞过。二匪凭着多年的经验判断，认为牵马人的枪法不凡，加上不知细情，遂退下来。原来牵走二匪乘马的，是护畜打狼的蒙古族牧民那生乌力吉。二匪回到山洞，估计那个牵走他们马的如是本山沟里的蒙古人，第二天必然要往旗政府去送马。于是王、张在第二天一大早，来到沟口子埋伏好。等到半前晌，果然看见一个蒙古人骑着一匹马，后边带着他们那两匹马顺沟来了。快到跟前，二匪一齐吹起口哨，二马听到主人的招唤，一下背缰跑掉。那生乌力吉因不知虚实，便调转马头，飞驰而归。马匹回到二匪身边，已没有鞍鞯。二匪骑马走了一段路，因没有鞍鞯，实感不便。想入较大的村庄去抢马鞍，又怕碰到解放军难以逃脱。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既无马鞍，又无马料，骑马潜逃，又容易暴露，于是决

定弃马步行。二匪离开大坝沟，步走了几十里，在坝梁与十一分子村之间的一块莜麦地里被固阳县的公安队发现，双方打了几枪，王毛仁的大腿上中了一弹。经张贵生给包扎后，二匪找了个藏身处，隐蔽起来。待到夜幕降临时，张贵生连背带拖，将王毛仁拖到渣石太山，找了个山洞，在洞里养伤二十多天。伤好后，已进入冬季，王、张二匪感到在深山里潜藏，日子越来越不好混，于是逃到昆独仑河，乔装打扮成乞丐，计划经王大汉营子过黄河，到伊盟鄂托克旗一带躲藏。不料走到黄河中心，遇到一个又长又宽的亮子（水深处未能封冻结冰），因二匪均属后山人，不知道黄河封冻后会有亮子，却认为整个黄河未封冻，因而转身连夜回到前口子边墙壕村外，找了个避风处暂且喘息。就在这里，王、张二匪苦思冥想，商议去向，却无良策。最后决定，各奔逃生。这时两个人身上还带着一支加拿大手枪和一支二号连枪，可是两支枪只剩下一发不配号的小子弹。

在分手时，王毛仁竟将两只手枪全部拿走了，气得张贵生暗自骂道：“好一个姓王的，我跟你这些年，又多次救过你的命，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你连个要饭的家具（指手枪）也不给我留一支，真是太没有良心，太不够朋友了。”

王、张二匪分手后，王毛仁独自一人，在后

山地区昼行夜伏，东躲西藏，企图逃脱人民的法网。

1951年12月底，我骑四师司令部参谋贺大保率领十几名骑兵，在后山地区到处追击王毛仁。当他们行进到小余太二十三分子村时，天空阴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就要来临。但是为了尽快消灭匪首王毛仁，剿匪健儿们不畏严寒，在深山峡谷中披星戴月，搜索前进。

到12月30日下午，当我剿匪部队到了点力素太附近的九分子村时，已经雪花纷飞，山上沟底，全是白茫茫的一片。这时，中后联合旗的十几名公安战士在副队长陶克陶格日勒的带领下，也为追捕王毛仁来到九分子村。在太阳将要落山时，从东边来了两名骑马的老乡，向我剿匪部队报告说：在距九分子村五里远的两眼井处，他们见到了王毛仁。我剿匪部队得到这一情况，立即出发。当赶到两眼井时，当地老乡说：王毛仁从这里抢了些被面，已经离开有一阵子了，但其去向不明。这时天色已黑，好在有雪映射，尚能觅路。我剿匪部队在几个路口处寻觅踪迹，终于发现了王毛仁离开时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我剿匪部队跟踪追寻了七、八里路，见有两间低矮的土房，从窗户纸上映出明亮的灯光，战士们进入小屋，向主人打听来过个身子胖的人没有？主人回答说：

刚才来了个身子很胖的人，朝北走了。贺太保与陶格陶格日勒一看情况吻合，便不顾深更半夜，带领战士们继续跟踪追寻。由于王毛仁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时隐时现，再加上匪首的狡猾，为了少留踪迹，王匪有时偏离开路踩荒而行。我剿匪部队虽是骑兵，却很难快速前进。在拂晓以前，固阳县的几十名公安队员也为追捕王毛仁乘马而来。他们三路兵马会合在一起，在天快亮时，行进到小余太西边的公盛成口子（进入渣石太山的一个沟口子）。贺太保决定就在附近村里老乡家休息一会儿，待日出后再入山搜捕王毛仁。

日头从东边山上升起以后，我剿匪健儿跨上战马，分三路从公盛成沟口子入山。由沟口子向西北侧延伸，便是渣石太山西端一个名叫大白山的主峰，当时骑四师的剿匪部队从东北方深入，向大白山包剿过去；固阳县的公安队从西南方进沟，往大白山一带搜索。中后联合旗的公安队则从正面向大白山方向前进，一个目的捉拿王毛仁。在深入山沟五、六里远的地方，发现匪首王毛仁正在大白山脚下一个向阳处靠着一块大石头晒太阳。陶克陶格日勒和丹巴用枪和机枪瞄准王匪，同时开枪。王匪中弹后，跳起来走了几步又栽倒在地上。骑四师和固阳县公安队的同志听到枪声立即赶来，匪首王毛仁已经毙命。他们从王

匪身上搜出两支手枪，并将王匪首级取下，带到二十四分子村里。老乡们看到王毛仁首级，无不拍手称快。

匪徒张贵生在跟王毛仁分手后，化装成乞丐，沿途讨吃要饭，潜逃到伊盟达拉特旗张四圪堵村住了下来，以给村里人做临活为生。他为了长期隐蔽，假报了祖籍和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又改了姓名，伪装积极，骗取了当地人的信任，当了多年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娶了女人，组建了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当地追查他的历史问题，他自感难以继续隐藏下去，便偷偷离开达拉特旗张四圪堵村，跑到固阳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并把埋藏了二十多年的一挺机枪向我人民政府交了出来。后被固阳县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七年。刑满释放后，回原地乌拉特前旗明安乡官牛棋村定居。

页末注：本文部分情况，系张贵生提供。

河套三害

宝音德力格尔

早年的河套，原是一个地广人稀的牧区。到清代中叶之后，汉民来套者日见增多，使河套逐渐成为蒙汉杂居、农牧并业的地区。满清政府为了缩小蒙旗权益，向百姓征粮收税，乃在河套隆兴昌地方成立五原厅，与伊盟东胜厅，同归萨拉齐县二府管辖。所设机构及区划，与其他各县相同。民国以来，内地军阀割据，彼此混战，多数省份灾情严重，无人过问，因而大批难民拥来河套，而各省的知识分子、商贾和小手工业者，也都纷至沓来，这样就使河套人口剧增，城乡各业得到发展。以后经过冯玉祥的“移民实边”、阎锡山的军垦屯田和傅作义进套守土抗战，在套内增设了县治，发展了农业。

然而旧社会的河套，却非一个安乐的世界。官府的横征暴敛、地主的压榨剥削，自不必说，而疫病、帮会、兵匪等天灾人祸，就把人们折腾得苦不堪言。现就个人回忆所及，将此“河套三害”，分别叙述如下：

疫病流行 死亡严重

旧社会的官府，只知榨取民脂民膏，根本不搞卫生防疫设施，所以多少年来，河套疫病不断，百姓深受其害。

在1915年至1916年（民国四、五年）间，河套境内发生鼠疫，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只能重赏穷人，将死人抬出焚烧掩埋，因而疫病传染很快，人畜死亡，特别严重。尤其是绅商大户的雇工死亡，一日数起，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于是套内居民，纷纷逃走。有的逃回萨拉齐县，带回疫苗，使鼠疫在萨县迅速传染开来，长达半年之久，城乡居民死亡甚多。

1922年（民国十一年）冬，河套疫病（人称“传头子病”）再次发生，人人告危，相互不敢来往。当时我正在河套执子卜隆教堂，教堂为了免受其害，便于防治，不仅施以药剂，且将大小门紧闭，不让人出入。记得有个叫史福高的同学，家在教堂西十五里地的葛蛇村，当疫病流行最厉害的时候，这个同学苦苦要求请假回家，经多方劝阻无效，只好将他秘密从后小门放出。在疫病过后，久不见他来校，据其附近人谈，史回家的当夜，全家染病死去。据说此次疫病传染，比上次更为严重，直到二三月间，疫病逐渐消除。1927年仲夏，河

套发现一种时症，按当时内地来套的人说，此病叫“羊毛疔”，十分厉害。病发后，必须在胸前背后用针挑出象羊毛的东西，才能见愈。如不会挑，或挑得迟了，在半小时内就要丧命。所以当时因患此病而死的，也为数不少。1928年春夏之交，河套又传来一种时疫，日本人叫“虎烈拉”病，国人叫“霍乱”。此种病症，同样要医治及时，否则，不仅难治，多数医药无效，而白白送命。经过上述几次疫病，人畜死亡惨重，农业和其它各业的损失，也无法估计。在一般情况下，由于缺医少药，人们有病，同样医治困难。加上庸医杀人，因一般疾病而死者也不计其数。所以在旧社会，疫病对河套人来说，确是一大灾害。

二 帮会道门 坑害百姓

河套人民遭受的人祸，首先是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河套的地主豪绅，多半是各种会道门的头目。会道门所以能在河套盛行，欺压人民，是与河套的地主豪绅分不开的。据说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地主王同春（瞎进才），便是哥老会的头子。当我在1919年来河套时，正值蔡成勋部队驻防河套，地方上尚称安谧，到1921年冬，蔡的部队调往江西后，宁夏镇守使马福祥被任为绥远区都统，因马所属“宁海军”未能及时调来河套，

河套一时空虚，哥老会就趁机潜入，先是秘密活动，到1923年转向公开，成为河套的一害。哥老会这个组织，有龙头、老大、老三，堂口、红旗管事、学旗管事等。其活动情况是：白天到各户威吓、欺诈、拉拢，招人入会；夜间成群结伙，到指定地点，摆设香堂榨香。在香堂内，部署武装人员，气氛异常紧张。在香案上满斗插香，令入会者先焚香立誓，然后持刀榨香，一次榨断，则认为是诚心入会，备受欢迎；榨不断的，则认为是没有诚意，轻者驱逐，重者还有性命危险。在入会之前，必须缴纳入会费及香堂开支。入会后，要学习会中暗语及礼度，然后向长辈送礼，背诵暗语，叫“湍条子”。暗语一定要纯熟，对答如流，否则不认。会员彼此见面，首先问话是：“有沾没沾”、“有联没联”。会内还有吃清水与吃洪水之别，吃清水是一般会员，吃洪水就可以为非作歹，充当土匪。由此可见，哥老会是产生土匪的渊源。对不入会的，就叫“白头牛”，就要受到欺压暗算。有的被明伙执杖抢劫，有的牲畜被其损害。如哥老会的人，常在夜间成群结伙，去到人家羊圈，把羔羊拧死，剥了羔皮就走。据说一夜能拧死人家羔羊一二百只，因此人人畏惧，多数入会。当时河套流传的“除了哥老会没人啦”，“除了大仙没神啦”的说法，即是指

此而言。可见哥老会活动之猖狂和为害之烈。1925年，冯玉祥督办西北，绥远都统马福祥晋升为会办，国民党军进驻绥西一带，驻包头的国民军旅长、人称“石屠家”的石友三，对哥老会则毫不客气。1926年旧历除夕，国民军将包头哥老会头目小五杨和河套五原哥老会头目梁雨亭及其亲近，同时除灭，哥老会才销声匿迹，转入地下。但在这年夏季，冯玉祥与军阀作战失败，国民军的四个军全部退来河套。其中第二军里因有哥老会组织，所以河套的哥老会，又乘机抬头，进行作乱。虽然国民军的第一军屡次设法想消除第二军内的哥老会头目，但河套的哥老会仍继续猖狂，到处坑害地方百姓。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西去之后，由于河套土匪猖獗，哥老会组织亦更加强大。到1933年孙殿英部队进套后，哥老会才销声敛迹。继哥老会之后在河套出现的一个帮会，叫“青帮”，一般人称之为“家理”。据说这是河路槽运上反清复明的一种秘密组织，孙殿英就利用这个组织来治军，所以在孙殿英来套之时，这个组织的人随之来的不少。这些人来套之后，立即开始宣传活动，招收会员，扩大组织。在“家理”内部，多按资排辈，分出长辈小辈。其活动情况与哥老会大致相同，对人民同样进行欺骗剥削。但总的来说，不象哥老会那样明目张胆

地坑害欺压百姓，因之一经宣传，多自愿参加。这个“家理”，也有暗语和礼节，他们彼此见面，首先要问老大贵姓，回答是：在家姓×，出门姓×，上×下×。在称呼人时，有所谓“三老四少”，礼节繁多。其剥削方法是，巧立名目，向会员起款。小辈对长辈，必须供应养活，甚至比亲生父母还要得理。在孙殿英打宁夏失败后，这个组织在河套还盛行了一个时期，直至1935年之后，才逐渐衰落而消失。在“家理”盛行前后，还曾有个“秘密教”传来河套，蛊惑群众。这个教传授什么“五字真言”，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但实际上，多吸收妇女参加，向妇女欺骗讹诈钱财。这个教不到二年时间，即自动离去。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河套又出现了一种道门，叫做“一贯道”。其组织有“前人、点传师”、大坛主、小坛主。同样是在夜间活动，叫做“开坛”。在开坛时，除焚香祷祝外，还要扶乩。扶乩时，要有助手，叫做“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这个组织，不仅利用封建迷信和欺骗手法，愚弄群众，发展道徒，收取道费，骗诈钱财，而且通过扶乩，制造政治谣言，籍以蛊惑人心，扰乱地方，以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这个反动道门，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彻底取缔。

三 兵匪为患 生灵涂炭

本来兵匪应当分清，不该相提并论。但在旧社会，有些军队象土匪一样扰乱地方，祸害百姓，因此这些部队是兵亦匪，兵匪难分。如自1922年，宁夏镇守使马福祥任绥远都统后，河套各地土匪蜂起，乱刁乱抢，为害地方。马福祥之子马鸿逵任混成旅旅长兼剿匪司令，常同土默特旗老一团来套追剿土匪。因西军素质不良，军纪不严，常在土匪走后，闯到老百姓家，看到牲畜、财物，就诡称土匪所留，强要乱拿。所以当时河套人民，称这些军队是“二茬土匪”，“破布贼”。在1926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套以后，国民一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但在其他军里，也有部分军队，军纪松懈，不顾军法，到百姓家里任意糟害，乱要乱拿，因此人称这些军队是“刮民军”。到1929年冬，河套土匪头子王英经阎锡山收编为包五护路队司令，进驻河套，其对待人民百姓，实在是兵匪难分，人称之为“官土匪”。1932年春，马鸿逵回宁夏任主席，其部路经河套，沿途大肆骚扰，百姓深受其害。1933年，孙殿英受命青海屯垦督办，路经河套，名义上沿途设有兵站，实际上军差粮秣都出在地方，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后在抗战初期，前线部队多退

未河套，有些杂牌部队竟明目张胆，随意刁抢，不啻土匪。至于土匪之患，自民国以来，在河套始终没断。首先是卢占奎匪部，据说卢是丰镇隆盛庄的一个小贩，于1941年聚众为匪，旋被绥远省都统收抚，受命来套驻防。后与外蒙人巴彦公、达赖公匪众合伙，号称“独立队”。因无处领饷，一直糟害地方，勒索百姓。同时到处“绑票”，“请财神”，以此来索要银两、军需用品及武器弹药。对所要之物，必须按指定时间交纳。在未交财物期间，对所请财神特别优待。对到期如数交来财物者，当即保护释放。其一时不能交纳，经请求可以缓期。倘不按期交来，便要“撕票”，就是要命，乃活剥人皮，以人皮制成扯手、鞍垫、后鞞，手段非常残忍。这股土匪1917年才离开河套，经包头萨县东去。到1922年，马福祥主持绥远后，土匪蜂起，到处刁抢，绥东有武万夷、苏雨生、赵有禄，绥西包头有小金、刘拉麻等。经常出没于河套，奸淫掳掠，吊打烧杀，无恶不作。在1924年冬，刘拉麻(外号烂屎刘)与西军变兵合伙，进来河套，除要吃要喝之外，还逼要财物，乱“请财神”。在河套鬼混至春，经调来西军马腾蛟部一团兵力追剿，才向包头一带逃去。继刘匪之后，当地也有土匪崛起，在五原隆兴昌

附近，有“大辫四子”股匪数百人，在五原北区一带，有“双辫杨”股匪数十人，经常骚扰作乱，祸害群众。这年秋天，又有周昌旺、王毛仁两股土匪，各数百人，同样是奸淫掳掠，吊打烧杀，无恶不作。到1926年春，又有黑脸王、固阳人斧头刘两股土匪，各数百人，在套内糟害。这年秋天，河套的土匪更多，什么杨灯罩、锅盖二子、二锅盖，都各带匪徒数百人，在套内烧杀抢掠。另外还有无名股匪，拥入河套，乱刁乱抢，使河套成为土匪活动的场所。这些匪众，一直作乱到1927年初夏，才销声匿迹。可是到了秋天，又有西公旗西山“长胡子”森盖营长的儿子马什巴彦尔，率领前山色登葫芦头地方土匪百余人，窜进河套，扰乱数月之久。后因此人患了梅毒，骚乱才告停止。

1928年，绥远各县干旱成灾，颗粒不收，土匪无处安身，匪首赵有禄（外号赵半吊）率其匪众又来套祸害。此匪糟害百姓，较其他股匪尤甚。山西阎锡山派郭凤山骑兵师（人称黑马队）来套追剿，赵半吊子被擒，匪众也随即鸟散。1929年冬，王英率其匪众，两次来套，后以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不久叛国投敌。1933年，当孙殿英部去青海路经河套时，王英旧部、杨猴小土匪，又趁机来套骚扰，后见势不妙，受孙殿英招抚为骑

兵第四师，随孙往宁夏而去。这年冬，又有宁夏土匪马大牛来套，经41军包剿，无法存留，乃由1934年春，冒险渡乌梁素海东去。之后，因有晋绥军进驻河套，且屯田军垦，才免于匪患。到1937年抗战开始后，有些投敌土匪又纷纷反正，退来河套。反正土匪，虽不象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烧杀刁抢，但仍强取豪夺，百姓遭殃。

回顾自民国成立以来，到抗战胜利，约40年之久，河套人民备受疫病、帮会、兵匪之害，一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直到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三害，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旧社会河套鸦片烟毒之害

苏希贤

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鸦片毒害我国人民达一百多年之久。我盟河套地区种植鸦片的年代亦很久远，据有关资料和民间传说，在光绪初年即有人种植。民国年间虽说禁烟，但实际从未禁绝。日寇统治时期，更在各地成立土药组合，大力推广鸦片种植，成为日寇榨取中国、毒害我国人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是1939年来到河套的，当年河套的边远地带还种植鸦片，我和父亲就在临河县一过黄河的巴拉亥地方种过。在此之前，祖辈们经常上套“跑青牛犊”种田，故对河套种鸦片和鸦片烟的毒害情状有所了解。兹就记忆所及并参考有关资料和采访所得，写成此文，作为后世之戒。

鸦片烟的形成与性能

鸦片本是一种药品，《本草纲目》称它为“阿芙蓉”，又名“阿片”，清末民初叫“大烟”。由于它盛产于印度，由英帝国主义用炮舰

输入，所以也叫“洋烟”。

鸦片是从罂粟果实上割取的浆汁晒干而成。罂粟叶为长椭圆形，有锯齿，花大而美艳，有红白紫等色。雌蕊状如瓶，实为干果。果实未成熟时，中有乳白色浆汁，很像蒲公英的浆汁，是制鸦片的原料。把浆汁晒干，变成褐色的块，有异臭味。

鸦片是在春融解冻的清明节前后种植，苗齐后，中耕间苗、定苗，成苗后，灌水两至三次，农历六七月间烟苗开花，花谢十天半月后，果实半成熟。此时即用小刀（状似钩镰）轻轻割破外皮，乳白色的浆汁便流了出来，再用手指把浆汁抵收在器皿之内，晒干即成褐色的鸦片膏。待吸食时，再用不含硷质的清水溶化，熬成粥状，便可吸食。

由于鸦片内含有吗啡物质，所以它又是制作海洛因的原料。用鸦片蒸发制成微细根状的白色粉末结晶，便是海洛因，俗称“料面”或“白面”，味稍苦，毒性很大，有很强的麻醉性。还有兴奋精神、消除疲劳和减轻喘咳、镇静安眠的功能。“料面”包装精制，有如香皂块大，每块重二两四钱（旧时十六两秤），当时售价一百余元，相当于黄金价格。凡吸食成瘾者，多则倾家荡产。男的沦为乞丐，甚或铤而走险，为匪为盗

者大有人在；女的失节为娼、伤风败俗者也屡见不鲜。可见吸毒对人为害非浅。

鸦片的种植来历

在一百多年前，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外扩张，印度被其侵占。英在印度广种鸦片。英商将印所产鸦片大量运来我国广东一带贸易倾销，不仅捞取了中国人民大量白银，而且毒害了无数中国人的身体。两广总督林则徐深虑鸦片祸国殃民之害，特向清廷条陈禁烟。满清政府于1838年11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负责查禁鸦片。林则徐在广州迫令英商交出两万余箱鸦片，尽数焚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后来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在洋人面前妥协退让，造成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

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政府与英法等帝国主义连续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每次赔款，多达数千万两白银，加上满清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使国库银两消耗殆尽。在此种情况下，各省军政费用多靠自筹，而自筹的办法之一，则是允许民间种植鸦片，通过征收烟税，以补经费之不足。所以，从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种植鸦片，年年有增无减，一直没有断绝。

河套地处塞外，河套种植鸦片，据有关资料

记载和民间传说，是晚清光绪初年，随着外国宗教势力的入侵而开始的。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有比利时天主教神甫南怀仁来中国传教，他令巴耆贤、德明玉等人，于1883年（光绪九年），率领五名“圣母圣心会”（专在蒙古教区传教的组织）的传教士，从察哈尔西湾子教堂（在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来到“西南蒙古教区”传教时，为了发展教徒，采取拨给土地种粮种大烟的办法，来诱骗人们入教。到1900年，在“西南蒙古教区”就建起教堂21处，发展教民约5680多人。当时的西南蒙古教区包括萨拉齐厅和伊克昭盟。河套归辖萨拉齐厅，同时也是伊盟达拉、杭锦二旗的领域。

地方戏“二人台”有一出《种洋烟》的小戏，其中有段唱词是：“晴天那个蓝天，晴湛蓝蓝的天，光绪爷年间后套种大烟，洋烟本是外国的种，外国人拿来害我们老百姓……”。起初河套种洋烟仅在西部有天主教堂的地方种，如《种洋烟》的对白词中云：“大发公，裕隆荣，陕坝、蛮会、三盛公，这些地方有洋人，拨上好烟地，种上准有好收成”。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委派贻谷来河套放垦，天主教堂乘机用买、租、借、占、赔等手段，掠夺霸占大片土地，拨给教民，公开种植鸦片。此后河

套种植鸦片便自西向东普遍推开。如《种洋烟》的对白词中有：“隆兴长、白圪梁、乌兰脑包、西义堂，这里是种大烟的好地方”，“好地方还有那什巴圪图，银定图，呼乐苏图挨塔尔湖”。从这些唱词对白中亦可以看出，河套种植鸦片始自光绪年间。

到了民国，虽然历届各级政府都把禁烟禁毒作为“要政”，并明令执行，但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从未真正实行。晋绥两省的最高统治者阎锡山，为了养活他庞大的军阀部队，从三十年代开始，提出了一个美其名曰“寓禁于征”的新招，即按种烟地亩征收“禁烟罚款”。每亩课征十数元到数十元现洋不等。河套的百姓识破了阎锡山的真正意图，乃大种特种、大运特运、大售特售鸦片。结果使良田沃土全成了烟亩，抽大烟的人越来越多。

那时在征收禁烟罚款之前，先要以县为单位，由省里派来的“禁烟委员会”监督指导，组织丈烟委员丈量烟亩。丈量时，谁能给丈烟委员吃好的，送上硬的（现大洋），谁就能少丈一点，或偷改草册，占些便宜；谁要是胆小诚实，不施贿奉，谁就要吃亏。丈烟委员每丈一户，就将统一印制的丈烟册据联单发给一张，凭此交纳禁烟罚款。这从表面上看，手续严格，无可非

议。但事实上营私舞弊的事情则层出不穷。有一个县的县长串通省里的禁烟委员，把交来的丈烟三联单存根暗地毁了几本，将这部分禁烟罚款和经办人员共分，装入私囊。那时从省到县直至乡间（后来改制保甲），凡是沾手清丈烟亩与征收禁烟罚款的人员，无不雁过拔毛，大发横财。至于县长，阎锡山为了鼓励多种大烟，规定另有百分之五的禁烟罚款的合法提成，名曰“办公费”，又能额外捞到很肥的油水。

省里仰承阎锡山的意愿，为了多筹经费，每年给各县分配禁烟罚款数额时，实行大包干。各县从经验中看到多种摊得轻，少种摊得重，就向百姓大力宣传扩大种烟亩数的好处。但名义上每年照例要张贴一张禁烟布告，以掩人耳目。

一九三一年间，河套的军阀王英，钻阎锡山明禁暗种的空子，率所部骑三师占据临河，勒令全县农户大种二年鸦片，向农户派定种烟任务后，不种不行。除征交阎锡山下达的禁烟罚款任务外，他又向烟农每亩加征十到二十两干板子鸦片。这年他总共征得干烟七千余两，用以维持其军费支出。

大种鸦片 人民受害

1932至1937年间，是河套大种鸦片

烟的极盛时期。这期间，阎锡山的亲信王靖国代理屯垦督办职务，负责绥西屯垦。他秉承阎锡山的意旨，除负有监视傅作义的使命外，主要利用河套土地肥沃、偏处一隅的地理环境，对外放出埋首建设、不干预政治的烟幕，在河套大量种植鸦片，捞取资金，扩充实力，以遂阎锡山向河套西边的宁夏扩张势力的夙愿。

当时屯垦各区的垦地，都以种植鸦片为主。除屯垦队集体种植外，还招佃农广为种植。如王靖国七十师的师垦一队，驻地在临河祥太魁（今为新华）西边的冯家圪旦，领有垦地一百余顷，绝大部分种了鸦片。集体种不过来，就出租给农民种植。农民每承租一亩烟地，要给屯垦队交干板子烟膏30到40两。屯垦队对所交烟膏，先按标准分成“倒动的”和不沾手”的两种，再按“一九”或“二八”扣除杂质后，才给收抵地租。烟农种烟付出很大辛劳，交租后却所剩无几。

屯垦队在临河、五原、安北三县和达拉特旗前山地区，共划分四大屯垦区，分布着32个垦殖连队，总共占有垦地5115顷（每顷一百市亩）①，大部分好地种了鸦片。过去人们给算了这样一笔账：就以一半种粮一半种烟估算，种烟地亩约有三千多顷，合三十多万亩。平均亩产鸦片以一百市两计算，年产三千多万两，近二千万两。所以大

烟便成了屯垦队的主要产品。

每年收烟季节（农历七八月间），在整个河套的种烟农村，如同赶庙会一般热闹非凡。在烟地周围，有打玩艺儿卖唱的，有卖瓜果吃喝的，在较大的村落乡镇，还有搭台唱戏的。民间艺人赶烟市，为赚钱，图吸烟，说唱快板“莲花落”凑红火。有段“莲花落”的唱词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整，王靖国带来了屯垦兵，粮食、大烟一齐种，屯垦官兵齐高兴……，从后套，到前山，洋烟种到大榆树滩（在后山固阳县境），中滩一带尽大烟，还有那黄草洼来二里半（在包头郊区）。”可见当时绥境各地都在大种鸦片了。

在收割鸦片期间，各屯垦队雇用一大批人，专门晾晒鸦片。晾晒成干板子后，再切成大小一样、份量基本相同的长方形“烟板”，集中装上汽车，运去太原，交给阎锡山库收。屯垦办事处还收购套内农民生产的鸦片，连同由绥远土店收购甘、宁、青等省运往平、津的鸦片，由屯垦队一并转运太原，统由“山西省禁烟考核处”加工制成“官烟药饼”，以戒烟作招牌，向晋绥两省和全国各地推销，牟取暴利，毒害人民。

这个“官烟药饼”的商标名为“戒烟药饼”，是阎锡山公开销售鸦片的骗人伎俩。此种药饼是按鸦片的质量优劣，分为甲乙丙三种类

型，每块重一市两，按现洋定价，每块一元，伤由各县“禁烟委员”推销，一般每月销售二十八万到30万两，获利约30万元②。当时阎锡山一面高唱“禁烟禁售”的滥调，一面在太原、包头、归绥（即呼市）等市公开设立烟馆，招牌上写着“清水净烟”，门旁贴着大红对联，歌颂吸烟的好处，以招揽人们进去吸烟。

在河套大种鸦片期间，屯垦队的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掌握土地的特权，自己不从事耕种，而是雇用劳力给自己种烟。并且专门勾结地方豪门大户，大搞鸦片烟的投机倒把生意。如安北县的赵炽昌、五原县的王乐愚、张镇远，临河县的李干臣等，屯垦队的团营连长无不与之勾结，彼此利用，以他们熟悉地方情况，加紧倒贩搜刮，使河套的广大农牧民大受烟毒之害，有不少人家陷于破产深渊，而不少屯垦军官却发了大财，逐步转化为河套的一批大中小地主或富商。如陕坝巨商胡某，原系屯垦队的连长，他管种鸦片数年，获利巨万，在陕坝开设粮店货栈。另一白某，原系屯垦军四一〇师的一个营长。他种烟倒烟几年，在临河县买下土地百顷，牛羊上千头，并依仗权势，心狠手毒地讹诈剥削当地贫苦农民，成为人称“白阎王”的恶霸地主。其他屯垦部队的大小军官，也多在临河、五原、安北三县大发横财，

占有大量土地牲畜，变成一批新兴的地主。

有些屯垦队的军官为了大发横财，还把搜刮到手的鸦片烟存放到青黄不接的春天，趁农民春耕用钱紧困之际，以高额利息借给农民，立约秋收后以粮偿贷，但到秋收以后，他们又把粮价压低，来回盘剥农民。有的农民偿贷不起，忍痛把闺女许嫁给屯垦军官抵债。如驻五原县西边五分子桥的屯垦军官张某某便是这样的典型。为此农民诅咒屯垦队说：“屯垦队手里三把刀，租税重，利钱高，鸦片害人受不了。”屯垦队在河套大种鸦片到1938年，祸害人民六七年。

1939年傅作义率部进驻河套，动员全民抗战，严令申飭禁烟，河套才不再大种鸦片。但在河套东边的沦陷区，日寇为了压榨和毒害中国人民，却令敌伪政权广种鸦片。大汉奸王英就在他的防区公庙子、蓆亥滩、高台梁、明安川和大余太等毗邻河套地带，大种了六年鸦片。因此从那里偷运鸦片到河套进行贩卖吸食者却未间断。

在抗战期间，对于倒卖、贩运、吸食鸦片，本来是有严格禁令的，对于违反禁令的，也确实惩处过一些。如1942年夏，有五原县某乡干部，到临河八岱“绥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接受“新县制”训练，因有吸食鸦片嗜好，便偷带十

几片鸦片发瘾吸食，不意被校方发觉，以触犯《干部戒条》第一条“绝不烟赌”的规定，而被枪毙示众。第二年，有五原县西边正风乡的一个寡妇老婆，因穷困所迫，偷在山药地里种了三十多株鸦片，被五原县政府查获，以违反禁烟令为罪，判处死刑，而被枪决。

然而对于有权势的人，即使违反了禁令，也另当别论。如1944年，晏江县长张亨信，为严申禁烟禁令，指派警察局杜局长带警察数名，并责令和定乡乡长苏希贤（即笔者）陪同，到拉僧庙查扣了达拉特旗王府贵族奇大太太诺月朋的鸦片烟灯，一时成为轰动河套的重要新闻。谁知奇氏系西公旗抗战女王奇俊峰的母亲，人家告在傅作义名下讲了情面，张亨信还受了“不会办事”的批评，说他办事过于认真。张亨信不得已，由苏希贤陪同，手端鸦片烟灯，亲临拉僧庙（紧邻和定乡公所）奇大太太寓所，陪礼道歉，送还了烟灯，才算了事。

正是这样，所以那时有权有势的人成车从敌战区往回贩运鸦片，却不受禁令的约束。如宁夏省主席马逵奎，用汽车运售鸦片，由军警护送，竟无人敢问。而一般没有权势的平民百姓贩运鸦片，若被关卡查获，轻者没收，重者坐牢枪毙。因此一些偷贩鸦片的人，竟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些对

付的办法，以避关卡的检查。如有的用棺材装死人，在死人尸体内或挖空棺材板壁偷运鸦片；有的利用活羊的尾巴，把鸦片缝裹在羊尾巴上，以赶羊为掩护进行偷运；有的把鸦片包扎成圆柱形，塞入自己的肛门内，往来贩运，人称“肛门队”。其他如在衣服、行李、用具中暗藏夹带，更是屡见不鲜。

吸食鸦片 名堂甚多

过去吸食鸦片，名堂很多，无奇不有。吸烟者的姿势：一般是二人对卧，或三人头挨头地卧成三角形，或四人围卧成正方形。烟灯放在当中，轮流打烟，交替吸食，边吸边聊天，消遣开心。

有钱的人吸烟，非常讲究：所吸鸦片烟膏，讲究产区地道，枕的是红缎靠枕，摆的是“景泰兰”烟灯。民谚有云：“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潞安府的烟签尖棱棱”“媳妇们灯前打烟露笑容，姑娘们端茶倒水侍殷勤，还有那跑跑趑趑的二不流子小后生。”并且讲究“边吸烟，边饮茶”，称之为“水推云”。

吸烟用的烟具，俗称烟枪。常见的烟枪，有的是用粗甘草一根，挖空中心制成，有的用木杆子加工而成。这两种烟枪，多用金、银、铜质镂鍍镶焊，工艺精美好看。在烟枪上安装的烟斗（俗

称猴头)，也很讲究，一般以宜兴的陶器“允鸣氏”牌为最好。

以上是富有的人吸食鸦片时所讲究的。而一般吸烟的人，因为穷，讲究不起，就简简单单穷凑乎。民谚云：“七茬八茬尽管抽，九茬烟灰不进斗，管他进斗不进斗，抠到手，扔到口。”

后来有些吸食鸦片的为图方便，又想出几种简易的过瘾方法：一种是把鸦片用烧红的铁丝煨烫，吸食者用小竹筒把烟气吸入过瘾，叫作“烫大烟”。有的人干脆把烟膏含在嘴里，用茶水或开水送下，品尝烟膏的苦味过瘾，叫作“喝大烟。”

吸食海洛因（即料面）的方法，大体和烫大烟相似，把海洛因（料面）撒在一张锡纸上，下面用点燃的火柴烧燎，张口吸入烟气，叫作“吸料面”或“坐飞机”。吸料面上瘾更快，毒害更大。民国十五六年间，又有“金丹”料面的出现，状如胡椒粒，色有红、白、黑、绿几种，也是用鸦片做原料制成的。但吸食者不普遍，还是吸食鸦片的人多。在“料面”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一种“机器泡泡”，是用料面、吗啡加其它化学原料制成，如卷烟粗细，三分多长，中有小孔，也是用吸鸦片的烟枪吸食，上瘾很快。这种“机器泡泡”价钱很贵，一分一元现洋。成瘾厉害的

人，一天得吸一二钱才可过瘾。一般小康之家，若有一二个人吸食，一、两年就会把家产耗尽。临河黄羊木头乡裕成厚村，有一个家庭富有并很有名气的姓魏的地主，其父亲死后不几年，他作风浪荡，染上这种嗜好，弄得倾家荡产。此人与笔者同岁，还是亲戚。

吸食鸦片与料面，能毒害人的灵魂，消磨人的意志，败坏社会道德。有的人吸食上瘾，但又贫无所吸，烟瘾发作，浑身难活。为了过瘾，常常出去“打秋风”钉锅吸一口。往往洋相百出，丢人现丑。碰到慷慨的烟主人，他就把人家捧到天上，满脸堆笑，大献殷勤，甚至念喜歌说：“一进门，喜气生，炕上躺的个吕洞宾，虽然不是真神仙，脸前摆得一盏照佛灯。”其目的就是巴结人家给他吸上一口。若是遇到小气吝啬的烟主人，他就发泄吸不上烟的怨气，讽刺挖苦，诅咒烟主人，给念“快板”词说：“一进门，怒气升，炕上躺着一个活死人，虽然没有进棺材，怀前摆的一盏照死灯；眼流泪，口吐痰，屁股长流淘米泔；灯瓜瓜，纸罩罩，炕上躺着一个死耗耗（指老鼠）”。烟主人不敢惹这号人，最后还得给吸一口。这些人深中烟毒之害，不讲社会公德，什么损人利己的事都能干出来。有的甚至铤而走险，为匪抢劫。民国以来，河套土匪之横行

不绝，有不少是出自这些吸食鸦片烟的人。

烟毒害人 怵目惊心

民国初年，河套“哥老会”猖乱，土匪横行，打家劫舍，民不安生。一些富有人家，唯恐子弟嫖娼放荡，挥霍无度，或受土匪指引，惹事生非，所以有意诱导子弟吸食鸦片，以期子弟养性收心，免祸安宁。岂料此风一行，像瘟疫般地很快传染开来。

贫寒人家无立锥之地，向地主租种一点土地，种粮糊口还嫌不足，哪有余地种植鸦片！？养家活命尚难，更无余钱买鸦片吸。所以河套百姓吸食鸦片之风，最早始于富户人家。

在屯垦队没有官种鸦片之前，河套的吸烟者不多，危害亦较轻。自1932年阎锡山的屯垦队大种鸦片以来，吸食者与日俱增，危害日益严重。有一首“爬山调”这样唱道：“王靖国带来了屯垦兵，后大套都把大烟种；人人手拿洋烟枪，家家摆着洋烟灯”。

人们染上鸦片烟瘾之后，往往不顾羞耻，不怕丢人，什么奇闻怪事都可出现。有的人吸烟横躺下吸几口，再翻身竖躺下吸几口才能过瘾。

有这么一个吸食鸦片的人，他吸几口，就在床上翻几个跟斗，翻完再吸，吸了再翻。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这是惯下的，在他小的时候

候，父亲溺爱他，让他吸鸦片，吸完鸦片又让他翻几个跟斗，以取乐开心。因此，长大以后，一吸鸦片就由不得翻跟斗，否则就过不了癮，身子就挺难受，以致养成了这个难改的灰毛病。

有这么一个人，吸烟卖尽家产，赤贫如洗，难以维生。后来又把老婆卖掉，留下两个儿女养活不起，由慈善团体收养。最后本人流浪他乡。

我认识一个人，夫妻两口都嗜好鸦片，家产卖得不留片瓦根椽，因无米为炊，两人就轮流吃讨饭。最后穷逼无奈，把老婆卖了活人妻，他当兵吃了粮，一直杳无音讯。

还有这么一个人，烟癮很大，家产卖了个净光。穷得养活不过老婆，让老婆公开和别人姘居。老婆与姘夫在前炕一个被窝里睡觉，他自己在后炕点上洋烟灯，心安理得地吸鸦片。还恬不知耻地自言自语说：“人各有所好，你们爱好那个，我就爱好这个！”其烟毒之害，竟把人弄到如此伤风败俗、丧失人格的地步。

有这么一个吸“料面”上瘾的人，中毒入骨，浑身难活。他忍无可忍，生前就和医院签订了出卖尸骨的契约合同，并预领资金，买料面过瘾。当时日本人在京、津等城市设立“骷髅公司”，专门收买吸毒致死的人体，作解剖试验细菌之用。

我见过一个吸食料面中毒的人，料面对他已失去效力，过不了瘾，非得注射吗啡才能维持生命。最后导致全身中毒，流浪到外乡，糜烂而亡。

鸦片烟毒之为害，不仅祸殃及人，就连周围的小动物染上烟瘾也会死亡。有一户人家，房顶有鼠洞，老鼠嗅闻鸦片烟气，日久上瘾。当房主人外出一个时期回来，发现老鼠瘾死，掉下地来。另有一户人家，饲养一只“百灵鸟”，每当晚上主人吸烟，鸦片烟气满屋时，百灵鸟才在笼中欢蹦乱跳地鸣唱。后来主人没有烟吸了，百灵鸟也瘾死了。

回忆烟毒害，不禁长唏嘘，拉杂作叙述，留作后人戒。

1949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解放。翌年二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了“严禁烟毒”的通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禁烟禁毒。1951年河套地区也开展了“扫毒运动”。从此，使祸害人民一百多年的烟毒被彻底根绝。新中国的人民政府给人民造了福。

事隔多年，多有遗忘，记叙纷繁，杂乱无章，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讹误之处，请予教正。

注释：

①禹贡半月刊六卷五期《后套兵屯概况》

②山西文史资料第三辑《绥西屯垦见闻》。

笔者撰写本文被采访的知情者有王致中、王英魁、刘中元、李仲阳、张三金等先生。

陕坝米仓地区一贯 道的罪恶活动

王廷英

一、一贯道的源流及其发展

一贯道原名达摩，起源于山东济南市。传至十七代祖师路中一时，以：“万道归一”、“三教合一”而定名为一贯道。路中一诡称“弥勒佛”下凡，传道十余年，信徒不多。1925年路死后，由其妹路仲英接续传道，自称“南海古佛”下凡。1930年，路仲英病死，由其徒弟郝宝山、孙素贞及流氓道士张天然（亦名张光壁）继承传道。后因张、郝争夺道权，郝失败后被迫到山西传道。张天然则独掌大权，自称十八代祖师“济公活佛”下凡，并自尊为“弓长祖师”。此时张见孙素贞机智文雅，善于传道，已拥有一部分道徒，为了扩张势力，与孙先行姘度，纳孙为妾，诡称孙为“月慧菩萨”下凡。张、孙合伙，密切配合，广泛传道，于1930年冬，在济南设立佛堂（亦称中枢坛），广收道徒。以后又成立天

一、金钢、敦仁、永化四大坛。至此一贯道已初具规模，后传至青岛、平津一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天然与日寇勾结，充当了伪南京政府汪精卫的外交顾问。为了效忠日寇，巩固傀儡政权，向道徒宣传日本的“王道乐土”、“东亚共荣”、“中日满一体”等谬论，甚得日寇的赏识，因而一贯道得以空前发展，并迅速蔓延到华北、西北等地区。

在山东济南市被排挤出来的郝保山，潜伏在山西晋东南长治一带秘密传道，但信徒不多。抗战开始后，郝见张天然效忠日寇，官运亨通，公开传道，大为垂涎，于是便向长治道道尹张景灏（曾任晋城县长，“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长投敌）献媚，自愿充当张的马前卒，为巩固长治道的傀儡政权效命。因而向道徒大肆宣传“中日满三位一体、黄种人源出一家”、“终身信道来世得福”、“今生忍耐服从，来世幸福无穷”等谬论，以此来麻痹人民的思想，熄灭阶级斗争，颇为日寇及张道尹的赏识。伪山西省政府主席苏体仁还明令对其嘉奖，企图达到“以政护道、以道固政”之目的。

1939年冬，我县（山西晋城）的吉星照自称前人，首在其家设立香堂，广收道徒，诈骗钱财。之后，吉又引荐点传师及坛主十余人，开坛

收徒，大肆活动，成为晋城县一贯道的显赫人物，群众皆呼之为“吉师爷”。

二、一贯道的组织系统及发展组织的手法

一贯道阴谋以道代政篡夺政权，在其内部组织机构中分为九级，并规定了各级的权限。其九级顺序为师尊、师母、道长、前人、点传师、坛主、副坛主、三才、道徒。

一贯道在传道方面惯用的手法是，打着“救世渡人”、“消灾免难”的招牌，到处大摆香坛，建立佛堂，制造乱语，以治病、解除疑难、超渡双亲亡灵等手段和“入道后，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张王李赵，使无亲无友无靠者，能有亲有友有靠，亲如一家，患难与共”等谎言，来欺骗引诱群众，迷信其道，发展道徒，扩大一贯道组织。

一贯道的道规，即所谓“天机”，很难一语中的。它东拉西扯，没有系统的东西，既掺和着佛家的消极因素，又有儒家的封建伦理纲常。他们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学的是“仁义礼智信”，求的是“四季平安福”，免的是“生老病死苦”。他们对入道后的道徒，进行封建家长式的管教。如师徒如父子，同道如手足，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在香堂内师父的说教、道友的

交谈、扶出的乩语，严禁向外宣扬，要保证父子不相告、夫妻不相告、亲友不相告，否则泄露“天机”，要遭天打雷击、粉身碎骨，并要受到道内的惩罚。

三、一贯道的易名及合法传播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曾被迫宣布取缔一切会道门，山东济南市公安局，也将一贯道头子张天然依法逮捕，并查封了许多佛坛，没收了许多道产。但时过不久，即又互相勾结，达成密契。并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宣布承认一贯道为合法组织，声称“该道并不通谋敌国，所行皆为善举”。后经孙科、蒋经国授意，将一贯道改组为“中华道德慈善会”。这样一贯道便又投靠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膝下，取得了合法地位，更加名目张胆地大肆扩展传道活动，并网罗汉奸特务、地主恶霸、官僚土豪、流氓土匪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一贯道的指挥中心也由济南市转移至四川成都，直接受美蒋特务操纵利用，从事检举革命进步人士，刺探收集我军事情报，在解放区煽动暴乱、进行破坏等活动。

1947年，大道首张天然在成都病死，其内部

成员争权夺利，各怀野心。张的大老婆刘氏与其子张考箐迁至浙江杭州，另组成“正义派”（亦称大师母派）。张的小老婆孙素贞，仍以成都为中心，正式改为“金钱派”，与“正义派”相抗衡。尽管两派你争我夺，互相倾轧，但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两派则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

四、一贯道在陕坝米仓等地的活动

一贯道传入陕坝、米仓地区的时间，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据陕坝地区曾任点传师的邢守谱介绍，1946年冬，由包头商人王某来陕坝首先开坛收徒，建立了一贯道组织；1948年冬，代县点传师刘五峰在米仓新教乡王二家中开坛传道，使一贯道很快流传各乡。

当时一贯道在陕坝、米仓地区的主要破坏活动是：

（一）利用群众的愚昧思想，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一贯道假供神佛，利用天、地、人三才扶乩，制造“今明两年有大难，人死大半，九女一男，入道者可免”、“彗星擦地过，日月无光照，天昏地暗，在劫难逃，只有入道才能消灾免难”等种种谎言，来诱骗群众入道，哄骗群众钱财。据一个曾任三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介绍：

他们在扶乩时，使用的手法是：“一套、二哄、三恐吓。”

“套”就是从来的人语言里摸瓜，先通过询问来者的家常及生辰八字，再仔细观察来人的衣着相貌、言谈举止、肤色胖瘦、手掌老嫩等，作出关于对方的身份、贫富、性格等判断，求者一定会流露一些底细的。

“哄”就是根据不同对象，说些对方乐于听的话。其秘密是：“小儿求乩多赞夸，妇女求乩顺着爬，男子求乩丢想头，老人福寿添一把”。意思是：对求乩的小孩，要多说聪明伶俐、前程无可限量的吉祥之话；对女人要顺着他们的口气愿望来谈；对男子要多开些空头支票，如“言星将高照”、“贵人来相助”，过了某年某月，一定会交好运，使他们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希望；对老人要多说些他命里福长寿高他最喜欢听的话。这样求乩人大都舒了一口长气，在思想上得到安慰和满足。

“恐吓”就是利用人生在世，在人事、金钱、疾病等方面的挫折和打击自是难免的情况，三才在扶乩时，便无中生有地断言求乩者命犯“白虎星”、“天狗星”、“扫帚星”，犯小人暗忌，或祖先在地狱里遭难，冤鬼索债等等来恫吓求乩的人，然后再指迷解惑，以索取重酬。事后求乩

者如有不顺心的事发生，还真佩服三才的先见之明，殊不知这是一套骗人的伎俩。

新教乡（现沙海建设村）的韩寡妇，女大儿小生活艰难，改嫁守寡举棋不定，于是便到王二家佛坛求乩解惑，乩语云：“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意思即“嫁”与“守”均顺利，以此骗取她两石小麦。新乐乡（现南渠永胜村）的李长发得了胃病，因少医无药，到佛堂求乩医治。乩语云：“雷雨过去天大晴，柳暗花明又一村。”意思即病能愈。并赐以佛符三张，让李用白开水送下治病。李虔诚地照这样做了，但胃病反而加剧，以致卧床不起，最后送掉一条老命。

（二）愚弄群众，骗取钱财。点传师和坛主等为了骗取道徒更多的道费，说什么“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交费越多，功越大，福越厚，寿越长。

1948年冬，山西代县点传师刘五峰来米仓新教乡流动传道，以乡亲关系，寄居王二家中，与来自陕坝的另一姓刘之人相互勾结，大开香堂，诱骗群众入道，计收道徒80余人，骗取道费三十多块现洋、16石8斗小麦。

一次，在杨柜缸房李某家里开坛收徒，坛已布置就绪，来人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我见此情

景，便闯入香堂（当时我任新教乡乡指导员，住在李家院内），欲加制止，但又碍于情面，难以启齿，便强装笑脸，脱鞋上炕，抽烟喝茶，观其所为。只见香案上黄香满炉，烟雾缭绕，三才两人，挽着点传师刘五峰向黄纸牌位三叩头后，坐到正面椅上，合掌当胸，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入道的人也向佛牌三叩头后，又向刘叩了个认师头，便开始扶乩。这时，刘点传师靠近佛牌，默念有词，三才即摇罗书出四句话：即“李树落叶秋分尽，杨柳枯死春又青，陈仓谷粒鼠盗净，张牙舞爪遍地寻。”三才以此解释说：“天下将乱，但有贵人扭转，入道者可免劫难。”乩语四句的每头一个字，横看是李、杨、陈、张四人之姓，说他们四人与佛有缘，实则是藉以提高他们四人的身份，想多骗取些道费。这次他们共骗到白洋十二元、金元券二百余元。

（三）破坏生产，害人害己。陕坝镇的崔××、李×，两人合伙在抗建路开了个杂货店铺，因其经营有方，用人有度，推销有路，勤俭办店，生意非常兴隆。1948年，他们两人先后被人诱骗入道后，便一心一意为道办事，很快被提升为坛主。虽然他俩没有正式开设香堂，但却施展蒙蔽欺骗手法，劝诱其他商民入道，为一贯道在陕坝开展活动起了鼓吹和推动作用。他俩在一心

为道的思想支配下，不务店业，致使商店由兴旺而到萧条，最后歇业、破产而彻底关闭。而他们两人也在解放后受到人民的惩处，被判刑三年。

临河太平乡（现杭后红旗乡繁荣村）的张××，在牺牲一切为道办事的思想支配下，给一个点传师作响导，在外四处传道。其妻临产时派人来找，也不理睬，致使其妻在生产时无人照料，流血不止，又缺医少药，而终至晕死。

米仓新教乡的王二，因与点传师等来往密切，并在其家开设香堂，广收道徒。解放后，在取缔一切反动会道门时，他慑于法律，不敢不检举揭发，但又怕泄露“天机”，受到道内的惩罚。因此忧心忡忡，坐卧不宁，遂逃回山西代县原籍。在那里也感到无法存身，最后上吊自杀。

（四）制造谣言，扰乱治安，蛊惑人心，破坏起义。1949年春绥远酝酿和平起义时，一贯道则散布什么“蒋介石有美国铜墙铁壁，谁也打不倒”、“好女不嫁二夫，好男不事二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好汉，投降最耻辱”，以此来蛊惑人心，破坏和平起义。1950年减租反霸时，一贯道又用“今年分人一半，明年还人一马，活着不还，来世变马变牛也得还”的谬论，来恐吓群众，破坏减租反霸。在一贯道的造谣煽动下，

造成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市场萧条，资本家乘机分散资金，隐藏硬币黄金。农村的地富之家，也辞去雇工，卖骡卖马，宰牛杀羊，大吃大喝。中等农户也走亲访友，探听消息，不安心生产，搞得一片混乱。

五、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不论在国民党统治区，或日寇占领区，都是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在抗战胜利后，一贯道又为美蒋特务所操纵，成为他们反共、反革命的工具，干了许多罪恶勾当。

解放后，根据一道贯的反革命性质和罪恶活动，党和人民政府作出了取缔一贯道的重大决策。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期间，本着团结教育广大道徒，打击揭露首要分子的精神，将一贯道前人、点传师、坛主等首要分子逮捕了一批，并按其罪行轻重，分别给予应得的惩处。同时利用广播、戏剧、墙报、罪行展览和现身说法等形式，揭露了一贯道的罪恶实质及其欺骗手法，使人民群众了解了一贯道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事实，积极帮助政府胜利完成了取缔一贯道的任务。

抗日时期河套特大盗窃集团

王兴亚

从1941年到1945年间（此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在陕坝），在河套地区有一个组织严密、涉及军政各界的盗窃集团。该集团成员之多，作案范围之广，是罕见的。现将该集团案发开始，后来一案一案出现，最后破获该集团指挥部的情况，一一详述于后。

在五原揭开盗窃集团活动的序幕

1941年初夏，长官部军警宪督察处派在五原的分处（处长朱恩达），扣获一个叫黄云飞的惯窃，此人供认曾做过无数次窃案，但所窃都是微薄的物件和食物，也曾被抓获过四五次，被拘禁十来天就放了。经在五原警察局查案，确有其人，因盗窃鞋袜、食物、鸡鸭等，多次被扣而释放是实。在羁押期间，曾让他施展窃术，实地演习过一次。当时派二三名警察跟随他到街上，只见他昂首进入商店，跟店伙及顾客说话，又取货问长问短，并未见其行窃行动，而在出来时，却见他两

手各执单鞋一只，互相拍打着，神情甚是坦然。回分处后，他还讲了盗窃的手段，即“要手疾眼快，当机立断，沉着不惊”。看守人为此问他：

“那为什么你还让人发现被抓？”他说：“这是必要时以假乱真，李代桃僵嘛！”因其在朱处长面前痛哭流涕，发誓痛改前非，如若再犯，甘愿伏法。因此羁押半个多月，叫他立了保状，将他释放。

一个多月以后，稽查处巡查警宪在街上抓回两个斗殴的军人，一个被打破头部。打人者称，“因他要偷我的子弹”。而被打者说，“这是诬赖”。打人的军人带有步枪、子弹，并持有团部发的护照（证件）。被打的只佩戴胸章，没有证明。经讯，此人言语支唔，面带惊慌模样。后经几天严刑追问，始供认被一田姓者雇用为眼线，见了带武器弹药单独军人，就去报告，而他本人并不会偷，这次只是摸摸子弹袋里有没有子弹。当时分处令其引路，派人将田某扣来，原来就是那个“誓改前非”的惯窃黄云飞。傍晚提讯时，黄某在前院突然跑脱。因押送者只有一名武装，虽呼喊追击，却未能抓获。待到后续多人追来，已不知去向。后经详讯在押的眼线，此人供称：黄某说他姓田，雇我查看内外携武器的军人。半年多来，我给他报告过十几次情况，有几

次他干成了。至于他是如何干的我却不知。他是个头头，手下有十几个人。一次当我摸到一个情况去向他报告时，屋内有人，我不敢进去，只听他说：“把武器送到陕坝去，把这报告也一同送去”。还说“要点钱来”。其详情就不知道了。

当时五原督察分处也给陕坝作过详细报告（我当时在督察处任二课课长）。但对这件事都没有引起注意，也未进行追查。

发生在长官部里的窃案

1942年春，长官部卫士队被窃走二号枪一支、子弹十粒。卫士队队长张景涛不敢声张，又不敢叫傅作义知道，只是告知警察处长王金铭，请其侦查，但却没有查得下落。

1942年冬，长官部督导室中将督导苗玉田，被该室勤务兵将其“卜浪宁”小手枪及子弹六粒偷去潜逃，后遍查无获。

傅作义得知其事，责令副官处长温永栋少将，把全长官部各处室勤务兵集合起来，组成班组教训。副官处随派少校副官赵惠民负责组织管理，命名为勤奋队。并指定一名精明强干、岁数较大的李子彦为班长，每日早晚点名，外出请假。每日下班后，上课训练。

勤奋队班长李子彦，竭尽职责，不但白天到各处会室查看勤务兵行动，就是在夜间发现勤务兵出室，及大小解，他也要暗中跟随查看。虽然这样严密注意，但是各会处室仍不断发生纸墨笔砚及私人的鞋袜、毛巾等微小物件被窃。当然这是各处室的勤务兵干的。

班长李子彦不辞劳苦，白天常在大门上同卫兵一起检查各处室的勤务兵，有几次查出勤务兵偷得毛笔纸张等，不过打骂一顿，做个典型教育其他勤务兵罢了。

1943年又发生军械处失盗，被窃去自动步枪一枝，子弹一百粒。军械处长王懋奎不敢向傅作义报告，便刑逼看库士兵，致使该兵潜逃。

1944年七月间，长官部会报室的桌布被盗（会报室是当时长官部规定每星期一、二、三、五、六早晨各会处室负责人向傅作义会报一天的工作情况，每星期四党政军团负责人会报工作的地方。当时会报室内的桌子是用很薄的木板安上四条腿，做成长约七八尺、宽四五尺的长桌五张，将其连接起来，上面铺着一块双幅折成的约五六丈的阴丹士林布）。那天正是星期一，大家一进会报室，都大吃一惊，傅作义也为此动怒。他申斥副官处长温永栋：大门有特务营守卫，我住院有卫士守门，部里又有总值日官（当

时规定各处会室每日下班后及夜间留一官值班，处理临时发生的事情，副官处每日排定一名中级（团级）官员为长官部的总值日官。处理下班后及夜间长官部发生的临时事件），都是干什么的？都睡啦？都死啦？你们不要认为这是个小偷小摸的小事，这是个不堪设想的安全问题，限你三天把此案搞清，否则按你们的职责，依法严处！”说完，怒气冲冲地回办公室去了。因而这天的会报也未举行。这个窃案，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是星期日的总值日官，又是副官处第三课课长，兼长官部会报室秘书。（副官处第三课负责各部队军纪整饬、司法案件的预审以及指挥长官部直属的辎重兵团、骑兵团、特务营、侦察总队、卫士队、传令排、军乐队、劳动营、汽车队、勤奋队等任务）。这天，副官处长温永祿和我，停止一切工作，全力以赴会办此案。并召集卫士队长张景涛、特务营长李民济、侦察总队队长沈金声、勤奋队队长赵惠民等研讨办法。大家认为卫士队的嫌疑最大，于是把每个卫士传来逐一问话。卫士都异口同声地说：“因星期日长官回家，所以小院未设守卫。”卫士们走后，温处长和我商研到夜十时许，突然想了个新的追查办法，于是将卫士队长张景涛和勤奋队长赵惠民立刻叫来问：你们队里的卫士和勤务员有没有请假外出

的。张说：卫士中没有请假的。赵说：刚才勤奋队长李子彦递来请假条，请假两日，要到三道桥友人处送礼贺喜。当时认为李子彦二年来表现很好，工作尽责，吃苦耐劳，不可能行窃。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又研究一回，让赵队长给李准假二日，同时派副官刘飞、赵守义二人（他们是黄埔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毕业生、分配在长官部做见习军官），夜间轮流观察李某行动。如李某出营，就暗中跟踪监视。果然在天方明时，李某空手走出营门，向卫士交给请假条后向西走去。刘飞暗中跟随，见其走出市外，到旷野一个破墓旁，扒出一团东西（看不清是什么东西），裹夹而去。刘当即回处报告，立即与赵守义二人骑车追去。天方黎明，就把李某追回，赃物桌布乱成一团。经讯供认：“因亲戚结婚，无钱送礼，才趁星期日长官不在，又无卫士守卫，潜入会报室偷窃。窃后不敢出营门，而从人事室院内矮墙处跳出，将桌布埋在野外坟窟中，作为去三道桥送礼之用。”破案后再未深追。经副官处长温永栋向傅作义汇报，因李某素日工作负责，印象很好。傅令将李送劳动营服役，以观后效。

李某在服役期间，不仅表现好，还帮助扣回逃犯两名，深得劳动营长杨士英垂青，并向副官处保释。派他管理劳动营库房及庶务工作，还受

到副官处表扬。孰料到，1945年春，这个盗窃集团的总首领被扣后，这个所谓表现好的李子彦，竟窃走杨营长的手枪和子弹，伙同以前由他自告奋勇扣回来的两名逃犯和另两名士兵，又窃了些财物逃之夭夭了。

发生在部队中的窃枪案

1944年元旦前，侦查队驻临河分队，查扣一名逃兵，叫崔庆发。此人携带步枪一支和七八个士兵的胸章。在开始审讯时，他自供是共产党派来的密探。后经详细审讯，又向各部队查询，才确悉其为兵痞惯窃。他从四一年起到现在，逃遍傅作义所部十八个团，窃取步枪二十多支，并勾结另外四五个人，专门潜入部队盗窃武器。他们将窃来的武器交由同伙王班长，起初在五原交，后又改在临河郭景云师运输队交。每支枪给白洋三十元，每粒子弹二角。据说陕坝有人收购武器，收购地方在省政府后边，何处何人都不知道。经电令郭师查扣王班长，该师复电：王某已于月前潜逃。根据崔某所供情节，追查枪支被窃的各个团连，原来这些连只报潜逃，未报拐枪。因而将各连长按情节轻重予以撤职，扣捕和记过等处分，各上级团营长也受到记过和警告等处分。该窃犯经军法处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经过五原黄云飞案和到处拐枪的崔庆荣案，都供出盗窃集团的根据地在陕坝省政府后边，这才使治安各部门引起警惕，并严密在省府附近进行侦查。

1941年5月，在五原画匠圪堵和新公中发生抢案，居民群众反映系当地驻军李连所为。有人当场看见该连王班长，又有人说，还看见有李连长，因此将李扣送军法处讯问，该连王班长和两名士兵潜逃。因李坚不承认，又无确证，遂派人去画匠圪堵实地查询。得悉抢案是该连换防临走的夜晚发生的，认定有王班长在内。至于有无李连长，不敢确定。后因查无确证，经该师郭师长来函请求开释。遂以查无实据，暂由该师领回再议。该师领回后，又任命为该师运输队队长。

1941年7月间，为三十一师医院院长武效光与军需主任刘效实，合伙盗卖该医院药品，以假换真的舞弊案，派我去五原东刘保公中该师驻地调查，并检查药品收出的情况。约在7月中旬，我由陕坝乘马出发，因动身较晚，第二天才走到乃马召住宿。当时该地仅有三户人家，桥旁有一家车马大店，店里有一盘大炕，能住四五十人。当时已住进三十多人，我把马绊好，放在店后草地，就在店里住下。大约十二时左右，突有匪众二十余人，乘马翻穿皮袄，不戴帽子，包围了店

房，喝令住客齐站在炕上，逐一下来搜查身上。当时我退到炕的最里面去，把胸章扯下扔在窗台上，始终注意匪伙中为首的头目。他们外穿军大衣，里面穿的是军服。因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匪首的身上，其面貌看得很清楚，醋糟高鼻梁，腿上还打着绑腿。我是最后被搜查的，（在抗战时前方部队官兵军服都一样，只是军师部内办公人员多不打绑腿），我装成传令兵的身份，当被盘问时，还算对我优待，身上带的十几元钱还给我留下。搜完身后，把炕上所有的包裹都抢走了，只有我的公文袋，被乱翻了一阵，扔下未要。临走时，迫令旅客睡在炕上，不准乱动。他们把灯吹灭，呼哨而去。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出去查看情况，在门外还有匪徒一人放哨，喝令我回去。我便小解，被匪徒一枪托子把我戳回家里。当时我看见匪众正强拉民众的牲畜驴马，后都上马而去。我估计他们已经走远，便出去找我的马子，幸亏放得较远，未被匪徒发现拉走。

事后在1944年中秋节前，我（时任副官课长）为一案件去军法处联系，（军法处在郊外），正值军法处审讯一案犯，我坐在一旁听审。这个案犯是临河警察局扣送来的盗窃诈骗犯，名叫王富达（蒙族），在蒙古骑兵白海凤师董金寿团团部当庶务（准尉），因案情不大，又

有董金寿团长说情，拟最后审查一遍，即做轻微判处，或送劳动营服役。也是天假地设，神使鬼差，我一见此人，感到颇为面熟，细审视之，猛然想起三年前在乃马召遇劫之事，此人就是当时的匪首。于是我立即问他：你还认识我吗？又说：“你还记得三年前乃马召店中被抢的传令兵吗？”他当时面色突变，哑口无言。我就把前事向军法处长刘钧说清，并请严加看押，定期会审我也参加。不料过了七八天没有消息，经我到军法处询问，在我走后几天，该王某越狱逃跑。事后查明，是一个看守士兵受贿白洋二百元放走的。遂将看守士兵扣押，此案也未上报长官部，便不了了之。事后经对证以及破获盗窃集团的总指挥后，才知道王富达就是画匠圪堵抢劫案中的王班长，是盗窃集团中的小头目，是拐枪犯崔庆发所供的同伙中的王班长，是从郭师李连处逃走后，参加董金寿团内的抢劫团伙的领导人。他的罪恶，比总集团的负责人还要“多而大、要而重”。

事情常常是冤家路窄。在1947年三四月间，我在包头警备司令部时，西公旗保安司令部送来两名共产党嫌疑。我一看，其中一人正是原来盗窃集团的小头目、越狱潜逃的王富达。我问他：“你还认得我吗？”他当时面如灰土，全身

战慄，形如瘫痪。我令看守人将他交看守所严加看管，勿使逃跑。此时西公旗保安司令部郝游龙正在包头，他闻讯急来警备司令部找温永栋司令说情，温说：“我不明案情，请找王主任商量”，郝接连找我数次，当时我想，事已时过境迁，得容人处且容人。遂将该王某传来，嘱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能金盆洗手，痛改前非，仍不失为完人。该犯也俯首认罪，誓改前非。于是将其交给郝游龙领走。

1944年冬，陕坝警察局扣获盗卖枪械犯一名，供出系受郭师运输队长李怀玉的指示来陕坝送枪，并供出晚间黄昏后，到省政府后小渠桥旁等候，就有人来收，并要收据等情。至于收枪者是谁，住在何处，却一概不知。他又供出李队长是临河的负责人，在黄羊木头、桃力民、东胜、哈拉寨都有人。

根据该犯所供，即电令郭师扣捕李某送部，并通知临河侦察队及警察局注意查扣。后经该师回报，该队长已于前十日带了三名士兵，拐枪四支潜逃。遂由长官部通知各部严缉捕获。

1945年夏，据驻哈拉寨的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报告，潜逃在该部慕新亚师并且当上特务连长的被通缉犯李怀玉，又在该地组织集团做案多起，经扣捕查实对证，李供认不讳，遂将其就地

枪决，特报请被查。（事在已破获总集团头目已枪决之后）。

1943年冬，侦察队扣获出售赃物犯一名，经讯明，窃的是住三道桥长官部直属骑兵团李连长抢劫来的赃物，并供出该连长李某（名不记）是盗窃集团的头头。在平化乡公所及梅令庙国立绥中都有他的手下人活动。他还派人于夜间抢劫过乡民，并且诬报乡民为汉奸，送解长官部等情。以前侦查队派住三道桥的所长蒋梦阳报告，该连有抢劫行为，但无真凭实据，不能冒然扣捕，今据该犯供认是实。乃下令骑兵团长刘春芳严密派人将该连长扣解送部。刘春芳团长奉命后，以开会为名，骗其参加进行扣捕，谁知该连长竟在前一日夜带士兵十余名，伪言出外巡视，藉机逃跑。还带走步枪十余支、自动步枪一支、马十余匹。长官部虽通令缉拿，也等于一张废纸。在1945年扣住该集团总头目后，曾在平化乡公所扣捕乡警一名，在绥远中学扣校役一名。

在绥远省政府的窃案

在省政府所属各厅处，历来也不断发生小偷小摸的事情。曾经民政厅扣获窃徒一名，是一个十五岁的勤务，搜出赃物一包袱，多是衣帽鞋袜等物。因该犯年幼，所窃之物极微，经同民政厅

商议，将其开除。后又有省政府秘书处送来窃犯一名，是该处的勤务，因窃卖秘书主任张凤来的怀表被扣，赃物追回。该犯供认出同伙某某在省府蒙务组当差，他们从小认识。遂将该犯也扣押，经讯，他在蒙务组行窃多次，也同秘书处勤务合伙盗窃过会计处的纸张什物。这些都为各失主证实。该犯等虽属小窃，但都已成年，遂送劳动营监督劳动。然而在1945年却随同长官部窃犯勤奋班长李子彦潜逃。

1944年三四月间，省政府勤务队，发生了该队班长携械潜逃（拐手枪一支）事件。不几日，又有一个士兵拐枪潜逃。该队长李清潭（前跟我当班长）不敢上报，托我着侦察队传令各地分所注意查缉。事隔半年之久，该队长找我说：“有人在临河街上碰到这个携枪潜逃的班长，穿的警察的衣服，说是桃力民的。请我给桃力民侦查分所去令查扣。我觉得经收发传送，恐有泄漏，不如给桃力民办事处处长傅观澜（我的老同事）去个私信比较稳当，遂函傅查扣。去信不到月余，傅复信说：“该犯已被扣捕，对拐枪一事供认不讳。又经追讯，复供曾在五原警察局拐枪潜逃，枪支卖给省政府电信局的通讯员等情。本想将其解送陕坝，不料该犯服鸦片烟自杀。”信中还附有该犯的供词。后经令电信局查询，该局复称：本局

并无其人。因原犯已死，无法查对，此案作罢。

1944年七八月间，有执子补隆侦察分所扣送贩运鸦片犯二名，经供认，是由第五纵队鄂友三部雇用的几十个人，分头去五原、临河、伊盟各旗、磴口、石咀山等地出售，以购买枪支弹药。并说这鸦片是发的饷，连这次已运去三次，除供出负责人姓名职务外，还说每次都要将少数鸦片送缴省政府。事后虽通令缉捕，并未扣获。

捣毁总巢 扣捕元凶

根据以上案犯所供，经深入研究查对，已证明这个盗窃集团的总头是在陕坝，而且不是一般勤务夫役之辈。遂指令侦查总队、保安司令部、警察局派干员多名，并指定一名精明资深的干员，严密侦查，务必破获，重点放在省政府内部和附近一带。

1945年元月份，保安司令部的密探，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见一人在省府后水渠桥旁蹒跚蹒跚，如同散步。此时该探进入渠内大便，出来时就见有两个人影，沿渠边走入市内。该侦探暗中跟随，在黑暗中隐约见其中一人身背一物，像似长枪，并听见其小声说话，他一直跟踪到大杨树林附近的三个客栈，当即向侦察总队报告，经派人往扣，只扣住带枪的一人，并查出大枪二支，子

弹六十余发，鸦片烟五十两。经讯供，此人坚不承认有不法行为。因他携带的护照其物品栏内未填写有武器。又据店伙称：此人来时并未带枪，他晚间同一个穿便衣的人带着两支大枪回来。少时，那个穿便衣人便离去。后经四五天的追讯，最后才供出他是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军械处班长，奉王军械员指示来陕坝取枪和鸦片烟，并带有现洋三百元、法币三千元。因我初次来，不知地理，王某告诉他到陕坝打听好省政府所在地，等到星期六天刚黑时，去省政府后边水渠桥上向东瞭望，不用十来分钟，就会有人出来接头。我依此行动，果然来了一人。问我来处，把我领到离桥不远的破房内，取出枪、烟，同我回到店中取款而去。我只认其面目，不知其姓名地址。根据该犯所供，遂商定星期六再派武装埋伏在附近，让一个密探到时去桥上引诱。连着去了二次，并无人来，在第三次去时，只见桥上已有人站着，该密探慢慢地走到跟前，该人带着惊异的眼光问：“石先生来吗？”该密探当即唿哨，唤武装出来，把这人扣捕。经带回讯问，初不供实。经四五天刑讯，才供认他是第五纵队鄂友三部的采购员，从1941年起，就和省政府电讯局的石某交往，用烟土、白洋向其购买枪械。后又追出该电讯局尹局长（尹子布），也曾有一次交给他一

支手枪，但终不知石某的住处和姓名。后经查明，电讯局确有石某其人。当即在电讯局将尹局长和石某扣捕。并在石某家中查出步枪五支，又在尹的办公室保险柜内搜出“卜浪宁”小手枪一支，子弹六发。经对证，该手枪是督导苗玉田被其勤务窃去的。人证物证俱在，尹某不得不供认事实。此案由军法处长刘钧、副官处长温永栋、侦察总队队长沈金声和我组成审判小组，详讯此案。起初尹某坚不承认，后见铁证如山，才供认窃卖枪弹。三年来共盗卖步枪七十多支、手枪二十余支、子弹一千多发。其中大部分卖给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和第五纵队鄂友三部，少数的卖给第一二游击区总部。交易以烟土白洋为主。但对其集团的组成，坚不供出。后多次引导：“只要交代出组织，定按坦白从宽处理，立功赎罪，不然以盗卖枪支罪判处死刑”。这时他才将组织供出。即五原由黄云飞负责（已潜逃）；临河由警察局警长姚某负责（早已被开除），后去桃力民活动，继之由临河郭师运输连李怀玉负责。还有王富达等人在黄羊木头、邬家地、上蛮会、三道桥、绥中、太阳庙、省政府、省党部等处活动。

在审讯中，有省政府、省党部的某大员给温刘二处长来信说情。又因尹某未动刑即供出真实

情况，遂判以无期徒刑，呈傅长官批准。但傅不予画行，只是口头上说枪决，第二次又拟定枪决，上呈傅作义，仍未画行，也不明白傅是什么意图，都认为傅想从轻处理。于是又拟判二十年有期徒刑。谁料傅先生一句话没说，在签呈上批了四个大字“执行枪决”。因此将尹某枪决。

根据尹某所供，分别下令查扣余党，除在扒子补隆扣住黄云飞判处徒刑外，其余均未查获。事后又签呈令马占山、鄂友三，第一二游击总部，查报买枪事，而副司令张濯清不签字画行。他说：整个集团已被破获，首犯业已枪决，不需穷追，扩大其事，以免损害大局，因而作罢。这个巨案就此结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作者 =

页数 = 3 1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